

99/10

总第91期

■ 开国大典回眸

■ 打扫家门：新中国封闭妓院

■ 遥望神州的太平洋孤岛战俘

■ 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脱帽道歉

■ 毛泽东 吴晗与《朱元璋传》

■ 语言学音乐学大师赵元任

■ 林彪与个人崇拜

炎黄春秋



在开国大典上，毛泽东主席宣读政府公告

「龙文化与民族精神」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



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协办的“龙文化与民族精神”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

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陈沂、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庄炎林、冯征等出席。来自京、沪、宁、苏、鄂、豫等地的四十余名学者，就龙文化的起源、形成、发展及其同民族精神的关系，百家争鸣，进行了热烈讨论。研讨会得到贵州省巨龙游乐有限公司的赞助。



图片说明：
上：研讨会主席台
中1：钱伟长（中）陈沂（左）
庄炎林（右）在主席台上
中2：听众席一角
下：部分学者在发言



炎黄春秋

历史记

- 2 开国大典回眸……………钱听涛
6 回忆开国大典实况广播……………杨兆麟

春秋笔

- 8 “我向大家行一个脱帽礼”
——记毛泽东同志坚持实事求是作风一例…林玉华
附:《人民日报》短评 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
12 打扫家门:新中国封闭妓院……………白云涛
16 “穷过渡”的最后挣扎……………陈大斌
22 阎锡山从联共抗日到联日反共……………陈应谦

求索篇

- 28 毛泽东、吴晗与《朱元璋传》……………苏双碧
34 林彪与个人崇拜……………冯建辉

人海痕

- 41 语言学音乐学大师赵元任……………邱 健
46 汤佩松院士的境遇与抱负……………毕列爵
50 新乡起义背后的生死情谊……………陈 泓

法制苑

- 54 香港税务局长未避嫌遭解聘始末……………萧 徐

赤子心

- 58 遥望神州的太平洋孤岛战俘……………张泽石

群言堂

- 62 “五四”前后鲁迅的民主、科学思想……………汪 京
64 滴泪是金……………杜导正

两岸情

- 65 萧乾与林海音的“京味”之交……………何 标

英烈谱

- 66 铁骨将军陈外欧……………王宇明
71 “自祭联”不幸成讖语
——怀念江上青壮烈牺牲六十周年……………孟亦奇

文荟苑

- 73 甲骨文发现一百年……………王兆麟

百舞台

- 77 义和团的悲剧……………雷 颐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朝闻 杨静仁 赵朴初
胡絮青 费孝通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其庸
刘颖南 李 庄 李 普
李学勤 吴 象 苏双碧
张 镔 张国琦 凌 云
韩劲草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久明

社长(法定代表人):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常务)
徐 孔 程理嘉

执行主编:

刘家驹 舒元璋 吴 思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理事长:陈 渊

理事单位:

深圳市亚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秘 书 长:徐 孔

法律顾问:程振勇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中国标准刊号:CN11-2581/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北京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1号

邮编:100007

电话:64072452 84020890

84020891

印刷:丰润县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

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出版日期: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079号

定价:4.80元

开国大典回眸

● 钱听涛

50年前我参加了天安门前的开国大典，常引为终身幸事。岁月无情，有些细节也模糊了。近年打开存篋，居然找出了一本1949年的发黄的日记，详记了开国大典前后的生活，更高兴的是找出了一张在会场上领到的“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口号”，八开油印，30条口号仍很清晰。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同志知悉后竟把这张口号连同建国前夕我保存下来的几张报纸号外等都征集收藏走了。建国50周年大庆临近了，我检阅史籍，追寻旧踪，过去不了解的许多史实呈现在眼前，记忆中模糊的细节又清晰起来，共和国华诞的一幕幕，呈现在眼前。

聂荣臻任阅兵总指挥

开国大典前中央人民政府及政务院尚未成立，筹备工作主要由刚成立的北平市人民政府承担。事亦凑巧，市长兼军管会主任叶剑英8月就被内定调华南工作，准备解放广东，9月初就到江西赣州去了。中央任命时任副总参谋长、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京津卫戍司令员的聂荣臻接任。当中央决定在开国大典上进行阅兵时，中央军委又任命他担任阅兵总指挥。虽然北平市各机关团体、各民主党派共25个单位到9月21日才正式集会成立筹委会，并公推聂荣臻为主任委员，但实际筹备工作早已

开始。从整修天安门会场、树立旗杆、组织群众、准备鸣放礼炮焰火，特别是训练受阅部队，以及布置保卫会场安全等，都要在一个多月时间中完成。

开国大典的安全工作十分重要。北平解放不久，城内潜伏特务难以一下肃清，而且国民党飞机还会来袭扰。当年5月4日，国民党就从青岛派出6架B-24型轰炸机轰炸南苑，投弹30枚，毁伤我飞机4架，房屋196间，死伤24人，因此聂荣臻一直十分重视防空问题。我们空军还未正式组建。军委有一个航空局，专门在南苑机场组建了一个飞行中队，担任北平防空。聂荣臻考虑很细，下令万一敌机前来，在场人员一定要原地不动，不能乱跑，听从指挥；对受阅的1978匹战马也都作了安排。当然这一切是在中央领导之下进行的，周恩来常常具体过问。如10月1日中央领导人的车队如何从中南海开到天安门下，周恩来带罗瑞卿都曾亲去检查。

庆典前中央人民政府举行首次会议

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是9月30日由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选出的。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委员有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凝等 56 人。当日下午 6 时，全体代表利用统计选票时间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尔后回到会场才宣布上述结果。简短隆重的闭幕式，由毛泽东主持，朱德致闭幕词，奏义勇军进行曲。主席台上第一次悬挂了五星红旗。散会时天已经很晚了。

习惯晚上办公批阅文件的毛泽东，这一天夜以继日一直工作到 10 月 1 日凌晨 6 点多（见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首次会议于 10 月 1 日下午二时在勤政殿召开。全体宣布就职，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随即，选林伯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会议还宣布接受共同纲领为施政方针，并通知各外国政府只有这个政府才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并愿与各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

会议开完，全体领导人乘车出中南海东门，

到天安门后下车登楼，下午三时庆典准时开始。

开国大典时的天安门会场

举行开国大典时天安门修葺一新，城楼上横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正中悬挂毛主席的巨幅画像（40 年代着冠照）。两旁的标语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万岁”，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没有国徽，因为 9 月 25 日、26 日政协的座谈会及审查委员会上认为还要修改，所以 27 日全体会议上只通过了国旗、国歌、国都、纪年 4 个决议。

那时，东西三座门（正式名称为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及南面长长的甬道，甬道两边长长的红墙，正南门即砖石结构的中华门都还存在，形成了一个丁字形的封闭的会场。与 8 个月前北平刚解放时的天安门前比较，可说是焕然一新，宽广平坦得多了。此外在现在国旗旗杆的地方已竖了一根当时看来已很高的旗杆，旗杆上有一个金色的顶。中华门外正阳门、前门箭楼两旁

的许多建筑物上都张灯挂旗。“北平东站”、“北平西站”的大字一夜间都改成“北京东站”、“北京西站”了。会场里的工人、学生、干部、市民、城防部队都举了临时赶制的五星红旗及其他红旗、红灯和彩色小旗，特别是用红绢糊的大小不同的五角星灯，真是成了红旗红灯的海洋，只有市民中戴了小白帽的回民同胞举着绿底白色的星月旗，显得分外不同。会场上的群众共达30万人，分区席地而坐，很有秩序。金水桥北没有现在的观礼台，但搭了两个简单的台子，一个供大会指挥用，一个给惟一的外宾观礼团，这就是前一天刚到的以法捷耶夫为首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受检阅部队则站在东长安街。

那时交通工具少，群众近则列队步行来，远的坐火车来。我当时所在的单位，临时编为华北革大第四部，住在西苑大院。华北革大七八千人的队伍迤迤一里许要步行到清华园车站。天未亮起床，到车站已7点，乘装煤的黑敞篷车，走了两小时才到前门车站。经过西直门车站时还见到门头沟工人也坐火车来。虽然“旅途”这样艰苦，但大家情绪高涨。在前门席地而坐等到下

午两点才安排进入会场，午饭是馒头凉水，每人领到三块糖、两个梨，是节日优待。

毛主席在天安门上讲话

庄严隆重的开国大典终于在10月1日下午3时开始。那天早晨是阴天，上午和中午还下了一点小雨，但下午却放晴了，真是老天也和万民同庆。典礼的程序是：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宣布开会；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就位，副主席就位，委员就位；奏义勇军进行曲；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升国旗（同时鸣礼炮，礼炮毕）；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阅兵；游行。毛泽东主席宣读的公告，约九百字，虽未收入新出的八卷本《毛泽东文集》，但收入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及《共和国档案1949-1996》。

提到开国大典，人们很容易想到毛泽东主席那句震古烁今的名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然而这句话，并不是毛泽东在天安门楼上讲的，而是在此之前的9月21日的政协开幕词中讲的。原文是“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



参加开国大典的北京军民

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篇文章已收入《毛泽东文集》。

还可提及的是升国旗、鸣礼炮。鸣礼炮从北平解放后已是第三次。第一次是7月7日晚天安门20万群众纪念抗战12周年及政协筹委会召开时放的。第二次是9月21日新政协开幕时鸣了礼炮54响。这次开国大典则以54门礼炮鸣28响，54门礼炮象征全国54个民族（当时还未有现在56个民族之说），28响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历28年艰苦奋斗才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正在礼炮轰鸣时，毛主席按动电钮，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场群众都把红旗红灯高高举起，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

朱总司令下达总部命令

毛主席宣读完公告后，阅兵开始。检阅司令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阅兵总指挥是聂荣臻。

首先由聂荣臻陪同朱总司令坐敞篷车开始检阅。检阅毕，朱总司令回到城楼主席台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的最重要内容为“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因为当时华南的两广海南、华东的福建一部分、西南全部（四川、西康、贵州、云南、西藏）均未解放，新疆虽宣布和平起义，解放军尚未到达迪化（乌鲁木齐），更不要说还有台湾，所以朱总司令的命令是有针对性的。命令宣布后，进行分列式。受阅部队以海军两个排为前导，接着是一个步兵师、一个炮兵师、一个战车师、一个骑兵师相继跟进。空军包括战斗机、蚊式机、教练机共14架在全场上空自东向西飞行受阅。前后历时3小时。

难忘的群众大游行

整个阅兵结束后，群众游行开始。一批批群众队伍，无不迫切希望走到城楼前，看到衷心敬爱的毛主席。天很快黑了下来，天安门楼上的灯光突然照亮，上面是一串红橙色的灯，下面好像是三道粉青色电虹灯，再加上巨大的探照灯光射向全场，灯光闪闪，好似波浪。焰火在天安门附近三处施放，五彩缤纷，此起彼落。群众手里举的纸灯、纱灯也都点亮了，广场上是灯的海洋。

等到八点多钟，华北革大七八千人的队伍才在华北大学之后行动。队伍慢慢走近金水桥，只听见城楼上扩音器传出“万岁”、“万岁”的声音，才知道是毛主席在回应华大同学的欢呼。我们紧跟着走过金水桥，大声高呼“毛主席万岁”，这时才见到城楼上大宫灯前毛主席那魁梧的身躯，他不戴帽子，挥动着用手用湖南口音高呼“万岁”，有时还喊“同志们万岁”，这时我们都感到毛主席看见我们了，口号喊得更为起劲，血都要沸腾了。我们还看到少奇同志，看到他身旁的女同志，我们猜一定是宋庆龄副主席。我们把手举到头顶鼓掌，主席台的领导人也鼓掌，人民的领袖们真是和我们心连心。

这就是有历史意义一天的实录。

要补叙一句：把10月1日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并不是在开国大典之日。10月9日全国政协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患病缺席的马叙伦委员托许广平委员提出建议：定每年10月1日为国庆，获得通过。但只作为建议送政府决定。同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四次会议时决定接受此建议。从此“十一”成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国庆节，至于现在的国徽一直到1950年9月20日才以毛主席命令的形式公布。

（责任编辑 吴文）

回忆 开国大典实况广播

● 杨兆麟

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是举国同庆的光辉节日，永远彪炳史册。而“开国大典”的实况广播工作，也是中国人民广播史上的重要一页。我有幸参加了这次的工作，更是难以忘怀。

早在一个多月之前，北京新华广播电台，也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各有关部门都开始进行准备工作。胡若木、高而公和我分工编写实况广播稿，一次又一次地到郊外去采访阅兵式和分列式的演习，并且到参加游行的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农村去了解情况，由我执笔起草实况广播稿，在编辑部经过了反复的讨论、修改。播音员丁一岚、齐越每次都参加讨论，深入了解情况，领会稿件的精神。

当时的技术装备相当的简陋和落后。为了使整个天安门广场都能清楚地听到天安门城楼上主席台的声音，并且传播到全国，只有一个喇叭的普通扩音机是不能适应需要的。1940年创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时期负责技术工作的傅英豪设计、制作了一种大型扩音机，把九只喇叭装置在一块板子上，形成强大的音量，我们把它叫做“九头鸟”，在广场上架设了好几个，把问题解决了。技术上还有一个大难题，朱德总司令阅兵的时候，将要乘检阅车从广场中央驶向东长安街，然后再返回广场。在广场以内的音响问题已经解决，可是，检阅车一开出广场，那边的音响就无法传回设在天安门城楼下面的机房了。工程师费云想出一个办法，在检阅车的挡风玻璃

板上安装一只话筒，在车的尾部安装一个小喇叭，同时在记者和技术员的采访车上装备一部钢丝录音机，尾随检阅车录音。由于要在检阅车上安装机器，采访车还要尾随其后，因而事关重大，要报请阅兵指挥部批准。我们向指挥部说明了情况，他们很了解使全国人民听到阅兵的情况非常重要，就批准了这个方案。

在西郊飞机场演习的时候，我和费云乘坐采访车，紧跟着检阅车，朱总司令向受阅部队高呼“同志们辛苦了！”战士们齐声回答：“为人民服务！”这些呼应的声音都录了下来。由于车速和时间都有严格的规定，我们录音的长短同样经过了精确的计算，准备到10月1日按照程序播放。在演习结束的时候，朱总司令询问我们录音工作的情况。由于这是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和广场上进行实况广播，任何人都没有经验，朱总司令担心他在城楼上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的时候，技术上会不会出什么问题。为了保证安全播出，他要我们到他的住处去，事前为他录音。虽然我们不知道天安门城楼上的播出不会有问题，可是，总司令如此的认真、谨慎，我们还是在他指定的时间，前往中南海为他录音。他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铿锵有力地把命令读了一遍。这个录音虽然当天并没有使用，却成为一件珍贵的史料。

10月1日早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播出预告：“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及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决定转播今天下午三点钟举行的中国人民

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祝大会实况。”喜讯立即传遍了全国。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一切准备就绪。这天下午两点多钟，全体广播工作者在天安门城楼上下各就各位。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也就是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前身，决定由梅益在现场主持城楼上下的全部工作，李伍和李志海负责城楼上的技术设施，特别要照看主席台的话筒和播音话筒的安全，费云和傅英豪负责机房和广场的音响设备。播音的话筒原来树立在城楼走廊的最西端，可是，参加观礼的人很多，一直排到了走廊的东西两端，我们只好把播音话筒移到城楼两侧的平台上。站在话筒前面工作的是胡若木、丁一岚、齐越和我四个人。

这一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俯瞰广场，受阅部队全体肃立，广场的南部站满了各界群众，都在静静地等待着那个庄严的时刻。

下午两点55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健步走上城楼西侧的台阶。主持庆典筹备工作的周恩来，早已提前来到城楼上，以他一贯的严谨、负责的作风，仔细检查了各项工作，特地询问了实况广播的准备情况。

我们目送毛泽东等走到城楼中央，准时三点钟，庆典开始，他以洪亮的声音庄严宣告“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整个广场，欢声雷动，通过无线电波，传播到全国的城市和乡村，并且远达海外。千千万万的人民聚集在收音机和高音喇叭周围，聆听着首都的声音，热烈庆祝新的历史时刻的到来。承担了重任的那个老式话筒，成为一件文物，后来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

丁一岚和齐越认真地交替朗读实况广播稿，把眼前的动人情景报告给海内外的亿万听众。胡若木和我由于事前进行了采访，撰写了广播稿，具体了解庆典的程序，用手指或者点头示意，告诉他们应该播出哪一段。我们四个人配合默契，工作很顺利。

阅兵式开始以后，朱总司令和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站在检阅车上，先检阅了排列在广场上的部队，随即驶向东长安街。这时候，机房里开

始播放事前制作好的录音。等检阅车和指挥车回到广场，恰好准时放完了录音，又接上现场的音响。据我们事后了解，那一段录音不如现场的音响那么清晰，因为我们事前录音的时候，把检阅车的马达声也录了进来，这在技术上是无法避免的，好在处在兴奋状态中的听众并不苛求和挑剔，也根本不知道那一段是在播放录音。这是我们不得不采取的补救措施。

朱总司令回到城楼上，宣读了命令，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领土”。然后进行分列式，海军、步兵、炮兵、装甲兵、坦克兵、骑兵队伍，伴着雄壮的军乐，陆续通过广场。人民空军的银色战鹰凌空飞过。天上地下，无比的威武壮观。

在分列式的最后一个方队走出广场以后，整个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华灯齐放，光彩夺目。等候在东长安街和东单一线为群众游行队伍，挥舞着各色鲜花和彩妆，浩浩荡荡，欢呼着通过天安门广场。正阳门外一阵轰响，五颜六色的礼花飞向夜空。直到晚上九点二十分，庆典快要结束了，毛泽东大声向广场上的群众说：“同志们辛苦了，大会结束了。”按照原定的程序，我们在九点二十五分宣布了实况广播结束，整个广播持续了六个半小时。

也正是在这时，齐集在广场南部的群众，高举着鲜花和彩旗，像潮水一般涌到了金水桥边，向天安门城楼上欢呼、雀跃，场景非常热烈。我们看到，毛泽东等领导人面对热情高涨的群众，似乎不忍马上离去，缓步走向城楼的东端，不断地向群众招手致意。又转身向西走来，从我们面前经过，到了城楼的西端，向这边的群众招手致意，才一同走下城楼。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到来之际，我再次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栩栩如生，而那天一同工作的李伍、费云、高而公、丁一岚、齐越、傅英豪等已经永远离开我们，怎能不引起深切的怀念和敬意啊。

（责任编辑 方 实）

编者按：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丁济沧同志，将他珍重保存近二十年的一份《人民日报》清样寄给了我们

清样中的文章配有短评，是1980年1月间准备作为重要文章发表的。只是因为当时康生问题中央还没有作出新的决定，文章公开发表不合时机，才最后撤了下来。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的李庄在写给总编秦川的便信中说：“我们几人看过此稿，认为现在不宜发表：一，当时罪魁是康生，现在发，对处理康生不利；二，同‘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不好衔接。”秦川同志同意了李庄同志的意见。

这两篇当年未能面世的文章，今天读来仍不免令人啧啧称赞。实事求是是我党一贯主张坚持的正确的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贯彻执行得好时，我们的事业发展就顺利，成就就大、就辉煌；执行得不好时，我们的事业发展就缓慢、停滞倒退，甚至会造成更大的灾难。可见贯彻执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极端重要性。为此，我们特将这份尚未面世的清样发表，愿我们为贯彻执行这条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思想路线而共同努力。

“我给大家行个脱帽礼”

——记毛泽东同志坚持实事求是作风一例

● 林玉华

当年曾经在延安工作过的一些老通信战士，每当回忆起三十多年以前，毛泽东同志为军委三局受打击的同志脱帽鞠躬的情景，至今仍然禁不住热泪盈眶。

那是1945年的春节，纷扬的瑞雪覆盖了延河两岸的山峦。一天，王诤局长兴高采烈地从枣园回到局部，带给大家一条好消息：明天要到枣园去给毛泽东同志拜年，各电台、总机除了当班的同志以外都去，毛泽东同志要亲自给大家讲话。消息一传开，同志们奔走相告，有些人激动得一夜都没有睡稳觉。

次日拂晓，分散在西川里的通信战士，陆续从四面八方朝着局部裴庄汇拢而来。队伍在延河畔集合好，王诤同志亲自带队，秧歌队走在最前面，后面是通信材料厂的工程师、技术员，军委总台的报务员、调配员、通校的教员、学员，新

华广播电台的机务员，以及有线电大队的电话员，恰似一条蜿蜒的长龙，迎着朝霞向枣园出发了。

在这浩浩荡荡的队伍中，绝大多数都是从大后方和敌占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七·七事变”后，他们激于民族的危难，怀着一腔热血，跋山涉水，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来到革命的中心——延安，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动整风运动，清算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树立了党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以及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但是，在审干工作中，那个参加中央总学委领导的负责人，却背离了整风精神，继续推行王明的一套，搞了个所谓“抢救运动”，把从大后方和沦陷区来的大批青年干部，都打成了“派进来的特务”或“红旗党分子”。他们有的被关禁闭，有的遭受轮番



1942年3月时的毛泽东

围攻,有的还被送往中央社会部拘留审查。幸亏毛泽东同志及时发现这一严重错误,提出反对逼供信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才挽救了一大批革命同志。之后,尽管党组织做了一些善后工作,仍有许多同志始终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有的忧郁沉闷,有的怨气重重,好像初春的禾苗遭到一场冰雪的袭击,多么需要春风的抚慰和阳光的照耀啊!

队伍来到枣园崖畔下的场坪上停下来,围成了一个大圆圈儿。不一会儿,毛泽东同志头戴灰棉帽,身穿旧灰棉制服,微笑着健步走到场中央。他高声说道:“三局的同志今天到这里来给我拜年,现在我先给你们拜年!你们辛苦了!”话音未落,激起了全场一片热烈的掌声。毛泽东同志首先强调了通信工作的重要性,赞誉通信战士是“无名英雄”,勉励大家要安心和热爱技术工作。然后,渐渐把话题转到了“抢救运动”方面。

毛泽东同志说:你们当中有不少同志在运动中受了委屈,一些同志被戴错了帽子,大家有些怨气是不是?毛主席亲切的目光扫视着群众,

他接着说:抢救运动是把敌人的力量估计过大,把自己的力量估计小了。搞得草木皆兵,“特务”如麻,伤害了很多好同志。好在这是一场夜间演习,用的不是真枪实弹,用的是石灰包,夜间看不清楚,一时分不清敌我,打在身上留下几个石灰包印。天亮一看,原来打的是自己人,打错了。这时候,把石灰印拍掉,给你敬个礼,赔个不是:“同志,我打错你了!”毛泽东同志顿了顿,语气沉重地说:这个错误的责任不在哪个本单位的领导,

责任要由中央来负,主要由我来负,因为我是发号施令的。同志们,我这里给那些受了委屈的同志行个脱帽礼,向大家赔礼道歉了。

说到这里,毛泽东同志摘下帽子,伸出胳膊,环顾了一下大家,恭恭正正地行了个鞠躬礼。啊,领袖给战士脱帽鞠躬了,这是多么平凡的形象,多么磊落的胸怀,多么伟大的风度。此时此景,那些在“抢救运动”中受了打击和冤枉的同志,一个个热泪扑簌簌地夺眶而出。

毛泽东同志接着幽默地说:现在我把帽子拿下来了,赔一个不是,敬一个礼。那么受委屈的同志你怎么办呢?你应该还一个礼吧!你不还礼,我的帽子就只好老拿在手里。……

听着毛泽东同志这诙谐风趣的话语,场上的情绪立刻活跃起来,许多同志不由得会心地笑了。这时一股寒风吹来,拂起毛主席蓬松的头发,卷起场上的阵阵雪粉。许多同志不约而同地说:“请主席把帽子戴好吧!”

随着大家轻松的情绪,毛泽东同志戴好帽子,转而语调深沉地说:我们在整风审干工作中,得到了两条经验,一条经验就是取得了成

绩,另一条经验就是犯了错误。我们党在七八年中由九万发展到一百多万,有些坏人混了进来,不纯的分子混了进来。一方面确有特务,应采取严肃态度,从思想、组织上加以纯洁;另一方面,不是特务如麻,要实事求是,采取谨慎态度。不谨慎就要出乱子,就要冤枉自己的同志。我们党有一条规矩,叫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一切从实际出发,凡是做对了的,就要坚持;凡是做错了的,就要纠正。对所有戴错帽子的同志,都要向他们承认错误,赔一个不是。这是我们的进步,是我们全党的一个进步。中国革命要胜利,就要采取这种态度。……

毛泽东同志左手反叉着腰,右手有力地挥动着,那洪亮清楚的声音,像洪钟一样扣动着每个人的心弦。此时,一些从中央苏区长征过来的老通信战士,不禁回忆起在苏区肃反期间,王明推行一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路线,致使许多忠实勇敢的共产党员身陷囹圄,倒在自己队伍的旗帜之下,淹入冤屈悲忿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王明路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直到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掌握了中国革命的船舵,才使党转危为安,沿着马列主义的航道前进。1943年整风审干阶

段,毛泽东同志及时纠正了“抢救运动”扩大化的错误,才避免了重蹈王明路线的覆辙。现在,毛泽东同志又主动承担责任,对错误的本身作了中肯的分析,这是在革命道路上,以多少同志的鲜血和头颅换来的真理啊!

毛泽东同志环视了一下大家,往前踱了几步,又和蔼亲切地说:许多被错戴帽子的同志,最后证明没有什么问题,是经过锻炼考验的好干部。所有这些同志,你手中有理,理在你手里,你手里拿的东西叫做理。所以,你就要放下包袱,开动机器,轻装上阵。大敌当前,日本鬼子包围我们,胡宗南进攻我们,我们不能背着包袱跟敌人拚。因为背着包袱,手脚就很不灵便,跟敌人对打起来就会打不赢;反过来,如果把包袱放下来,轻装上阵,那就动作灵活,能使出全身武艺,就会打胜仗。……

毛泽东同志那生动形象的比喻和深入浅出的道理,就像温馨的春风,融化着枣园坡上的冰雪,驱散了积压在人们胸中的阴云。那些曾被错戴过帽子的同志,萎缩的心房里顿然像照进了和煦的阳光,长期埋在心底的忧郁、疑怨、彷徨的情绪,一下子全都烟消云散了。

秧歌扭起来了,高跷踩起来了,旱船跑起来了,悠扬的唢呐声划破了天空。当演到秧歌剧《夫妻识字》时,王净同志告诉毛主席,那个扮演婆姨的女演员,就是从大后方的知识青年,在运动中也曾成了被‘抢救’的对象,你看她今天表演得多好咧!”毛泽东同志听了,微笑着不住地点头,时而报以热烈的鼓掌。

节目演完了,毛泽东同志站在崖畔上,挥动着那宽厚的大手,豪迈有力地说:同志们,团结起来,共同为了革命的胜利而奋斗!这声音,像初春的雷鸣,震动着皑皑的山岗,回响在平坦的川野,鼓荡着每个人的心。



1942年5月,毛泽东与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

附:当年未发表的
《人民日报》短评

实事求是的 光辉典范

这篇革命回忆录,记述了毛泽东同志在1945年春节接见军委三局同志们时,为在“抢救运动”中受到打击迫害的同志脱帽鞠躬、赔礼道歉的故事。林彪“四人帮”的那个顾问对这次抢救运动发生的问题负主要责任。但作为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主动承担了责任,对错误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而且亲自给那些受了委屈的同志们行脱帽礼。这是多么地感人啊!毛泽东同志磊落的胸怀,伟大的气度,为全党树立了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在毛泽东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下,经过革命斗争的锤炼,我们党形成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保证了革命的胜利。但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我们党的这一优良传统受到了严重的破

坏,出现了大批冤假错案,许多党的优秀干部,包括一些久经考验的老干部,以及各条战线的群众,惨遭打击迫害,蒙受不白之冤,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这个教训是很沉痛的。

党的十一大以来,尤其是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妥善处理历史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坚决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使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恢复和发扬。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是一个很大的成绩。实践证明,这样做得民心,大得党心,大得党员之心,十分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方针。经过全党的努力,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固然已经取得很大成绩,但就全国范围来看,落实干部政策和其他有关人的政策的工作,发展并不平衡,许多地方和单位还剩下一些时间久、难度大的案件未作处理。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同心同德搞四化,各级党委要本着对党对人民极端负责的精神,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抓紧把这些问题解决好。被落实政策的本人,也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配合党组织弄清事实真相,历史地看待过去发生的问题,而不应提出过高的要求。只有这样,才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才有利于加强党内和人民内部的团结,共同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奋斗。

国家权威文学出版社主办刊物
全国惟一综合性大型文学选刊

《中华文学选刊》 (月刊)

从2000年起,本刊将由双月刊改为月刊。改为月刊后,本刊将调整栏目,充实内容,增大选择面,注重与作者和读者的交流与互动,使广大读者朋友得到更多的人生启示与情感共鸣。

△ 有奖征订:从明年起,本刊每万册订数内设特等奖10名,返还订费并奖《鲁迅全集》一套;一等50名,返还订费并奖世界名著珍藏本5部;二等奖100名,奖四部中国古典名著一套;三等奖1000名,奖人文版新出长篇小说一部。获奖名单本刊明年2月号公布。

本刊订价:每期5元,季价15元,半年价30元,
年价60元。

本刊邮发代号:82-497

《中华文学选刊》地址: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人民文学出版社

邮编:100705

电话:010-65255349

打扫家门： 新中国封闭妓院

● 白云涛

娼妓在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建国后，人民政府根据各地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坚决取缔了各地妓院。

北京市：千年毒瘤，一夜铲净

北京市的妓院主要集中在前门外的“八大胡同”，其中有著名的四大妓院老板，人称四大恶霸。

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3月，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北平市政府下发了对妓院进行管制的若干暂行规定。5月，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召集政府官员开会研究改造清理妓院问题。叶剑英指示：先把妓院情况调查清楚，然后决定如何处理。

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市民政局、公安局、妇联等单位联合对北平妓院进行调查，了解全市200多家妓院、妓女的情况。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和组织部长刘仁在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陪同下，亲自巡视前门八大胡同妓院区，了解到妓院中连13岁的妓女都染上了性病，更坚定了取缔妓院的决心。

1949年8月9日，北平市召开第一届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们提出了取缔妓院改造妓女的提案；9月19日，《北平市处理妓女办法（草案）》出台，指出：“先集中力量处理明娼，暗娼另行处理之。对妓女采取集中统一集训，分别处理的方针，对妓院老板和领家，采取取缔政策，除命令停业外，对于罪恶昭彰、伤害人命者依法惩处，对其敲诈剥削非法致富的财产，予以没收；对茶房、跟妈、伙计则一律遣散。”

《办法》一经颁发，市民政局、公安局、卫生局、企业局、人民法院共同组建了处理妓女委员会。

10月15日，上述单位又共同组建了封闭妓院总指挥部。公安部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罗瑞卿任总指挥。

11月21日下午，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召开了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晚5时30分，全体代表一致通过立即封闭全市一切妓院的决议案。新任市长聂荣臻庄严宣布：封闭妓院，立即执行！

晚6时整，行动指挥部分别命令妓院老板和领家集中到各公安分局实施拘留。

8时整，27个行动小组的二千四百多名公安纵队官兵和民警，分乘37辆大卡车，直奔各

妓院。

到次日凌晨5时许,全市224家妓院已全部封闭,集中拘留了424名老板和领家,收容了1286名妓女。经过审查,被暂时拘留的跟妈、茶房等大多都被释放。

此后,全国各地纷纷效仿北京的作法,开始了消灭娼妓制度的全面战斗。

天津:“寓禁于限,逐步消灭”

天津于1949年2月解放,比北京早解放一个月。天津一解放,市公安局就对全市妓院进行细致的调查工作。当时,天津市共有妓院448家,妓女两千多人,依靠妓院为生的茶房、跟妈等两万多人。

天津市解放后,各个妓院的老板和领家及妓女非常恐慌。市政府根据天津市的实际情况,决定采取暂不取缔,严格管理,促其逐步灭亡的方针。同时明令规定废除残暴的领家制度,严禁虐待妓女。

按照市政府的指示精神,市公安局在民政局、妇联等相关部门的配合下,对各家妓院均采取了步步紧逼,严格限制,迫其停业的措施。在积极鼓励妓女脱离妓院的同时,对每一个脱离

妓院的妓女都做了妥善的转业安排。

天津市政府“寓禁于限,逐步消灭”方针的实施,到1949年11月中旬,全市有114家妓院被迫停业,570名妓女脱离妓院,其中结婚的二百多人,回原籍的一百多人,做工学艺的五十多人,私逃的六十多人。

在北京市1949年11月21日一夜之间封闭全市妓院的消息传到天津后,天津市政府大张旗鼓地开展宣传教育攻势,一面命令公安机关加大对各个妓院的威逼限制,动员妓院老板转营其他行业,一面鼓励妓女跳出火坑重新做人,脱离妓院。

到1950年1月中旬,天津妓院又减少99家,妓女减少329人。其中有11家妓院被迫改为工厂和作坊,10家改营旅馆,4家改为住户。停业妓院的妓女中有148人结婚,140人回原籍,25人从事生产,16人等待安排新的职业。

1950年1月15日,天津市召开了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议明确指出对妓院进行“寓禁于限”的政策,最终目标是彻底消灭罪恶的娼妓制度。按照会议的要求,天津市公安局所属分局、派出所,分别召集妓院老板领家开会,指出妓院压榨和虐待妓女是有罪的,新中国是决不会允许妓院长期存在的,是要逐步取缔的,希望他们提高觉悟,不再干这害人的勾当。多数妓院老板领家表示相信政府,及早转业作其他经营。

在这同时,全市各种报纸电台纷纷发表文章和讲话,揭露妓院老板领家对妓女的欺凌和剥削,宣传广大妓女的悲惨境遇和非人生活,阐述人民政府对妓院的政策法令,声明人民政府坚决保护新中国妇女的地位和权利,坚决取缔妓院,把受压迫受剥削迫害的广大妓女解放出来。

在人民政府多方面进攻下,妓院大批停业倒闭。到



北京一个妓院的老板、老鸨和“皮条客”向被他们拐骗来的妇女交代干过的坏事

1950年3月底,全市妓院只剩下51家,截止到1950年底,妓女转业、回原籍、出嫁的已达1706人。

为了加速天津市娼妓业的灭亡,从1951年开始,配合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人民政府对娼妓业展开了毁灭性的打击。

1951年6月,各区相继召开控诉大会,觉悟了的妓女们勇敢地登上台,愤怒控诉反动恶霸妓院老板的罪恶。6月15日,在九区召开的一千五百余人参加的控诉大会,把妓女对妓院老板的控诉推向了高潮。妓女们字字血,声声泪,激起与会群众对反动恶霸妓院老板的极大愤慨。最后,受害妓女们宣读了她们用血和泪写的《联名控诉书》,强烈要求讨还血债,枪毙反动恶霸妓院老板,为死去的姐妹报仇,为社会除害。

在全市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天津市公安局在获得充分证据后,依法逮捕了一批恶霸妓院老板,并于1950年12月8日至1951年10月间,先后将恶贯满盈的数十名恶霸妓院老板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同时将他们压榨妓女所得财产全部没收。

人民政府镇压了恶霸妓院老板,使还在等

待观望的妓院老板心寒胆裂,纷纷要求歇业转业,尚未脱离妓院的妓女消除了对老板的恐惧,纷纷要求政府给予安置。抓住这一时机,公安机关同民政、妇联等部门配合,迅速帮助脱离妓院的妓女回原籍,或多方寻找门路,安置就业。到1952年5月底,天津市妓院和妓女完全绝迹,遗患天津六百多年的娼妓制度,终于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

上海:全面封闭,收容改造

旧上海曾经是世界大都市中娼妓人数最多的一个城市。日寇占领期间,允许烟赌娼公开营业,并划定当时的老闸、新成、嵩山等区为“风化区”,明文规定娼妓可以在马路上公开搭客,军警不得干涉。据汪伪上海市警察局1942年统计,有妓院三千九百余家,妓女3.9万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大员、达官贵人、富豪巨商、流氓大亨、美国水兵纷纷涌入上海,又刺激了娼妓业的发展,成为旧上海娼妓史上的全盛期。据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的统计,到1947年,“上海以卖笑为生者统计不下10万人,

间接赖生者且数倍之。”

上海解放以后,百废待兴,政府的主要任务是肃清残余敌人,建立革命秩序,恢复工业生产,对娼妓主要采取有计划有步骤的严格的治安行政管理,时机成熟之后,再一举禁绝。所以,陈毅市长指出:“妓女是生活在旧社会最底层的受苦人,新中国决不允许卖淫现象继续存在,我们不管有多大困难,也要解放妓女。但我们刚进上海,恐怕还不能马上解决妓女问题,只好让她们再受几年



新政府封闭妓院后,解放了的妇女在教养院里学跳秧歌舞

苦,不过,一定会解决的。”

为了严格管理,1949年6月,市公安局责令全市妓院登记,审核后发证。

7月,市公安局又进一步制定了《管理妓女院暂行规则》。

公安机关据此规则经常派干警突击检查,发现违反规定者,立即惩处,对妓院院主的违规行为惩罚尤其严厉。

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上海人民政府再次加大对妓院妓女的管理力度,迫使妓院生存越来越艰难。到1950年底妓院由522家缩减到156家,妓女由2227人缩减到559人。

1951年镇反运动轰轰烈烈展开,人民政府应广大人民群众要求,逮捕一百余名妓院恶霸,又迫使一批妓院破产。到同年11月,全市妓院只剩下72家,妓女只有181人。

严格管理和限制取得显著效果,全面封闭妓院的时机完全成熟,1951年11月中旬,中共上海市委发出《市委关于本市处置娼妓计划》,宣布妓院为非法,立即全面封闭妓院,集中收容娼妓。为妓女治愈性病,帮助妓女转业,保证妓女不转为私娼。

公开的妓院封闭之后,又着力解决数量较大的暗娼问题。11月25日晚9时,全市9个公安分局统一行动,在各游乐场、马路边收容暗娼320名。当晚11时,公安干警分路进入对抗政府法令继续营业的妓院,将妓院主、老鸨、龟奴全部逮捕,对妓院的财产全部封查。

上海市人民政府对收容妓女的教育改造方针是:“政治思想教育和劳动生产相结合,改造和安置工作相结合”。

从1951年11月到1958年,先后教育改造了7513名公开的妓女和街头的暗娼,并使得这七千多名阶级姐妹全部转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彻底铲除了旧上海的娼妓制度。

到1951年底,全国各地取缔娼妓工作基本结束。各地取缔娼妓的方式大同小异,北京、天津、上海是较典型的地区。

娼妓取缔工作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瞩目。上海妇女教养院从成立之日起就成了各国来宾了解中国改造妓女的窗口。仅在1956年,该妇女教养院就接待了美、英、法、西德、日本、印度、苏联、捷克等31个国家的101名来访者。来访者中,有的是政府官员,有的是社会学家,有的是警务人员,有的是记者、作家。这些人中,有的是慕名前来学习改造妓女经验的,有的是半信半疑前来了解真实情况的。他们参观这里的工厂、医务室、病房、宿舍,召开妓女座谈会。法国一位来访者认为,中国改造妓女的做法,不仅对法国,对整个欧洲都是有借鉴作用的。有个美国记者对“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标语颇感兴趣,在他访问了正在这里得到改造的褚玉英以后,对教养干部说:我感到你们真的做到了“把鬼变成人”。

(责任编辑 木 易)

欢迎订阅

邮发代号:4-557

《世纪》

中央文史研究馆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联合主办

2000年仍不涨价 定价:4元 全年订价:24元 半年订价:12元

1999年第5期要目(9月出版)

岭南画派大师关山月(世纪特稿)

新上海法制三十天(本刊专稿)

特别法庭的法律顾问袁邵恒(名流踪谱)

《人民日报》为《十五贯》刊发社论始末(文史拂尘)

蒋经国与斯大林的两次密谈(黑匣曝光)

刘湘两次解震助中共(国共舞台)

彭友善赠画美国总统杜鲁门(故人旧事)

贾植芳、胡守钧谈鲁迅(人间杂谈)

雷峰塔藏“金”之谜(笔记掌故)

文史综合性双月刊《世纪》“俯瞰百年风云变幻、透视人生荣辱沉浮”,充分凭借全国文史馆系统文史人才荟萃的优势,内容丰富,雅俗共赏;每期均有挖掘的第一手资料展示百年风云变幻的独家报道;以其“真实性、原创性、权威性和可保存性”赢得广大读者的青睐。国内外公开发行,大16开,内文64页,逢单月出版。欢迎您到当地邮局订阅。如订阅不便或错过邮订时间,本刊发行部随时为您办理邮购(不另收邮费)。

本刊地址:上海市复兴中路529号《世纪》杂志社

电话:(021)64740822 传真:64675768 邮编:200025

“穷过渡”的最后挣扎

——1977年11月“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的一段史实

● 陈大斌

1977年秋冬之间，当时的党中央、国务院主管农业的领导人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这是中国农村改革始发阶段的一个重要事件。在这次会议前后，围绕着我国农业是否要继续开展“学大寨”运动，突击搞“穷过渡”等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大辩论。

过去二十多年，直到去年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之时，在众多的纪念文章中，很少见到有人提及这一重要的历史事实。作为参加了这次座谈会的一名记者，我深深感到，要了解中国农村改革，这段史实是不能忽略，更不能遗忘的。

1977年中国农村形势十分严峻

粉碎“四人帮”之时，我国农村除了少数办得好的先进社队外，大多数社队温饱难以维持。相当数量的社队生产出的粮食养活不了自己，靠借债度日，外出逃荒讨饭的农民到处可见。

在农民们强烈要求实行联产责任制的皖北地区，在淮河两岸那些有名的穷县，如定远、凤阳、嘉山、泗县、五河、灵璧、固镇等县内多数社队已成空壳。农民形容自己的集体像个破草鞋：“烂了底，塌了帮，断了绊”，“提不起，更穿不得”了。我曾同嘉山县领导为这个县的集体经济算过两笔账：一是粮食，从1953年粮食统购统销

开始到1978年，25年中农村回销和城镇供应两项，共用去粮食15.4亿万斤，而同期向国家交、售两项共给国家粮食14.2亿斤，堂堂一个农业县，几十万农民干了25年，反而调进粮食1.2亿斤。

二是固定资产，从合作化到1978年底，全县三级所有的总值只有2503万元，而全县社队欠国家贷款1613万元，1969年以来国家无偿支持850万元，两项相抵，全县社队加起来只有40万元的固定资产，全县农民每人不到一元。如果再加上1957年以来发放的各种救济款990万元，全县干了二十年，社队集体资产是个负数。

凤阳等沿淮各县的情况与嘉山县类似，甚至更为严重。从凤阳往西是安徽的六安地区，北渡淮河是安徽的阜阳地区、宿县地区，再向北直到黄河岸边，是河南的商丘地区和山东的菏泽、济宁地区，这是一大片坦坦荡荡的大平原，也是一个很大的贫困地区，三省六个地区，几十个县近五千万人口，绝大多数生产队是“吃粮靠救济，生产靠贷款”。

再从菏泽北上，山东的聊城、德州、惠民、河北的衡水、沧州，这又是一个几十个县几千万人口的广大地区，情况与上述地区相差不多。

这是处于中国腹心地带的农村现状！

像这样的贫困地区全国还有多处，西北黄土高原（包括宁夏的西海固地区，陕北的延安，

榆林两地区多数县，甘肃的定西、平凉，加起来又是几十个县），贫困程度比中原地区更甚。如宁夏的固原地区人民公社三级固定资产不够抵偿债务。据1979年末统计，三级共有固定资产只有9111.8万元，而30年来国家给这个地区的各种无偿投资达二亿零六百余万元，加上各种救济款总计三亿多元，比固定资产高出二倍还多。

甘肃的定西地区的状况也同固原一样。通渭县，是这个地区第一号“困难户”。30年来，有22年总产低于1949年。以人均产粮计，1949年人均产粮723斤，1979年仅有327斤。

与西北黄土高原贫困地区状况相似的还有云贵高原上的大片石山地区。据新华社当时的报道，贵州全省粮食总产最高的1977年，比1957年只增长21.4%，而同期人口却增加了57.1%，全省每人平均占有粮食比20年前下降了22.8%，社员口粮水平下降了约1/5，年分配收入不足40元的生产队却高达40%以上。许多生产队无粮无钱，无电无机，有的连种籽也要国家支援或由社员凑集，维持简单再生产也有困难。

.....

这就是“十年浩劫”结束时中国农村的真实状况。形势十分严峻。

两张不同的药方

如何来医治这已经陷入深刻的危机的中国农村和中国农业呢？

当时，有两种不同的药方。

一种是安徽、四川等地区的做法。他们坚持实事求是从当时农村实际情况出发，从清理、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入手，纠正多年来的“左”的做法，让农业农民休养生息。

这方面动手最早、行动最为主动坚决、最早收到明显成效的是安徽省。

1977年6月，万里在危难之中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安徽，这个资源丰富的大省，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

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他跑遍了江淮大地，农民吃不饱，穿不暖，家徒四壁，使他受到很大刺激，他不能不问自己：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这是什么原因？这能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都没有啦？虽然，那时因为人民公社是上了宪法的，他不能乱说，不能公然否定，但他认准，必须从安徽的实际情况出发，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他们果断停止学大寨那一套“左”的做法，并于这年11月制订出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因为有六个方面的规定，又深得农民拥护，被人们简称农村“六条”。

与安徽情况相类似的还有四川。中共四川省委“抓纲治蜀”，在农村方面最重要的措施是：从1977年秋开始“全面清理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经过一个冬天的紧张工作，1978年伊始，中共四川省委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农村、农业的政策法规，其中有《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共十二条。与安徽一样，四川省也从抓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入手，发起对农业战线“左”的错误的清算。

给中国农业开出的第二个药方的是坚持“两个凡是”的一些人。

对中国农村形势和农业问题的看法，从当时的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到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陈永贵是完全一致的。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于毛泽东主席亲自倡导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召开的第一个大型全国性会议，就是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距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只有一年二个月的时间。在这次大会上，陈永贵在报告中给农村揭批“四人帮”定了“调”。他说，“‘四人帮’干扰破坏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罪行累累，铁证如山。他们反对大批修正主义，反对大批资本主义，反对大干社会主义，妄图砍掉大寨红旗。这个‘三反一砍’的要害，就是篡党夺权，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根据这个调门，他提

出今后农村工作的总体任务就是：“坚持大批修正主义，坚持大批资本主义，坚持大干社会主义，更高地举起农业学大寨的红旗，把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搞得更好。”

这样一来，本应触动的极“左”的错误没有触动，反而大大推动了“学大寨”运动。使“左”的错误变本加厉。据统计，1977年到大寨参观的人超过了“文革”高潮中的人数。

到了1977年秋冬之间，形势更加严峻。

这时的安徽、四川，从实际出发在认真地清理、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以实际行动开始批判、纠正农业战线上“左”的错误；而同时，在北京城里却在召开一次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通过这次座谈会的召开，布置全面推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以实际行动继续坚持“左”的错误。

两种截然相反的做法同时出现在中国人民的面前。是谁的药方开错了呢？

鼓动在全国农村 搞“穷过渡”的座谈会

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于1977年10月30日至11月18日在北京召开。称座谈会，其实规格很高，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会见了代表，听取了汇报，陈永贵等几位副总理亲自坐阵。出席的人员是各省市自治区主管农业的党委书记，还有一部分学大寨先进地市的代表和有名的“大寨县”的代表。

这个会的主题是继续推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主持者给会议提出的讨论问题共12个：一、加快农业发展速度问题；二、全面坚持大寨县六条标准；三、深入揭批“四人帮”，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四、整党整风问题；五、工作队问题；六、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七、人民公社的分配问题；八、所有制问题；九、农田基本建设问题；十、加强农业科学实验问题；十一、农业机械化问题；十二、加强领导，改进作风。

这12个方面的问题里，占最大比重的是深

入开展“学大寨”运动，大搞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方面的内容。比如第三项，揭批“四人帮”，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具体要求是把揭批“四人帮”斗争与“农业学大寨”运动结合起来，开展“一批两打”：“一批”就是揭批“四人帮”，“两打”就是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什么是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什么是资本主义势力进攻，又都没有明确的界线和标准。“农业学大寨”运动15年，整“五种人”（混进来的阶级敌人，被敌人拉下水的蜕化变质分子，热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老好人和民主派），斗“走资派”，还有“七斗八斗”再一次开展更广泛的阶级斗争。

其次是所谓整党整风问题。按照座谈会的思路就是要求学习昔阳把“大寨经验”推广到面上去的经验。这个经验的本质，如会议文件所说，中心是“下硬功夫，放手发动群众，揭开阶级斗争盖子，一个社队一个社队地整顿领导班子”。

十二项内容中最敏感的是竭力推广大寨那些违背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左”的做法。过去中央召开的“学大寨”会议，一般是推广大寨基本经验（主要是周总理讲的四条），反对推广大寨的“一整套具体经验”，而这一次则把那些过去不许向全国推广的东西列为会议重要内容，向全国普遍推行。

人们都还记得，1975年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前，陈永贵让在他身边负责文字工作的宋沙荫执笔代陈向毛泽东主席写了一份报告，报告说：“公社化到现在，已过了18年。主席发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也11年了。这中间，经过了文化大革命、批林整风、批林批孔，现在又开始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农村的形势是很好的。好就好在了广大群众的路线觉悟高了，干劲大了，干部的经验也多了，领导水平也高了。”报告还说“这也给我们出了新题目，可以做点新文章，我觉得有些事情该办了。”

陈永贵的“新文章”共有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条便是鼓吹“穷过渡”，他写道：人民公社的

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早一点向大队核算过渡好，还是晚一点过渡好？从昔阳的情况看，在人民公社化后的那一段时间，实行小队核算是完全对的。……后来经过几年的生产发展，情况有了变化，小队核算就不适应了。“近两年我跑过的地方，许多搞得好的大队，大都是大队核算。我同不少县以下的同志们讨论过，他们也认为，农业要大干快上，要缩小队与队之间的差别，实现大队核算势在必行。”

1975年秋天，为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做准备的宋沙荫还对新华社一位记者说，“我这次豁出去了，就是要把大寨一整套经验都插出去。”他要把大寨、昔阳包括“穷过渡”、取消自留地、取消集市贸易、“大寨工”等都写进大寨和昔阳的发言稿，借大会的讲坛向全国推开。只是因为邓小平、华国锋主持审定大会报告和主要发言时，不许他们讲这些内容才作罢。陈永贵壮志未酬，心中一直窝着火。

陈永贵坚持“左”的“一整套”，尤其是对“穷过渡”情有独钟。他说，“不搞穷过渡，等富了还过渡得成吗？”他念念不忘“过渡”，除了有他自己的理由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他深知，“一大二公”是毛泽东创办“人民公社”时的崇高理想，他要通过“公社”向共产主义“过渡”。可惜后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出了大问题，全国农村饿死那么多人，“公社”只好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上来。“公社”名存之，而“一大二公”的理想并未实现。

1977年，陈永贵曾设想把昔阳县全县的大队核算再提高一步，“过渡”到公社核算，真正实现毛泽东当年提出的“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然后再向县级统一核算“过渡”，建设第一个全民所有制的县。1977年5月23日，他在中共昔阳县委扩大会议上说：“想不想看一看全国第一个全民所有制的县呀？”“昔阳就是要冒这个险，冒这个尖。别人不敢不愿干的事，我们愿干这样革命的事！”

如今的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突出强调的便是在全国农村大搞“过渡”。座谈会的文件这样写道：“随着建设大寨县运动的普及和提

高，农田建设规模的逐步扩大，农业机械化进程的加快，公社、大队两级经济的壮大，将有越来越多的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能适应农业生产的发展，实现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大队的过渡，进一步发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是前进的方向，是大势所趋。”文件还明确提出“过渡”的任务、期限：“今后三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基本上完成向大队核算过渡，以便与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要求相适应。”

“穷过渡”受到强烈的抵制

座谈会马上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小组会上有了不同意见，有些意见还相当尖锐，会下敞开来谈时，反对“大寨经验”的呼声相当强烈，其焦点便是“过渡”问题。

那时，反对的同志还不敢从“理论”上否定“过渡”，只能从当前如何具体安排过渡上做文章，例如：

（一）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与当前农业发展到底是相适应，还是不相适应？

会议的文件上写道：“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将越来越不适应农业生产的发展”，那就是说，现在已经不相适应了。而更多的同志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当前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还是适应的。有的同志以提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华国锋1975年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总结报告中说：“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就全国多数地区来说，和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还是基本适应的”，怎么只过了两年就不适应了？两年来我国农业的生产力有什么样的根本性突破？客观条件有了什么飞跃性的发展？大家认为，这个“现阶段”绝不是指一年两年的短时间。要求会议文件上写明这个指导思想，防止“穷过渡”的发生。

有的同志强调说，这是一个对形势的基本估量的大问题。如果说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已不适应农业生产的发展，那么就必须立即组织过渡。但现在全国各地农村程度不同的受了“四人帮”的严重干扰破坏，急需整顿。就全国多

数地区来讲，大多数生产队实行过渡的紧迫性并不那么大，不具备条件，硬要过渡，那就要出现杀猪砍树，破坏生产力。有的同志主张：各地情况不同，条件千差万别，各级领导面对实际情况处理问题，不必强求一律。有的同志说，他们那里十年浩劫后，农村经济受到极大破坏，亟待解决的问题很多，对“过渡”的问题还没有思想准备。还有的同志说，对“穷过渡”，人人害怕，不能不引起注意。在这种情况下，靠谁去组织“过渡”？不少同志说，条件不成熟千万不要硬过渡，我们吃过“穷过渡”的亏，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二）要不要规定一个期限基本“过渡”完毕？会议文件上写“在今后三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基本上完成向大队核算过渡，以便和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要求相适应。”多数同志对此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三年也好，五年也罢，都是搞“一刀切”。一旦规定了期限，势必在全国造成一哄而起的现象，形成运动，那样就可能出现严重问题。现在各地领导精力正放在揭批“四人帮”上，各地条件也的确不一样，即使条件成熟的大队也有许多具体工作要做好做细才可过渡。不能要求限期完成，应该把主动权交给各地党委。总之，不要搞“一刀切”，一能搞“过渡”运动。对那些条件暂时不具备，不能马上实行过渡的，要给一个做工作、创造条件的时间，不应给人扣上“不愿过渡”的帽子，形成压力。

会议最后一天，华国锋等中央领导接见各省带队的负责人，我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见。农业部负责人作简略汇报后，华国锋讲话。他除了强调抓纲治国、批判四人帮、加快农业发展之外，也谈到“过渡”问题。他的态度比陈永贵等要缓和一些，比会议文件后退了一步。他虽然仍然坚持要搞过渡，但主张“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就全国多数地区来说，它和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还是基本适应的”这几句话，文件上还是要写上。他说，这对于不具备过渡条件的队，是个安民告示。不要引起杀猪、砍树，这是毛主席说过的。经积极工作，因势利导，成熟一个，过渡一个，成熟一批，过渡一批，

不要限定期限。各省情况不同。搞不好大家就赶时间，带来副作用。条件成熟了，就过渡，在过渡后，一定时间承认队与队之间的差别，这很重要。既是积极的，又是稳妥的，不会带来大的波动。这些是你们这次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

但是，会后在中发1977年49号文件转发会议的“汇报提纲”时，还是强调要搞“过渡”，并规定了时限：“今冬明春可以再选择一部分条件好的大队，例如百分之十左右，先行过渡。”

然而，对“穷过渡”各地大都采取了抵制或消极应付的态度。

1977年49号文件发出后，陈永贵等希望的全国性的“过渡高潮”没有出现。到底已是1977年而不是1955年了，那年秋天毛泽东一通谈话，一篇文章，全国农业合作化便出现高潮，一个冬天全国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而1977年的冬天里，只有少数几个省“紧跟”，用“左”的办法逼着农民敲锣打鼓舞动红旗搞“过渡”，热闹了一小阵。

据原农林部1978年4月22日整理的材料：《目前农村工作中几个值得注意的政策问题》所载，“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之后，全国农村“过渡”的情况如下：

“1975年以来，在中央召开的12省省委书记座谈会，两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和去年的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上，先后讨论了向大队核算过渡的问题，指明了发展的前景。这样，向大队核算过渡实际上已提到各级党委的工作日程，干部群众议论也比较多。但是认识上不尽一致，各地工作部署上也有很大差别。去冬今春，在贯彻执行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精神时，对过渡问题多数省强调稳妥，先搞试点，有的只安排了调查研究；只有山西、陕西、湖北、北京等省、市搞了成批过渡。”

这份文件还归纳了认识不同的几个主要问题：

首先，对于向大队核算过渡应具备的条件，有不同理解。多数地方赞成去年中央49号文件规定的三条。但山西省和陕西省的领导同志强调领导班子的条件，山西省的领导同志认为，班

子好、生产需要、群众要求就可以过渡。陕西省委书记姜一同志说：“班子好就行，班子不好可以调整”；“富了再过渡，要等到什么时候？”与此相反，有些地方强调经济条件。有的同志主张“要把经济条件放在上边”。认为，虽然有的大队家底不厚也过渡了，但这“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产生的，不能以此推断过渡不要条件”。今年以来，一些报刊载文，也从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说明过渡的经济条件是决定性的，并且批驳了“穷过渡”的主张。

其次，对于目前大多数地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体制是否适应，在估计上有不同。山西省在普及大寨县工作会议纪要中指出：“这种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制度，越来越不适应各方面的要求，势必妨碍生产力的发展，要大干，要大变，就得搞过渡”。省委书记王庭栋同志在省的电话会议上批评了那种过渡要“冷一冷”的说法，主张要“热”。去冬今春，陕西省长安县过渡加并队搞了百分之八十二。县委认为，“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很不适应社会主义大农业的要求”，有“十个不利”。与此相反，多数地方赞成现有体制“基本适应”的估计。如山东的同志说：“不应过高估计当前生产关系不适应高速度发展生产力的一面，山东许多生产上的快的地方，农田基本建设规模大，并不是搞了过渡的，目前不过渡，对机械化、社队办企业、科学种田等，也不会有大妨碍”。

再次，在过渡的时间、步骤上，很多同志不主张限时间、派指标。但从规定和设想来看，山西计划在1980年前分三个冬春全省过渡完。湖北也认为过渡的时间要与1980年基本上实现机械化相适应。陕西省委书记姜一同志认为“现在应当迅速搞过渡，掀高潮”。

总之，积极搞“过渡”的只有山西、陕西、湖北、北京等少数几个地方。安徽、四川等地继续抓清理、落实政策。

我们感到幸运的是，1977年的冬天没有搞起一个全国规模的“过渡”热潮，灾难终于没有发生。

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不仅没能在全国农

村掀起“过渡”热潮，而且产生了与会议主持者的期望完全相反的效果。它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原来，“学大寨”运动是这样严重地、现实地威胁着农村形势向好的方向发展。说什么“四人帮”对农村的破坏是“三反一砍”，完全不着边际。“四人帮”本是以“批修”、“批资”起家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政治口号，怎么可能反对批资批修？这种提法，掩盖“四人帮”“左”的实质，根本揭批不到“要害”，解决不了农村的问题，而且会把农村推向更“左”的深渊。“农业学大寨”运动正在极力对抗党的农村政策，现实地、严重地威胁着农村形势，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

人们逐渐觉悟到，用“大寨经验”，用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办法，治不了中国农业的病；认识到，只有从实际出发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才是农村工作的当务之急；人们对安徽、四川等地方清理、落实政策的行动寄予更大的希望。就在这次座谈会之后，陈永贵眼看“穷过渡”搞不成，急得到处骂人，对安徽等省落实政策的工作进行攻击，说人家“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复辟资本主义”，“反对学大寨”。万里听了这些话之后，态度鲜明地说，我们没有大寨那样的条件。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没有阳关道好走，只好走“独木桥”。你不要强加于我们，我们也不强加于你们，谁是谁非，实践会作出公正结论来的。

万里是最早站出来公开批判大寨“左”的错误的。他说，你说你是大寨经验，我说你是极“左”的样板。我们学不了他们，也不想学他们。万里还公开宣布安徽省不再组织去大寨参观，也不去学大寨那一套。他要求全省各级干部必须从自己的实际出发，从自己的现有条件出发做好工作。

正因为他有了这样明确、坚决的态度，才有后来的安徽农村的大好形势，才在全国农村批判“左”倾错误，落实党的政策，实行改革方面，起到了带头作用。

（责任编辑 洛松）

阎锡山从联共抗日到联日反共

● 陈应谦



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时的阎锡山

“在三颗鸡蛋上跳舞”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2月,红军东渡抗日。阎锡山任命第三十四军军长杨爱源为总指挥,把晋绥军所有七个师的兵力编为四个纵队,沿黄河一线设防阻击。在第一阶段战斗中,关上村一战,晋军周原健全军覆没。阎锡山大吃一惊,深感红军的强大,绝非山西一省的力量所能抗拒,便急忙电请蒋介石派兵增援。蒋介石早想把他的势力伸向山西,便立即答应阎的请求,迅速派嫡系部队第十三军汤恩伯部、关麟征所属第二十五师孔令恂部、李仙洲部,经陇海路输送到豫西,由通晋的各渡口过黄河入晋,沿同蒲路北上进援。另派三十二军商震部由正太路开到晋中,增强保卫太原的力量,当时号称15万“中央大军入晋作战”,以壮声势,并在太原成立了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由陈诚任总指挥,调度一切,负责“剿办”。中国共产党为了避免内战扩大,回师陕北,并于5月5日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号召全国各界人士和国民党政府,不分男女老幼联合起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组成对内团结、对外一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但蒋介石的军队仍赖在山西不走,企图趁机削弱阎锡山的势力,并进而待机把阎挤出山西。这时,对阎锡山最大的、最直接的、最现实的威胁,莫过于蒋介石在山西的驻军了。

拿阎锡山自己的话来说,他当时“在三颗鸡

蛋上跳舞,哪一颗也不能踩破”。所谓“在三颗鸡蛋上跳舞”,就是说和走钢丝绳一样,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危险。所谓“哪一颗也不能踩破”,就是说他哪一方也惹不起,哪一方也要反对,但又对哪一方也得应付一下,搞点关系。他为了求得自身的“存在与发展”,不得不与共产党以及进步人士进行一定限度的合作和采用一些共产党的口号。为了争取得到共产党的支持,阎锡山曾表示说,只要红军能撤回陕北,他就要使蒋介石的中央军离开山西。他答应共产党可以派代表、带电台到太原谈判。阎认为只要他能打出“联共抗日”的招牌,取得共产党对他的支持,就既可以利用共产党的力量与威信,动员群众来对日作战,暂保他的全部财产,又可以逼迫蒋介石不敢对他的“内政”进行干涉。不过,他这时采取的策略,其实质却是:既要联共,又要在暗中防共、反共;既要抗日,又要在暗中和日、亲日;既怕蒋、拒蒋,又要依靠蒋。基于这种态度,阎锡山先于蒋介石提出了“守土抗战”、“牺牲救国”的口号,于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日,在太原海子边(今儿童公园)召开万人大会,向公众宣布,“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正式成立,对全国震动很大,博得了各阶层进步人士的支持和好评。

牺盟会成立后,虽然在群众中影响很大,号召力很强,报名参加的人也很多,但由于阎锡山的军政上层人物竭力反对,受到的阻力也很大,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开展。

为了通过牺盟会发展自己的势力，阎锡山特请薄一波回晋。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10月下旬，薄奉中国共产党中央指示，从北平回到太原，以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的名义，到牺盟会任常务秘书，主持牺盟会的日常工作。从此，牺盟会得到了大发展，统战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发展起来。

会见周恩来和朱德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发出通电，号召“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制日寇的侵略！”全国人民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一致要求对日作战。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交了《国共合作宣言》，希望由国民党方面新闻机关早日发表，并派周恩来等同国民政府谈判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呼吁下，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的各党派第二次谈话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宣布对日抗战，宣称“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并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

9月下旬，国民党公布了国共合作宣言，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这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

为了联合阎锡山共同抗日，中共中央先后派彭雪枫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邓小平、徐向前、程子华、南汉宸等来到山西，同阎锡山商谈合作抗日事宜。当周恩来等到达风陵渡后，阎派梁化之带专列前去迎接。9月4日到太原后，在火车站举行了欢迎仪式，又奏军乐，又检阅仪仗队，非常隆重。周恩来在太原先和赵戴文、梁化之进行了接触，后到太和岭行营，同阎锡山直接谈判，提出在二战区的范围内，成立有共产党八路军代表参加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总动员委员会的建议。阎锡山根据当时紧迫的形势，表示同意在他控制下，在一定程度上发动人民群众，参加抗战，支援战争。双方就成立战动总

会一事达成协议。9月20日，第二战区战动总会在太原宣告成立。

9月18日（农历八月十四日）上午8点半，八路军总部在侯马举行了抗日动员大会后，由朱德等率领，乘火车北上。经太原、忻州、定襄，于下午4点30分到达河边村。总部首长除朱德外，还有左权、任弼时、黄克诚（保卫部长）、傅钟（民运部长）等。

八路军在河边村火车站下车后，受到河边人民的热烈欢迎，阎府也专门派人到火车站迎接。当时，阎锡山正在村里小住，朱德便前往“东花园”会见阎锡山。阎锡山以上宾接待，双方就抗日事宜进行了商讨。随后，阎锡山设宴为朱德接风。

在晋北抗战前线

朱德和周恩来到五台后，由于大同已于9月13日失陷，日军主力正由冀晋边境的天镇、广灵向平型关扑来，企图抄袭雁门关后方，晋北前线与平汉前线的战局已迅速恶化。为了研究新的战略部署，更好地联合对敌，9月21日，周、朱二人到太和岭口再次会见了阎锡山。经过协商，对平型关的防守，双方约定：晋绥军负责坚守平型关正面，八路军隐蔽集结于两侧，待敌人进攻平型关时，前后夹击。方针决定后，各自进行准备。9月22日，朱德回到五台城，召开了一一五师连以上干部会议，对平型关战斗作了部署。根据部署，一一五师师部及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在副师长聂荣臻率领下，从五台县蒋坊村出发，日夜兼程，经龙泉关到了阜平，然后迂回敌后，23日夜里到平型关附近的上寨村待命。彭德怀率电台工作人员驱车直上金阁岭，住在金阁寺，二线指挥作战。25日，八路军和晋绥军在平型关歼灭日军板垣师团1000余人，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威震中外，有力地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梦呓，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

平型关战役后，日军不敢向平型关正面进攻，被迫改变战略，由进犯大同的日本关东军南下浑源，迂回于雁门关与平型关之间的茹越口，

发动猛攻，以策应陷于窘境中的第五师团。接着，日军又占领了铁甲岭，29日夜間，占领了繁峙城。

在这关键时刻，阎锡山对形势作了悲观的估计，于30日深夜，在砂河南边的一个村子里，召开了军事会议，阎锡山命令前线各路大军，向五台山、云中山、芦芽山转移，集中主力于忻县、忻口之间，以保卫太原。雁门关方面，由行营参谋长朱绶光代阎下令撤退。

10月1日，阎锡山为了向山西人民“交账”，一方面把牺盟会的几个领导人叫去，说：“现在我要革命了。”给牺盟会发了5000枝枪。另一方面，于10月3日在绥靖公署组织了高级军事法庭，亲自审讯了在天镇作战不力的晋绥军第十一军军长李服膺，随后处以死刑，使晋绥军不敢继续后退。加上中央军开进山西，八路军迂回敌人侧翼，协同作战，于是他又壮大了胆子，和黄绍竑（字季宽，广西容县人，当时任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娘子关前线总指挥）、卫立煌、傅作义、周恩来等在太原绥署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在忻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会战。

忻口战役一开始就十分激烈。日军在飞机的俯冲、扫射和猛烈的炮火、机枪、坦克掩护下，在争夺忻口西侧的南怀化时，整营整连地反复向我军前沿阵地猛扑。等敌人进至几十米时，我军阵地手榴弹齐发，战士们从战壕里冲出来，追击溃退下去的敌人，敌人死伤甚众。敌人无数次的冲击，都被我军打垮。在左翼的大白水村，敌我各占一半，展开了连续的肉搏战，日军虽多次增援反扑，均遭我军痛击，最后仍未攻占全村。

忻口战役中，守军寸土必争。军长郝梦龄在火线指挥，被敌人炮弹击中，光荣殉职。官兵牺牲者不下万余，负伤者也在两万以上。战斗最激烈时，在正面二里宽的战线上，从拂晓至黄昏，一天竟损失了10个团。但我军愈战愈勇，置生死于度外，或坚守阵地，或支援友军，为民族生存，奋力杀敌。经过23天的英勇战斗，日军受到严重打击，死伤万人左右。日军著名的板垣师团一筹莫展，被阻在忻口阵地前，不能前进一步。日军无法取胜，曾被迫作向北撤退的准备。

八路军配合正面作战，一二〇师七一一六团

于10月18日，在雁门关伏击日军，歼敌一部。

10月19日，八路军总部指挥一二九师七六九团深入敌人侧后，袭击了代县以南的阳明堡敌人飞机场，烧毁敌军飞机24架。

日军为了策应忻口战役，由石家庄派兵进攻娘子关。我守军坚守半个多月，敌迂回至后方，守军被迫于10月26日撤退。日军沿阳泉、寿阳向榆次进军，威胁太原，阎锡山见状，急忙调傅作义率三十五军防守太原，接着又发电报，要卫立煌率领守忻口的大军火速向太原方向撤退。卫立煌没办法，只好命令忻口全线主动后撤，忻口战役遂告结束。忻口战役从10月11日开始，到11月2日结束，前后共23天，成为华北抗战初期最激烈的战役，也是历时最久、伤亡最大的一次战役。

在忻口战役期间，阎锡山和杨爱源、孙楚等人，每日下午7时许，乘坐小车，亲临前线坐镇，并调遣一个宪兵大队，随执法总监张培梅在前线督战。

忻口战役后，阎锡山曾作诗说：

忻口布阵得从容，全赖原平拒敌功，
假使娘关不失败，廿三何至任敌攻？

（《忻口战役》）

诗中颇多惋惜，而国内外舆论界则一致称赞，说忻口战役“是华北抗战数月中仅有的一次光荣战争……予敌人以严重打击，为民族增无限光荣。”（《西安文化报》）“忻口战役是华北抗战高潮的标志，是标志抗战前途的一个很有意义的吉兆”。（英国记者贝特兰《华北前线》）

联日反共

抗战前夕，由于日军步步紧逼，迫于形势，阎锡山为求得自身的“存在与发展”，不得不改变策略，变“防共反共”为“联共抗日”，与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合作，希望利用共产党的力量与威信，动员群众对日作战，以维持其政权。但形势的发展，远远超过了他的估计。抗战初期，短短几个月，使他的十几万旧军队，丧失了70%，手

会临时代表大会，积极进行反共部署。12月1日，命令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十九军军长王靖国和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六十一军军长陈长捷，与日军东西夹击驻在晋西隰县、孝义一带的决死二纵队。与此同时，又命令孙楚、赵承绶在晋东南和晋西北向决死队、八路军及所有新军和牺盟会发动了全面进攻，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十二月事变”。

十二月事变后，革命力量在自卫反击的同时，考虑到敌当前，需要采取克制的态度，尽量不使事态扩大；中国共产党也把十二月事变当做山西新旧军之争来处理，给阎锡山留了回头的余地，争取他继续留在抗日阵营里，不至于公开投降日军。为此，周恩来给阎锡山写信，劝其继续走团结抗战的道路。新军将领续范亭也给阎锡山写信，表明新军继续拥护他领导抗战。但阎锡山决心联合日军对付共产党，消灭抗日革命力量，保持并扩大其势力。这时的侵华日军由于在我国抗战军民的严重打击下，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迷梦早已破灭，困难日益加深，已经陷入持久战的汪洋大海之中。于是，开始制造所谓的“和平”，企图采用诱降的手段灭亡中国。阎锡山一贯亲日反共，本来就是侵华日军诱降的对象。早在太原沦陷不久，伪省长苏体仁就秉承日军的意旨，授意伪省公署秘书曲宪纯（阎锡山的表侄）找阎宜亭（阎锡山的族侄，太原西羊市晋恒木厂商人），到晋西向阎锡山面交苏体仁的信件，告知日军愿和阎锡山“亲善合作”，不再以兵戎相见。阎当即复信，表示愿意与日军“合作防共”。十二月事变后，阎锡山既然决心反共，更是日军拉拢他投降的大好时机。于是在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初，日军派汉奸白太冲（孝义县白壁关人，原为阎政权区长，投敌后阎委为二战区长官部少将参议兼平遥县长、敌区工作团团长）将日军参谋长田中隆光和伪省长苏体仁的信件送给阎锡山。阎锡山复信愿与日军合作，共同剿共，以确保山西治安。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11月间，经过白太冲半年的奔波拉拢之后，阎锡山又派赵承绶到孝义县白壁关，按照阎指示的“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的四项原则，与日军

驻山西军第一军参谋长楠山秀吉及苏体仁、梁上椿会晤，并进行谈判。赵提出：阎要求日方为其装备30个团，所有兵员、武器、食粮、经费均由日方负责。经洽商，达成初步协议。不久，日军把孝义县的兑九峪、胡家窑、高阳镇等据点，让给阎锡山。从此，阎、日间的接触更加频繁。

1941年（民国三十年）3月，阎锡山再次派赵承绶到白壁关与日军驻汾阳若松旅团的宫内参谋会谈。口头商定：阎、日双方要消除敌对行为，互相提携，共同防共。离（石）军（渡）公路以北地区，对共军的进剿由日军负责；离军公路以南和汾阳、孝义以西地区，由阎军负责。必要时，双方实行“会剿”。6月，日军从孝义县城撤出，交阎军接管。这期间，刘迪吉、苏体仁、梁上椿等继续与日军谈判，达成基本协定。8月11日，阎锡山派赵承绶为“全权代表”去汾阳，代其签署正式协定，地点在汾阳城内日军若松旅团司令部屋顶花园。

《汾阳协定》内容很具体，共20条。主要有：①阎、日取消敌对行为，共同防共；②日方先给阎装备50个团，拨发步枪五万枝，机枪五千挺，以便消灭共产党；③阎通电脱离蒋政府，发表“独立宣言”。先进驻孝义，待日方将晋中府十县政权交阎方接管后，进驻太原；接管雁门以南政权，扩充力量后，再进驻北京；日方将华北政权交阎方接管后，组织“华北国”。

同年10月1日，阎又派赵承绶到太原，与日方研究履行《汾阳协定》的细则。决定在太原、汾阳、临汾成立办事处，以便双方联络，并交换情报与物资。太原办事处的负责人是梁缜武（阎锡山的五妹夫）、曲宪南（阎锡山的表侄）、刘迪吉、齐骏鸣、贾锡九等。梁负责政治，曲负责交换物资，齐、贾二人共负军事。各办事处成立后，双方物资频繁交换，关系越加密切。阎锡山则积极准备回太原。这时，阎、日勾结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蒋介石为了维持其“抗战”的局面，派军令部长徐永昌、铨叙部长贾景德到晋西，劝阻阎锡山，并答应解决山西的困难。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的王世英也会见了阎锡山，抓住阎投降的危机问题，对时局作了详细、透彻的分析，使阎不得不在联日的同时，静观时局的变化，等待美、

日和谈的结局，看一看日本将要南下太平洋还是北攻苏联。不久(12月1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成功。接着，太平洋战争爆发。阎锡山大吃一惊，只好改变态度，由积极投降改变为等待观望，对《汾阳协定》的履行，也暂时停止下来。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4月，日军因勾结阎锡山的工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便再次派梁上椿到克难坡，邀请阎锡山亲自到太原谈判。随后，又经过梁继武、刘迪吉等人一个多月的往返磋商，最后阎锡山同意亲自在吉县安平村与日军举行会议。会议决定在5月6日举行(后来把这次会议叫“安平会议”)。

安平村有107户人家，是山区的一个大村庄，在吉县城南，为阎军前哨阵地。村南隔一条沟，为日军防地，双方隔沟相峙。

会议内容，在阎锡山方面为：(一)申述亚洲同盟与中日两国之利益；(二)在彼此相需要的合理条件内进行合作，等等。在日军方面为：(一)强调东亚共荣圈的胜利，促阎早日投降；(二)向阎提出“党书”，促其通电脱离蒋政权，等等。阎锡山对日方提出的问题，以一切准备尚未完成作为借口，表示通电脱离蒋政权和向日投降，须再加考虑。因为会议气氛十分紧张，时间已到十二点，双方“暂时休会”，共进午餐。阎锡山举行宴会，招待日本山西派遣军司令官岩松等

人。饭后，各自回到休息室休息。这时，杨贞吉得到报告，发现在日本人来的路上，有许多骡马向安平村前进。杨立即报告了阎锡山。阎锡山听后，认为这是日本人在会议上没有达到目的，要用武力相威胁，便搓手摇头，十分惊惶，决定逃走。下午，继续开会时，岩松等进入会场，一直等不来阎锡山。赵承绶明知阎已逃跑，却假意到阎休息室去催。回来说：“长官已经走了。”岩松等十分气愤，向赵承绶说：“你们长官太无礼了，我们会给他惩罚的。”于是，会议宣告结束。

安平会议后，双方来往虽然一度停止，但阎锡山联日反共的思想没有改变。他让梁继武、刘迪吉等仍返太原办事处，继续与日军联系。以后，彼此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多项合作。比如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阎锡山依照与日军商定的办法，由伪政权委任阎派到太原的干部担任日伪干部。让靳瑞萱当了伪山西省卫生局局长，李畅生当了伪五台县县长，刘香当了伪五台县保安团团团长，等等。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8月14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为了利用日军力量，抢夺地盘，抢占太原，继续反共反人民，8月17日，阎锡山派赵承绶到太原，会见日本山西派遣军司令官澄田，命令日军继续在原防区防堵共产党，听候阎锡山军队接受投降。共产党如抢占太

原，则由阎、日双方军队共同负责，日军负主要责任。随后，阎锡山派军队陆续到达太原郊区的小店镇，一部分军队到皇后园、黄寨和西山一带“扫荡”后，分驻新城和许坦，一部分驻在小店镇附近地区。8月30日，阎锡山在日军的迎接下，回到太原。

(责任编辑 吴思)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当局的反共分裂活动

毛泽东、吴晗与《朱元璋传》

● 苏双碧

《朱元璋传》是吴晗的代表作，解放前和解放后的版本毛泽东都看过，并且多次提出意见。平心而论，一部普通的历史著作，引起毛泽东如此关注，在毛泽东的历史上并不多见。但是，大约也正因为如此，在新中国成立后，吴晗对《朱元璋传》的修改倾注大量心血，并抱着十分慎重的态度，以至于1954年的修改本，在听了意见之后，也未敢出版。当然，毛泽东所提的意见，绝不会只是枝节性的具体意见，而吴晗所能虚心接受和理解的也未必是毛泽东的本意。下面想就吴晗写作《朱元璋传》的过程，以及毛泽东对《朱元璋传》的关心，略作论述。

吴晗初写朱元璋

明史专家吴晗对于朱元璋研究的重视，是可想而知的。早在1943年，他就写成了《由僧钵到皇权》一书，并于1944年由重庆在创出版社出版。此书印制期间，又收到潘公展、邸维廉主编的《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的征稿，约他写一部《明太祖》，还要附一个内容相应的年表。吴晗原不肯接受，由于朋友的多方劝说，才决定由夫人袁震写一部四万字的《明太祖》。谁知袁震的稿子寄出后，出版商说已登了广告，作者只能是吴晗。出版商将错就错，废了袁震稿子，重排吴晗《由僧钵到皇权》的稿子，书名改为《明太祖》。

至于为什么吴晗要写《由僧钵到皇权》（又名《明太祖》）这本书，1946年吴晗在《〈明太祖〉和〈由僧钵到皇权〉》一文中作了这样的说明：“在叙永分校来回路费弄得倾家荡产之后，家乡沦陷了。老母弱妹衣物荡然，无以为生。加以物价天天在涨，实在没有办法支持下去了。”刚好，被称为“战国策派”的林同济从重庆来到昆明，约吴晗写《由僧钵到皇权》一书，讲定稿酬一万元，分三期付款，第一期可以预支三千元。吴晗说：“一万元在那时候是一个大数目，抵得上半年多的薪水，于是不得不欣然同意了。”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吴晗在1964年写的《朱元璋传·序言》中说的：“由于当时对反动统治蒋介石集团的痛恨，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虽然一方面不得不肯定历史上朱

元璋应有的地位,另一方面却又指桑骂槐,给历史上较为突出的封建皇帝朱元璋以过分的斥责,不完全切合实际的评价。”上面是吴晗对写《由僧钵到皇权》两个动机的说法。

《由僧钵到皇权》全书分为“流浪青年”、“从士兵到元帅”、“开国皇帝”、“恐怖政治”、“家庭生活”五章。这本书的特点是通俗、易懂、生动。但当时处在战争年代,能参考的书籍太少,连过去读过的《明太祖实录》、《皇明祖训》、《大诰》等书也无法找到,甚至像郎瑛《七修类稿》一类的普通书也找不到,在这种史料紧缺的条件下,要写成一本内容充实的明太祖朱元璋的传,当然是不可能的。不过,吴晗毕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他凭着不多的普通书籍,以及自己写过的有关明史的论文,平时积累的读书卡片等等,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写成《由僧钵到皇权》一书。由于他文笔生动、善于取材,这本书读起来还颇能引人入胜,不失为一本好的通俗读物。

毛泽东审读了《朱元璋传》

《由僧钵到皇权》和《明太祖》由于是二名一书,加上缺乏科学性,有些内容不够实事求是。这对于严谨的史学家吴晗来说,总感到心有愧疚。1946年复员北平以后,便决定着手写作《朱元璋传》。他说,“改写的目的,是为和作废了的初稿《明太祖》和《由僧钵到皇权》有所区别。个人感情对前两本书实在太坏,简直在痛恨。”吴晗从1947年开始重写,1948年写成。这时候的吴晗已经不仅是一位学者,而且是一名革命战士了,新写成的《朱元璋传》,尽管在史料和理论分析方面都比过去加强,但在当时形势的影响下,影射蒋介石也比过去更为自觉,更为激烈了。在章目上,把“流浪汉”的标题改为“小流氓”;相应的如“诛杀功臣”、“搞特务统治”、“兴文字狱”等写得更为有声有色。总之,突出一个暴君的形象,从流氓到暴君,这当然是借古讽今的表现手法。

1948年《朱元璋传》完稿后,吴晗将稿本带到石家庄解放区,并呈送毛泽东。毛泽东精通文



建国前的吴晗

史,对朱元璋这个人物的评价尤寄予特别关注。他在百忙中,认真地审读了吴晗的《朱元璋传》,不仅在会见吴晗时,说了一些具体的意见,而且在史学方法论上也提出了分量很重的意见。

毛泽东当面谈的具体意见中,突出的一例是关于对农民起义领袖彭莹玉(人称彭和尚)的描述。吴晗在《朱元璋传》中说:“彭莹玉可以说是典型的职业革命家,革命是一生志气,勤勤恳恳播种、施肥、浇水、拔草。失败了,研究失败的教训,从头做起,决不居功,决不肯占有新播种的果实。第一次起义称王的是周子旺,第二次作皇帝的是徐寿辉,虽然谁都知道西系红军是彭和尚搞的,彭祖师的名字会吓破元朝官吏的胆,但是起义成功以后,就烟一样消散了,回到人民中间去了。任何场所,以至记载上,再找不到这个人的名字了。”吴晗赞扬彭莹玉是“功成不居”,不是为做官而革命的。这反映了吴晗本人的思想,他本人就是想在革命成功之后,回到平

静的书斋生活中去。

毛泽东读到上述有关彭莹玉功成不居的文字,大不以为然,他当面向吴晗指出:

像彭和尚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有逃避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

毛泽东在退还《朱元璋传》稿本时,还特地给吴晗写了一信。信中未再涉及任何具体意见,而是着重谈到了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全文如下:

辰伯先生: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谨致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四日

这封信对《朱元璋传》是赞扬多些,还是批评多些,多年来不少读者,包括吴晗本人在内都以为是对《朱元璋传》作了很高的评价。其实未必。细细研读这封信,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信中主要谈了两点:一是赞扬作者“用力甚勤,发掘甚广;”二是批评吴晗“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前面的赞扬是指作者的功力,未涉及到观点;而后面的批评是从宏观角度上提出问题的,毛泽东虽然没有举出具体例子,但却可以从许多方面进行理解,例如,对朱元璋的总体评价、对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对朱元璋为巩固政权搞特务统治、搞诛杀功臣、搞文字狱的指责等等。

只是因为吴晗当时是毛泽东的客人,座上宾,是被邀请来参加新政协的,有些意见不便提得过于直接、过于尖锐罢了。

可惜吴晗对于毛泽东的意见,始终没有理

解好,或者说始终有个错觉,以为彭和尚问题和历史观问题是一回事。他回到北平,便发愤重新读书,果然发现了过去所没有注意的史料,彭莹玉是战斗到底,被元军杀害的。发现这条史料,吴晗很高兴。1950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的文章,其中谈到在石家庄毛泽东约他谈了一个晚上,“特别指出彭和尚这一条,给了我极深刻的阶级教育,挖出我思想中的毒瘤,建立了我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到1965年版的《朱元璋传·序言》中还谈到毛泽东批评过的彭莹玉“功成身退”的问题,并说“这个错误观点,在理论上得到启发,我承认了错误”。

其实,彭莹玉功成身退的问题,是个具体问题,即主要是史料问题,彭莹玉在杭州被元军所杀的史料一发现,便迎刃而解了。问题是吴晗自己也有“功成身退”的思想,所以对彭莹玉的“功成身退”大加赞赏。而1948年冬,革命战争形势有了很大发展,新政权的建立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革命正在用人之际,从政治角度看,毛泽东当然不会赞成吴晗称许“功成身退”的思想。从这点说,毛泽东有关彭莹玉“功成身退”说法的批评,确实是对吴晗的教育,吴晗检查了自己的“超阶级”观点,也是从这个角度讲的。

吴晗对于毛泽东关于历史观的宏观批评,或则不知所指,或则以为只是指彭莹玉的问题。这可以从他由石家庄回到北平,直到在对《朱元璋传》进行第三稿、第四稿的修改中,他都很少谈到毛泽东关于历史观的批评,得到证明。特别值得提出的是,1954年毛泽东看了《朱元璋传》的第三次修改稿后,毛泽东明确提出:“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的好点,不要写的那么坏。”(见《北京盟讯》1981年第三期袁溥之《忆吴晗同志二三事》)在这里,毛泽东明明关注的是对朱元璋的总体评价问题,而不是其他一些什么具体问题。若由此及彼,回想毛泽东在石家庄时提出的意见,所谓唯物史观问题,实则是对朱元璋的评价问题。

如果这个推论是正确的,解读毛泽东在石家庄读《朱元璋传》后的意见,乃至推想毛泽东读《朱元璋传》时的心态,就不会太困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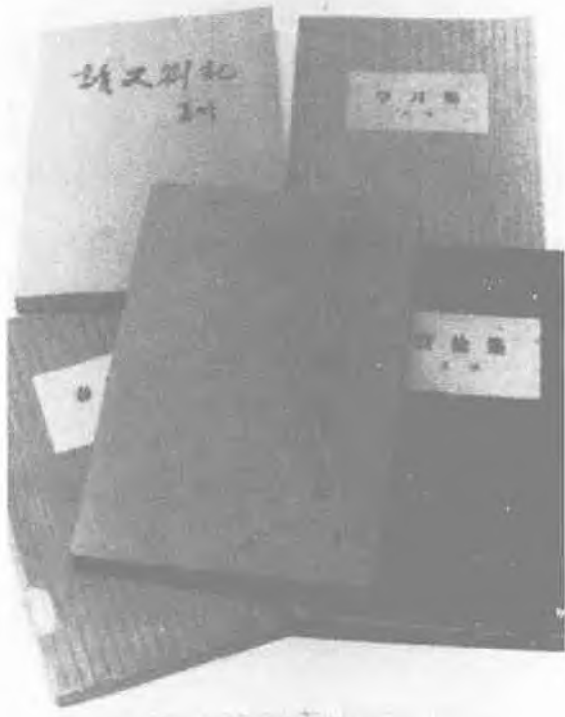
显然,毛泽东读《朱元璋传》,更多的只能是从学术的角度看,不可能把它当成政治著作看,对《朱元璋传》激烈地影射攻击蒋介石他未必有兴趣,特别是把朱元璋说成小流氓,看了也未必舒服。况且,毛泽东多次说过,夺取政权和民族解放战争,实际上是一场农民战争。朱元璋是通过农民起义夺取政权的,在历史上开创了“洪武之治”的局面,可称为一代名君。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也是农民军领袖,即将建立的政权,也要开创一个新的时代。尽管时代不同了,革命的性质也不一样,但对朱元璋这样一个人物,过多的贬斥,从毛泽东的感情上总有点过不去。然而,当时反对蒋家王朝正以排山倒海之势进行着,反蒋联合战线的队伍越大越好,所以,毛泽东当然不好直接批评拿朱元璋影射蒋介石不妥。只好以曲笔提出自己的意见。

为何吴晗不修改对朱元璋的贬评

吴晗得知毛泽东关于《朱元璋传》第三次修改稿的意见后,又看到其他学术界的朋友提出的关于“阶级关系、阶级矛盾、阶级分析不够,对朱元璋这个历史人物评价也不够全面”。吴晗把这一修改稿压了下来,没有再交付出版。但他也没有按照毛泽东两次提出的意见对书稿大改的意思,特别是对朱元璋的贬评,并没有想过多地改动它。这大约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当时史学界正在纠正40年代出现的一种风气,即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了打破被禁锢的言论,把历史研究当做对敌斗争的一种手段,这是当时革命斗争的一种需要,本无可非议,但这种指桑骂槐的史学,毕竟是不科学的。这些严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总感到欠妥。于是,在50年代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吴晗等人,都检讨了他们在40年代以写历史作为影射、批评蒋介石的做法是不科学的。其中范文澜检讨了他在写《中国通史简编》时,“借吴蜀联合拒魏来类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借孙权来类比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统一战线,把孙权描写成几乎是全部黑暗的人物。这是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的。”吴晗当时

也检讨了借写朱元璋影射蒋介石,给朱元璋以“过分的斥责”。尽管当时那样写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是不可取的;二是吴晗毕竟是个正直的史学家,秉笔直书在他思想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我和王宏志合著的《吴晗传》中,曾经写了这样一段话:“要说吴晗写《朱元璋传》有什么悲剧,那么,悲剧恰恰是由于它的题材早已被一种超凡的力量钳制着,而吴晗并不知觉,仍然按照一位正直学者的思路来修改《朱元璋传》,他没有真正领会毛泽东的批评,更没有认真贯彻。”

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关于诛杀功臣,吴晗在写了朱元璋炮制胡惟庸、蓝玉两案,株连杀害达几万人之后,又写了这样一段话:“不但列将依次被杀,甚至坚守南昌七十五日,力拒陈友谅的义子亲侄朱文正也以亲近儒生、心怀怨望被鞭死。义子亲甥李文忠立下大功,也因左右多儒生,礼贤下士,被毒死。徐达为开国功臣第一,洪武十八年生背疽,据说这病最忌吃蒸鹅。病重时



吴晗著:《朱元璋传》

朱元璋却特赐蒸鹅。徐达流泪当着使臣吃下了，不多日就死。”字里行间对朱元璋诛杀功臣报以极大不满，而对被杀功臣却寄予极大的同情。吴晗写到杀胡惟庸废弃相位时说：“从中书省综掌政权一变而为皇帝亲自管理庶政，……皇帝变成总揽一切的独裁者了。”吴晗还是忍不住指责朱元璋搞“独裁”。

吴晗是个史学家，最尊重的是史实。新中国建立前，他曾经因为“红军”和“民军”一字之争，宁可放弃一部史著的出版机会。他研究明史多年，对朱元璋早有个基本看法，在30年代，他写过《胡惟庸党案考》，这篇文章当是没有受政治气候左右时写的，文中他指责朱元璋是“一个十足的自私惨刻的怪杰。”说朱元璋“赋性猜嫌，深恐遭知识分子讥刺”。说他礼贤下士是“装”出来，直至大局已定便大兴文字狱。朱元璋“设学兴教”，“进用宋纳一流刻薄寡恩的教师”，“造就出一批听命唯诺的知识分子出来，作皇帝个人的驯仆”。如今，要吴晗完全放弃这些史实和原有的观点，塑造一个光辉形象的朱元璋是不可能的。

吴晗在50年代初期着手修改《朱元璋传》，比较侧重于史料运用的准确性和分析问题的科学性，是可以理解的。况且，毛泽东当时还未进入个人迷信的座舱，他的话还没有“一句顶一万句”。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毛泽东的周秦封建论只作为一种意见，允许讨论。因此，毛泽东对《朱元璋传》1954年稿本的批评，吴晗大约也只当做一种“意见”加以考虑而已，并没有认真贯彻。这一点从1954年到1965年两个版本对照，可以清楚地说明：1954年稿本，全书分七章二十四节；1965年版全书分八章二十三节。内容和基本框架大体上没有变，基调大体相似，看不出是由把朱元璋“写得那么坏”，改变成对朱元璋“写得好点”。至于对农民战争，从解放前的第二个版本到第三、第四个版本都是肯定的，特别是第三、第四个版本，如果说对农民战争评价高了一些，恐怕也只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点而已，在这方面，《朱元璋传》绝不是评价不当的典型。

吴晗对朱元璋的总体评价

朱元璋在巩固朱明王朝的过程中，所采取的种种手段，有其建树的一面，也有其残暴的一面。他用了无数的无辜的功臣、文人、官吏、百姓的血来巩固他的政权。吴晗对这段历史作了画龙点睛的描述：“朱元璋用严刑重罚，杀了十几万人，杀的主要是国公、列侯、大将；宰相、部院大臣、诸司官吏、州县胥役；进士、监生、经生、儒士、文人、学者；僧、道；富人、地主等等。总之，都是统治阶级的内部成员，他心目中的敌人。他用流血的手段进行长期的内部清洗工作，贯彻‘以猛治国’的方针，巩固了朱家王朝的统治。”在1965年版的最后，即“辛勤的一生”之后加上了这样一大段，大约有两千多字，对朱元璋进行总体评价。就文章结构而言，颇有画蛇添足之嫌。但无疑作者是费了心机的，因为把总体评价放在最后，等于为读者作个小结，可以加深人们的记忆。问题是这个总体评价，是否就符合毛泽东提出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呢？最后这个总评或许就是吴晗认真酌定的呢！

吴晗对朱元璋的总体评价是这样写的：朱元璋在我国历史上的封建皇帝中，是一个比较卓越的人物。其功劳在于统一全国，结束了元末二十多年战乱的局面；在立国之后，能够吸取历史教训，对农民作了一些让步，大力鼓励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允许农民尽力开垦荒地，大大增加了自耕农的数量；解放了奴隶，改变了元王朝官僚大量拥有奴隶的落后局面，增加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朱元璋还保护商业，取消书籍和田器征税，繁荣了市场。他还改变了元朝的匠户制度，推进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在严惩贪官污吏方面，大大改变了元末恶劣的政治风气。这些措施都是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有利于社会前进的，是为明朝的前期的繁荣安定局面打了基础的，是应该肯定的。

对于朱元璋的不足和过失，吴晗归纳了这样四条，即：一，他“以猛治国”的方针，过分地运用特务组织，制造了许多血案，野蛮残酷的刑

罚,大量的屠杀,弄到“贤否不分,善恶不辨”的地步。许多功劳卓著的大将和文人,毫无理由地被野蛮杀害,锦衣卫和廷杖两桩弊政,在明朝整个统治时期发生了极其恶劣的作用,都是他开的头,立的制度。二,政治上的措施是必须随社会、时代的变化而改变的。朱元璋却定下皇明祖训,替他一二百年后的子孙统治定下了许多办法,并且不许改变,这就束缚了限制了此后政治上的任何革新,阻碍了时代的前进。三,他所规定的八股文制度,只许鹦鹉学舌,今人说古人的话,却不许知识分子有自己的思想、看法,严重地起了压制新思想、摧残科学、文化和进步的有害作用。四,他自己虽然不信神仙、报应,却为了使臣民信服,大肆宣扬许多荒诞的神迹,欺骗毒害人民,这种方法也是很恶劣的。吴晗的结论是:“朱元璋有许多功绩,也有许多缺点,就他的功绩和缺点来看,还是功大于过的”。

从这个总体评价看,如果不抱偏见,应当说对朱元璋的评价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但是,

如果把对朱元璋的评价和 1957 年后中国的现实联系起来,如诛杀功臣、定下皇明祖训、压制知识分子言论等等,使人读起来,很容易产生某种联想和不快。至于像江青这样的人,读了朱元璋不许后妃干政,后妃不许出宫门,后妃不得和宫外通信,违者处死……等等,她的心态是可想而知的。难怪她一见到此书的稿本,便暴跳如雷,扬言要批判它。而毛泽东本来对吴晗是很关心的,先后两次阅读了《朱元璋传》的稿本,郑重提出了意见;《毛泽东选集》出版后,还亲自签字要吴晗“指正”。但是,吴晗写了《海瑞罢官》后,毛泽东亲自点名批判吴晗,说吴晗“是国民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且以他“开刀”,揭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吴晗在什么地方触怒了毛泽东,仅仅是《海瑞罢官》这一剧本呢,还是包括《朱元璋传》中对朱元璋的贬评呢?人们不得而知。但《朱元璋传》成为吴晗“文革”中的一大罪证,是史学界的人们都知道的。

(责任编辑 洛 松)

.....

紧扣热点焦点 信息资料翔实 观点分析透彻 趋势预警超前

欢迎订阅 2000 年《中国国情国力》月刊

(国内邮发代号:82-460)

《中国国情国力》杂志由国家统计局主管,杂志以全国各地专家学者集团为依托,发表的时局观点客观、超前;杂志依靠国家统计信息网络,公布的信息资料权威、翔实。

《中国国情国力》杂志时刻关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杂志开设主要栏目有:谈中国、本刊特稿、国情国力论坛、中国问题、来自统计局的报告、国际比较、世纪广场、社会观察、长话短说、读刊有感、政策信息、资料库等。

《中国国情国力》杂志经常刊登的内容主要有:中国发展过程中现实问题的对策研究,当今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国力诸要素政治、经济、科技、国防、文教、外交、资源的最新情况,社会经济形势的调查和预测,重要人物、事件的专访,国家统计局和省市区统计局重要的国情国力分析报告,中央及国务院各部委有关全局的重大决策,中国在新世纪必须正视和面对的

问题,国家基本情况的总量数字,中国社会各领域的国际比较等。

《中国国情国力》杂志为国际标准大 16 开本。2000 年《中国国情国力》杂志每本定价 5.50 元,全年 12 期定价 66 元。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邮发代号:82-460,若邮局订阅不便,也可直接向杂志社邮购。邮购办法如下:邮局汇款:北京三里河国家统计局中国国情国力杂志社徐苏玲收 (邮编:100826) 银行汇款:户名:中国国情国力杂志社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北京丰台支行六里桥分理处 帐号:801009477

联系人:徐苏玲

联系电话:(010)63449297

63266600-30913、30911

传真:(010)63449297

通讯地址:北京三里河国家统计局中国国情国力杂志社
邮编:100826

林彪

与

个人崇拜

● 冯建辉

愚昧荒诞的历史画面

50年代末形成的个人崇拜，到60年代由林彪推波助澜，进入狂热的“新阶段”。林彪本人在各种公开场合“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以他特有的尖声高呼“四个伟大”、“三忠于”、“四无限”、“高举”、“紧跟”、“照办”。号召人们“活学活用”、“走捷径”、“天天读”、“背语录”，用“顶峰论”、“天才论”、“领袖决定一切论”、“精神超过物质论”武装头脑，做忠于领袖的“好战士”。至“文化大革命”中，神州大地被一片浓厚的宗教气氛所笼罩，到处盛行着“早请示”、“晚汇报”，大会小会敬祝“红太阳万寿无疆”，男女齐唱“语录歌”，老少共扭“忠字舞”。

某报1968年4月13日的报道，生动地记录了这一历史画面：

“3月23日7点30分，卫生科全体人员迎着初升的红太阳，高唱《东方红》，背《老三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庄严宣誓。手术室里，四壁挂起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张□□念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安详地躺在病床上。病人呼吸困难，在场首长立即用毛主席的教导：‘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鼓舞大家很快地查明了原因。……是瘤子上的膜，还是腹膜分不清，党支部书记及时地用毛主席的教导激励他们：千难万难，有了毛泽东思想就不

难。他们终于认清了这层是腹膜……”

一家报纸的资深编辑，对个人崇拜时期办报情况做了如下回顾：

“当一版有毛主席的照片时，就必须保证一版的其他照片上没有人把枪口对着毛主席的方向。甚至文字上有‘毛主席’的字样出现时，一定要透过光线看看二版上的同一地方有没有贬义词。……后来，只好做一个报纸透视箱：一个玻璃桌子，桌下安几个电灯。报纸出来后，一版和二版、三版，都放在玻璃板上，玻璃板下头打开电灯，进行透视，以检查毛主席照片或名字前后，有没有贬义词。经过严格检查后，没有贬义词才能付印。几乎，每期报纸都要这样干，报纸版面透视机，直到前几年还保存在军报仓库里”。

今天的人们看来，这些事情是多么不可思议和荒诞可笑！然而确确实实是我们这一代人，曾以无可奈何或崇高而严肃的心情这样干过的。让后来人永远记住这些愚昧而荒诞的历史画面吧，这就是个人崇拜！

林彪所以走红 并非都因骗与受骗

曾几何时，人们把林彪称为“政治骗子”，全党上下讨论“如何识别政治骗子”，结果越讨论越糊涂。究其原因，盖因文不对题。30年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可以心平气和地说：林

彪并不全是“演戏”，毛泽东也并不全是“受骗”。

建国以后，50年代毛泽东重视林彪，主要出于对军队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考虑。毛泽东历来重视军队，夺取政权年代曾讲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建立全国政权以后，十分重视军队在巩固政权中的作用，军队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十大元帅排名第二的彭德怀，抗美援朝回国以后出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不久，毛泽东对彭的工作感到不满意，认为“不懂政治挂帅，经验主义，只习惯老一套”。后来，由于个性不同和某些意见分歧，甚至对彭德怀个人也有所疑虑。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曾说：去年八大二次党代会上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

在这样的背景下，1958年5月召开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提议十大元帅排名第三的，因养病未担任具体工作的林彪，增补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给他的任务是，好好养病，准备应付第三次世界大战。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出了问题”，林彪作为“援兵”大力支持毛泽东，狠批彭德怀，慷慨激昂地对彭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但没有这个野心。”庐山会议以后，自称没有“野心”的林彪取代彭德怀，于1959年9月17日，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

进入60年代，毛泽东以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推动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的想法，逐渐占主导地位。面对党内许多人“跟不上”，领导人之间在若干问题上出现分歧的政治局面，毛泽东没有反思自己的主张正确与否，而是归咎于自己的权威被削弱了，认为“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他企图通过加强个人崇拜的办法，进一步推行自己的主张。而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的一系列做法，恰恰符合了毛泽东的意图。

1960年12月，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并以“决议”形式发全军贯彻。由部队开始，在全国范围掀起“活学活用”的热潮。这一时期，林彪关于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著作的一

些讲话，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顶峰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捷径论”（学毛著“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是一本万利的事情”），“最高指示论”（“要把毛主席的书当做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以及“活学活用”、“天天读、天天用”、背“老三篇”等等。为“个人崇拜”大造了舆论，其实用主义、形式主义的恶劣学风，更是祸及全党全国。

党内的有识之士，曾对林彪的这一套错误做法进行了抵制，甚至是公开的批评。主持全军政治工作的罗荣桓元帅，在60年代初“活学活用”刚出笼时，就表示不赞成。他说：“所谓带着问题去学毛主席著作，绝不能只是从书本上找现成的答案。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事物是多样性的，因此也就不可能要求前人给我们写成万应药方。”后来，他又在军委会议上当着林彪的面提出：“‘带着问题学’毛选，这句话要考虑，这句话有毛病”，“难道学几条语录，就能把部队建设好？”林彪当面不吭声，会后却认为罗荣桓反对“带着问题学”就是反对毛主席。事情反映到中央，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大家一致赞成罗荣桓的意见。邓小平1975年9月在农村工作会议上谈起这段历史时说：“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这个意见。”后来又闹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虽然不认为罗荣桓是“反毛”，但却支持林彪的主张，批示总政“照林彪同志意见办理”，并在一次会议上表扬林彪“提出了几个很好的部队建设的措施”。

由于“左”的思想作祟，50年代末搞的“大跃进”带来大损失。为总结经验教训，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有七千多人参加，故称七千人大会。面对许多人对中央工作提出批评，毛泽东虽然也号召发扬民主，“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千一稀，大家满意”，并作了自我批评，但内心里并没解决问题，甚至对批评很反感。这从“文革”初期江青曾讲“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可以得到印证。

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摸准毛泽东这一心理,为之大唱赞歌。他面对“大跃进”造成的大损失,轻描淡写地说:“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收入”,并极力为毛泽东开脱责任,认为发生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最后林彪提出一个有很大影响的公式:“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个历史”。这个公式不仅把党和革命的一切胜利归于毛泽东个人,而且把毛泽东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代表正确方向,夸大为不再需要实践检验,永远正确的真理化身。林彪的与众不同的讲话受到毛泽东的赏识,毛泽东怀着难以抑制的喜悦心情对会议参加者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罗瑞卿答:我作不出来。在我们党面临困难,应该也有可能清醒些的时候,林彪继续散布个人崇拜的迷雾,为全党正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正确总结经验教训设置了障碍。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指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一思想立即得到林彪的拥护和响应。林彪一贯自我标榜:“我的职业是搞军事,兴趣是搞政治”。他主

持军委工作不久,即提出:“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四个第一”的实质,用林彪自己的话说,即“我们要想办法发挥思想的力量代替物质的力量,以至于超过物质的力量”。1964年以后又提出“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就是抓阶级斗争”,就是“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并表示要“处处突出政治,事事突出政治,时时突出政治”,“年年突出,永远突出”。林彪还以“突出政治”为标准,把干部分为两大类,“突出政治的”,“就是头号的大好,不然的话就是头号的大坏”,表示“谁不突出政治,就罢谁的官,不管他有天大的本事”。

说来也是巧合,林彪的“突出政治”刚提出,在部队内部又受到一位姓罗的抵制。不过不是罗荣桓(他已于1963年12月去世),而是时任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的罗瑞卿。罗瑞卿1965年1月9日在军委办公会议上表示:“必须把政治思想工作落实到军事训练和其他各项工作之中”,“如果单纯把政治搞好,别的都不好,垮下来,这种政治恐怕不能算政治好,是空头政治”。同年11月,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诬告罗瑞卿“反党”、“反毛主席”、“逼林彪让贤”。12月2日,毛泽东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有所警惕。”



毛泽东、林彪在
“九大”主席台上

12月8日,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揭发罗瑞卿“篡军反党”罪行,会后解除了罗瑞卿的总参谋长职务。

然而围绕“突出政治”的争论并未结束,1966年2月,邓小平在全国工交会议上明确表示:“政治挂帅要落实到生产上”。4月,《人民日报》发表三篇由周恩来审定的关于突出政治的社论,强调“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之中”。这些主张,当即被作为“资产阶级观点”受到批判。林彪授意某报于1966年2月3日至4月5日,连续发表7篇“突出政治”的社论。其“五论突出政治”集中宣传了林彪关于个人崇拜的观点:“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话一定要坚信不疑,坚决照办。读毛主席的书,不是一般地读书。一般地读书,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指示就必须执行,最高指示就尤其要执行。毛主席的书,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照办就行了”。至此,创造了极为浓厚的个人崇拜气氛,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做了充分的舆论准备。

林彪本人在一片个人崇拜气氛中,也被涂上神圣的光环,成为“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接班人”,并且载入庄严的党章。当时出版的《林副主席语录》、《林副主席指示》,在“编者的话”中对林彪做了20个“最”的评价:

“林副主席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最理想的接班人,是全国人民最敬爱的副统帅。林副主席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最高最高,对毛主席最忠最忠最忠,跟毛主席最紧最紧最紧,对毛主席著作学得最活最活最活,对毛泽东思想用得最好最好最好。林副主席是全党学习、贯彻、宣传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最高典范,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三个口号

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三个口号是“高举”、“突出”和“紧跟”。这三个口号,画龙点睛地体现了个人崇拜的“精髓”。林彪垮台以后,仅仅说林彪的“高举”、“突出”、“紧跟”“是假的”,而不对

口号本身进行认真的清理和清算,其影响是难以绝迹的。

关于“高举”:

林彪上台伊始,即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当做口头禅。在他的倡导下,报纸天天登“语录”,文章篇篇引“语录”,大会小会诵“语录”,各种文件顶格印“语录”。后来发展到个别地方买东西、打电话,也要先背一段“语录”。“文革”中,对立的两派搞武斗,更是少不了“打语录仗”。

对于林彪的这一套“高举”,虽有狂热响应者,但不少人有反感,更有少数勇敢的思想先行者当即提出尖锐的批评。如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陆秀兰,写文章指出:“把毛主席语录叫最高指示,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这是把毛主席说成封建皇帝了”。西北工业大学姜明亮等人,1968年4月上书党中央、毛主席,表示:“马克思主义认为,凡真理都是相对的,……认为一个人说的话句句是真理,只有在封建社会皇帝被神化后,才出现所谓金口玉言之说”。提意见者虽然惨遭厄运,他们的思想光辉却永照后人。

每读这些史料,不能不使人内心受到一次震撼。笔者与许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一样,直到1971年林彪叛逃的“九·一三”事件发生,才进行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反思:林彪为什么能“打着红旗反红旗”,并且让如我这样的许多人“上当受骗”呢?一个重要教训是,不管什么事都不能盲从,都要问问科学不科学,信仰离开科学,就要变为迷信。

关于“突出”: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一篇著名的讲话:“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根据这一思想,《人民日报》1967年11月3日,发表《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著名文章。后来,从理论上和历史上掀起“突出领袖”的狂潮。当时曾出笼过《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鼓吹历史上只有毛泽东一



广东博罗县的一家八口在唱语录歌

个人正确,其他领袖不是反面教员,便是正确领导的陪衬。整部党史就是毛泽东单枪匹马和其他少数领袖人物的斗争历史。这部《斗争史》的虚伪性,人们从近些年披露的大量史料中已有所了解,不再赘述。这里,介绍一下当年由林彪骨干控制的某重要单位,是怎样大造舆论,篡改马克思主义关于领袖的学说,赤裸裸地宣扬“领袖决定一切”的。

该单位于1970年11月3日炮制出一个关于领袖问题的理论性文件,名曰:《永远忠于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最高领袖地位——学习关于领袖、政党、政权、阶级、群众相互关系学说的体会》,要点如下:

(1)在领袖、政党、政权、阶级、群众五个关系中,领袖“是群众的灵魂”,“必须承认无产阶级领袖在革命和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决定着无产阶级的命运,决定着无产阶级政党的命运,决定着无产阶级政权的命运,决定着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命运”。

(2)“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毛主席决定着我们的性质,决定着我们的国家性质,决定历史的发展”,“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党,没有政权,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一切”。

(3)“永远忠于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最高领袖地位。这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需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是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的需要”。

在堂堂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此赤裸裸地宣

扬“英雄创造历史”、“领袖决定一切”的唯心主义理论,实属罕见。然而,如果仅仅把这看成林彪个人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在林彪垮台五年以后,又掀起过一场“突出华国锋”的新高潮,其形式、规模、气氛都让人感到似曾相识。如×报1976年10月29日文章宣称:“爱不爱我们的党,爱不爱我们的国家,爱不爱我们的军队,爱不爱我们的人民,集中地表现为爱不爱我们的领袖。”还有许多报刊、杂志,称华国锋是“江山永不变色”的“可靠保证”,“有了领袖华主席,我们的国家大有希望”。要求人们“像热爱毛主席那样热爱华主席”,“无限信赖”、“永远忠于”华主席。

接二连三的出现“突出领袖个人”的历史教训,说明不只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全党在一个较长时间内,如何科学地认识领袖的作用以及领袖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并未搞清楚。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率先提出“领袖是人不是神”,老革命家叶剑英重申列宁的思想:“党的领袖是一个集体”,“任何时候,都不能夸大个人的作用,不能个人说了算。要看到,像我们这样一个执政的大党,即使是天才,如果突出个人,独断专行,就一定要犯错误,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危害。”胡耀邦在《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讲话中,尖锐地指出:“我们不能把个人放在人民群众之上,不能把个人置于历史规律之外”。他认为“突出个人”造成的危害是:“第一,根本不可能有党的民主集中制;第二,根本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第三,根本不可能解放思想;第四,不可避免地要导致一言堂、家长制等封建专制主义,并被某些坏人利用搞法西斯主义。”198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庄重地发出《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并着手解决高度集中体制的问题。

关于“紧跟”:

本来我们党并没有“紧跟”这个提法,1958年个别领导干部提出,“跟着毛主席走,就不会错的”,毛泽东当即指出这话不正确。他于1958年5月17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表示:昨天有同志讲:“跟着某某人走,就不会错的”,这个“某某”就是指的我——毛泽东。这话要考虑。我说,

又跟又不跟，对的就跟，不对的就不跟，不能胡里糊涂地跟，要独立思考，什么都跟就不好。

可惜的是毛泽东这一正确思想，随着个人崇拜之风盛行，而被抛弃；林彪提倡的“紧跟”口号日益走红，并且形成一种浓厚的风气。

“紧跟”口号理论上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已讲得明明白白。这一口号在整个个人崇拜时期所造成的严重危害，也早已有目共睹。如：由此形成的不管是非曲直，闻风而动，一哄而起的盲动作风；虚张声势，比谁嗓门大、调子高的形式主义作风；看风使舵、投机取巧的虚假作风，等等。

我这里想进一步讲讲提倡“紧跟”的林彪，其内心深处是怎么想的，什么是“紧跟”？为什么要“紧跟”？这对我们理解他的“紧跟”口号，颇有启迪。

“九一三”事件以后曾出过不少“林彪罪行材料”，其中有林彪和叶群的读书笔记、札记之类的东西。现摘录几段，并稍加评析，奇文共赏。

其一，“古策：（1）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2）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一字千金——不在多，少而精，同意，顶用；一刻千金——抢时间，早一刻则礼到意到，迟了被动”。林彪把党的领袖与干部群众的关系视为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领袖的话具有绝对权威，不管对错，说一不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只许唯命是从。——此为“紧跟”含义之一也。

其二，“党性，遵命性也”，“民主集中制——服从——纪律”。这里林彪把党性——共产党员为崇高理想而自觉献身的精神，歪曲为只是对领袖和上级的盲目“遵命”。把民主集中制仅仅归于服从和纪律，取消了“民主集中制一个重要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即取消了党的民主精神。——此为“紧跟”含义之二也。

其三，“终生不犯错误之法，得个拥护××的称号，……跟着转喊”，“勿讲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此话赤裸裸的表明林彪以个

人得失为中心，投上所好，看风使舵的投机心理。——此为“紧跟”含义之三也。

其四，“坚决的左倾高姿态”，“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意义，不然是书呆子”，“不得已时使用捧上的办法，然后暴露之，打下之”。这番话暴露了林彪“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两面派、阴谋家的嘴脸。——此为“紧跟”含义之四也。

林彪的这四种心态：封建主义的君臣心态；反对民主的专制心态；为个人得失不讲原则的投机心态；心怀叵测的阴谋家、两面派心态，充分展示了他所鼓吹的“紧跟”的本质，值得后人深思。

试解林彪之谜

林彪生前乃至死去多年，仍然躲在一团神秘的迷雾之中。他的所作所为，黑白反差之大，令人目瞪口呆，不可思议。在许多人心目中，林彪已经成为“虚伪”、“阴谋”、“两面派”的化身。其实，林彪并非天生的两面派，甚至并非专事阿谀逢迎的人。和林彪共事几十年的聂荣臻元帅，谈到建国以前的林彪时说：“我觉得他比较年轻，世故不多”。曾任毛泽东多年卫士长的李银桥也说：“我在毛泽东身边的期间，林彪来见毛泽东时，总是正襟危坐，板着面孔，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敢发表意见，甚至当面否定毛泽东的意见，像这样毫无拘束，在毛泽东面前敢说敢争的军事将领，彭德怀和林彪是比较突出的。”林彪这样的人为什么会成为“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两面派和推动个人崇拜的急先锋呢？

邓小平曾讲过：“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由于我国国家在“文革”及“文革”以前的一个较长时期内，实行的是“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的“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形成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

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人身依附关系,君臣父子关系,猫鼠关系。在这些地方和单位,根本不谈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林彪大搞个人崇拜,正是这种高度集权体制的历史产物,其实质是对领袖手中具有的无限权力的崇拜。

林彪念念不忘“权”,对“权”的力量与作用,颂扬到顶礼膜拜的程度。他离开政权与权力的历史内容和社会内容,奢谈:“权的占有是总的占有,有权就有一切”,“没有政权,就没有一切”;“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要靠这两杆子”。最终,林彪把对权力的崇拜,归结为对掌握权力的人的崇拜,鼓吹:“领导班子就是政权”,“领袖决定政党、政权的性质”。我们从权力崇拜角度去看林彪,就不会对他一方面鼓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一方面又看出毛泽东存在的某些问题,并在一定条件下妄图加害毛泽东,当成不可理解的事。他崇拜毛泽东,是崇拜毛泽东手中具有的绝对权力,林彪说:“同意,非同意其事,乃同意其人也,天也”,他还说:“遵命乃大德、大勇、大智”。这表明,在林彪看来,谁掌握绝对权力,就应该全心全意崇拜谁,这是“大德、大勇、大智”,乃天经地义。当然,这种个人崇拜的核心是“为己”,如叶群所说:“得一人得天下”。林彪妄图加害毛泽东,还是权力崇拜作祟,如《五七一工程纪要》所说:“B52 好景不长”,“领导权落到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于是不顾一切的密谋抢班夺权。我们研究和总结林彪问题的历史教训,绝不能仅仅停留在揭露某个人的品质和欲望上,而要对林彪所代表的作为高度集权体制反映的“权力崇拜”思潮,进行认真的批判。

《中国思想政治工作全书》指出:“权力是迫使他人或团体作出某种行为的能力”,国外学者马克斯·韦伯也指出:“权力是把一个人的意志强加在其他人的行为之上的能力”。这说明权力本身有很强的“支配性”和“不平等性”,再加上权力持有者,会或明或暗地享有许多特殊的利益,以及普通人难以享有的地位、荣誉和精神上的满足,权力又具有很大的诱惑性和腐蚀性。权力崇拜思潮,正是权力具有的这种诱惑性和腐

蚀性的产物。权力崇拜思潮极力鼓吹权力是一种“占有”,完全不讲“权力是一种社会责任”,把掌权者当成社会的主人,而不是“社会的公仆”;它鼓吹权力万能,有了权力就可以为所欲为,只要牢牢地把住权力,就可以万寿无疆、永远健康,而不知权力的基础在人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它鼓吹“官大表准”、“有权就有真理”,提意见者一律视为“反对真理”、大逆不道,殊不知“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批判林彪鼓吹的“权力崇拜”思潮,是进一步改革领导体制、根绝个人崇拜不可缺少的一课。

(责任编辑 洛松)

欢迎订阅《百年潮》杂志

政坛高层亲历记 客观真实
专家学者独家文 秉笔直书

《百年潮》杂志是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管、中国共产党史学会主办的大型文史月刊。宋任穷、萧克、胡绳、程思远等任本刊顾问。《百年潮》以“信史、实学、新知、美文”为宗旨,以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学界的专家、学者,以亲历过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党和国家领导人、老一辈革命家为主要作者队伍,是反映 20 世纪中国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领域中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最具权威性的杂志之一。

《百年潮》为月刊,由北京报刊发行局发行,邮发代号:82-920。每月 4 日版,每期订阅价 6 元,全年 72 元(含邮费)。

本刊发行部也办理邮购。读者可将订阅本刊的总价款通过邮局汇给我社,并在汇款单附言栏说明订阅期数。

本刊发行部地址: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6 号口
字楼《百年潮》杂志社

邮编:100044 电话:(010)68007434
68007433(传真) 联系人:戚瑛

语言学音乐学大师

赵元任

● 邱 健

在历史上往往有些显赫一时的人物，经岁月的淘洗，渐渐使人淡忘。探寻原因，或因其大名显而不“赫”，或因某些复杂的人文因素而日益销声匿迹。而名似销，迹未匿者也不乏其人，赵元任就是其一。

最近，我在家中清理往日底稿资料 and 老照片时，发现一张已故美籍华人赵元任夫妇的合影。这张照片把我带回 18 年前（1981 年）对他当时访问的片断回忆，虽时隔 18 年之久，但昔日留下的见闻却依然历历在目。

1981 年 5 月中旬，赵先生应中国社科院邀请二次访问中国。6 月 30 日上午，他在社科院外事局局长王光美陪同下来到北京大学访问。北大校长张龙翔代表北京大学授予他“北京大学名誉教授证书”和一枚北京大学的金色校徽。年已 88 岁高龄的赵元任教授对此表示感谢，即兴朗诵了他所译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一段诗，并用无锡方言唱了《卖布谣》歌曲，表达了他的愉快心情。授奖仪式结束后，在北大临湖轩内，这位华发满头、精神矍铄、谈笑风生的老教授与他当年的学生和再传弟子们进行愉快而热烈的交谈。

罕见的语言天才

赵元任先生是中国现代语言和现代音乐学先驱。他博学多才，既是数学家，又是物理学家，

对哲学也有一定造诣。然而他主要以著名的语言学家蜚声于世。他从 1920 年执教清华至 1972 年在美国加州大学退休，前后从事教育事业 52 年。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朱德熙、吕叔湘等都是他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赵先生永远不会错”，这是美国语言学界对他充满信赖的一句崇高评语。

赵元任原籍江苏常州，1892 年生于天津一个书香、官宦之家，著名诗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作者赵翼（乾隆进士），就是他的六世祖。清末，他的祖父在北方做官。年幼的赵元任随其家人在北京、保定等地居住期间，从保姆那里学会了北京话和保定话。5 岁时回到家乡常州，家里为他请了一位当地的家庭老师，他又学会了用常州方言背诵四书五经。后来，又从大姨妈那儿学会了常熟话，从伯母那儿学会了福州话。

当他 15 岁考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时，全校 270 名学生中，只有 3 名是地道的南京人，他又向这三位南京同学学会了地道的南京话。有一次，他同客人同桌就餐，这些客人恰好来自四面八方，赵元任居然能用 8 种方言与同桌人交谈。听他的家人说，他从小就喜欢学别人说话，并善于辨别出各地方言和语音特点。

这段家史说明，赵元任幼年就经过多种方言的训练，开始掌握了学习语言的本领。1910 年，他 17 岁时，由江苏南京高等学校预科考入



1973年6
月，周恩来与
赵元任握手

清华留美研究生班，在录取的72名官费生中，他总分名列第二（胡适名列55）。先在康奈尔大学读数学、物理，后入哈佛攻哲学，继而又研究语言学。1920年回到祖国，在清华大学任教。当时适逢美国教育家杜威和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清华大学派他给罗素当翻译。他在陪同罗素去湖南长沙途中又学会了讲湖南话。由于他口齿清晰，知识渊博，又能用方言翻译，因而使当时罗素的讲学比杜威获得更好的效果。从此，赵元任的语言天才得到了公认，他自己也决定将语言学作为终身的主要职业。

1925年，清华大学增设“国学研究院”，他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被聘为导师，他教授《方音学》、《普通语言学》、《中国音韵学》、《中国现代方言》等课程。1929年，他又受聘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兼语言组主任。到1938年，他再度去美国哈佛大学攻读语言学，经过6年潜心研究，成为名闻世界的语言学家。1945年他被任命为美国语言学会会长，1960年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他先后获得美国三个大学的名誉博士称号。

“汉语言学之父”

赵老是中国第一位用科学方法作方言和方

音调查的学者。他的耳朵能辨别各种细微的语音差别。在二三十年代期间曾亲自考察和研究过吴语等近60种方言。

赵元任对方言的研究非他人所能及，他会33种方言。他的治学严谨和刻苦，令人叹为观止。

1927年春天，赵老在清华大学研究所担任指导老师时，曾到江、浙两省专门调查吴语。经常是一天跑两、三个地方，边调查边记录，找不到旅馆就住在农民家里。一次，他和助手夜间由无锡赶火车去苏州，只买到硬板椅的四等车票。由于身体太疲乏，上车后躺在长板座上就呼呼地睡着了。等醒来时，满车漆黑，往外一看，才知道前面几节车厢已开走，把这节四等车厢甩下了。助手问他怎么办？他说：“现在反正也找不到旅馆，就在车上睡到天亮吧！”助手见他身体虚弱，劝他每天少搞点调查，他诙谐地说：“搞调查就是要辛苦些，抓紧些，否则咱们不能早点回家呀！将来不是要更费时间，也更辛苦吗？”

在那次调查吴语的行动中，他不辞劳苦，经镇江、丹阳、无锡，每站下车，再乘小火轮到宜兴、溧阳，又转回到无锡等地，冒着严寒，辗转往复，深入群众，多访广纳，记录了大量的当地方言。3个月后，回到北京，他把调查的材料写成一本《现代吴语研究》。在出版此书时，语音符号采

用国际音标,印刷厂没有字模,他和助手就自己用手写,画成表格影印,每天工作在10小时以上。这本书出版后,为研究吴语和方言作出极为珍贵的贡献,赵元任也成为我国方言调查的鼻祖。

他为中国语言学研究开辟了新路

赵元任教授对音位学理论、中国音韵学、汉语方言以及汉语语法都有精湛的研究,撰写和发表过大量有影响的论文和专著,在国内外学者中享有很高声誉。他在美国除了在大学任教外,又用英文和中文写下了大量语言学著作:《中国语言词典》、《中国语入门》、《中国语语法之研究》、《现代吴语研究》、《钟禅方言记》及《湖北方言报告》等。

1972年,赵老退休后,仍不断致力著述,写出《语言学跟符号的系统》、《白话读物》等书。在他病逝前不久,还构想以同音替代的办法,把《康熙字典》上1万多个字合成一本2000字的《通字》,以用于日常行文,可惜未能如愿。

赵元任早年曾和语言专家黎锦熙先生致力于推广普通话工作,为此他创造了国语罗马字(注音字母第二式),并灌录了国语留声唱片。赵老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他一贯提倡彻底的白话文。1981年笔者访问赵老时,他对目前国内人们的口语有这样的感慨:“现在教育水平高了,人们的说话受广播、报刊、电视等媒体的影响,出口书面语多,不大爱讲白话了。如现在北京人爱说“开始”,不说“起头儿”;把长外衣不叫“大氅”,而叫“大衣”。连小孩说话也是文绉绉的,人们的日常生活语言显得缺少生活气息。”

在他这次回国访问和探亲期间,曾用各种方言和友人、学生进行交谈。著名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见到赵老时,两人兴致勃勃地用方言对话,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社会科学院语言所所长吕叔湘称赞赵老对中国语言学的贡献,一是他以现代的语言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给中



赵元任夫妇于1921年新婚合影

国语言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二是他给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事业培养了一支庞大的队伍。

现代音乐的先驱

赵元任出身于书香世家。母亲擅昆曲,父亲擅奏笛,可谓夫唱妇随。他自幼便受到良好的音乐熏陶,在音乐上也有天赋,在南京上中学时开始学钢琴,到了大学时代,无论主修那一门功课,他总要进修“和声学”、“对位学”、“作曲”、“声学”等课程。他还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歌咏团,并担当过歌咏队指挥。从1922年至1948年,他曾先后创作了歌曲、钢琴曲100余首。

在“五四”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潮影响下,赵元任热情洋溢地创作了一些富有时代精神的音乐作品。如《呜呼三月一十八》、《我们不买日本货》等具有强烈民主和爱国思想的歌曲。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赵元任歌曲集》中,歌词是由许多现代知名作家或诗人刘大白、刘半农、徐志摩、施肇基以及赵元任自己创作的。在《卖布谣》、《劳动歌》两首歌里,他对当代中国工人阶

级和善良质朴的小生产者的悲惨境地寄予无限同情。即使他所作的抒情歌曲，如《秋种》、《听语》、《海韵》，也揭示了人民追求个性解放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1936年，他在“百代”公司灌录了一首《教我如何不想他》的唱片，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脍炙人口。

1981年当他最后访问北京期间，多次被邀请唱这首歌。一次在音乐学院唱完这首歌后，人们向他提问：这是不是一首爱情歌曲？其中的“他”究竟是谁？赵老回答说：“‘他’字可以是男的，也可以是女的，也可以是指男女之外的其它事物。这个词代表一切心爱的他、她、它。”他说这首歌词是当年刘半农先生在英国伦敦写的，“蕴含着思念祖国和怀旧之情。”

赵老当时还向大家讲了一段有关这首歌曲的趣闻。他说，当时这首歌在社会上很流行，有个年轻朋友很想一睹歌词作者的风采，问刘半农到底是个啥模样？一天刚好刘到赵家小坐喝茶，而这位青年亦在座。赵元任夫妇即向年轻人介绍说：“这位就是《教我如何不想他》的词作者。”年轻人大出意外，脱口而出说：“原来他是个老头啊！”大家大笑不止，刘半农回家后，曾写了一首打油诗：“教我如何不想他，请进门来喝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

赵元任创作的家庭音乐作品，有些是为女儿写的，也教她们唱。连上邮局寄信的当儿，也不放过，让女儿坐在长凳上学唱。他很会利用时间，把许多歌曲写在小五线谱本子上，随身携带，一有灵感就写。他的大女儿赵如兰说：“他的许多音乐作品，都是在刮胡子的时候创作的。”

赵元任从20年代到30年初所作歌曲的歌词，大部分系刘半农所作。当1933年刘半农因病逝世时，赵老曾深情地写一挽联：“十载奏双簧，无词难成曲；数人弱一个，教我如何不想他！”

别开生面的婚礼

1920年，赵元任从美国哈佛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到清华大学任教，经友人介绍认识了

出身皖南名门望族的杨步伟女士。杨步伟在考入南京旅宁学堂时，入学考试作文题为《女子读书之益》，她竟大胆地写道：“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步伟这个名字，就是她的同学、好友看她抱负不凡为她而取的。杨自幼反对封建礼教，不肯缠足，并大胆拒绝了父母为她包办的婚姻，孤身跑到上海读书。1919年，全国掀起反帝和反封建的革命浪潮，杨步伟也参加了这场运动。当时安徽督军兼一、四两方面军军长的柏文蔚，要为500人的女子北伐队办所崇实学校，特聘杨步伟担纲校长之职。她毅然出任，领导学员学纺织、打绒绳、学刺绣，学救护……搞得轰轰烈烈。后来留学日本，在东京帝大获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她在北京绒线胡同和友人合开了一所“森仁妇产科医院”，开创妇女创业风气之先。赵元任在众多的追求者中慧眼识金，一眼认定了大他3岁的杨步伟。他非常敬佩这位女医生的才能和魄力。1921年有情人终成眷属。

说到他们的婚礼，那也是杨步伟女士蓄意向世俗的一场挑战。当时凭他俩家庭关系、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婚礼本应办得挺排场和体面。但他们想打破旧的婚姻制度，俩人别出心裁，先到中山公园当年定情的地方照张相，再向有关亲友发了一份通知书，声明概不收礼。当天下午，他把好友胡适和杨步伟在医院工作时的同事朱征请到家中，由杨步伟掌勺，做了四碟四碗家常菜宴请了这两位证婚人。然后赵元任从抽屉里取出结婚证书，新郎新娘先签了名，接着两位证婚人也签了名，为了合法化，还贴了四角钱印花税，就这样完成了简单而浪漫的婚礼。当这消息传出后，第二天报纸上以《新人物的新式结婚》为大标题，宣扬了一番。连英国哲学家罗素当时也认为这个婚礼“够简单了，不能再简单了。”

好客之家

婚后，杨步伟舍弃专业，全心支持丈夫事业。跟随赵元任先后到剑桥、清华、耶鲁、哈佛。杨步伟是闲不住的人，终身热心从事公益事

业。赵家人好客,誉满清华。赵老在清华园任教的4年间,每逢节假日,不仅校内来客不断,从市里来访的人也很多。为了能使客人品尝更多地方风味的菜肴和点心,赵太太就和清华几个教授夫人商量,在清华园大门外的小桥边整修了三间小房,合办了一个饭馆,并从东城五芳斋请了一个厨师。饭馆门上贴了一副对联:“小桥流水三间屋,食社春风满座人”。开张那天,几位教授夫人都去帮忙。哪知头一天就来了二百人,不到两个小时,就把事先备好的菜吃得精光。开张两个月,400多元的本钱多为请客垫光了。赵元任为此给夫人笑赠了两句打油诗:“生意茂盛,本钱赔净!”

从1938年起,赵老一家定居美国后,数十年来,他们的家一直是清华留美学生的“接待站”。我国著名科学家周培源、钱学森等许多早期赴美留学的学者,都是赵府的座上客。人们一到了赵家总有一种宾至如归的亲切感。赵太太不仅好客,而且烧得一手淮扬名菜。她曾把自己几十年来创作的名菜经验编成了一本《中国烹调》,在美国畅销不衰。

一对神仙伴侣

20多年前,有位记者在美国到赵家访问,称赞赵老夫妇是一对神仙伴侣。杨步伟对他说:“我们争吵60多年,但也和和睦睦共度了大半个世纪”。据了解他们的朋友说,他俩情投意合,但个性却不尽相同。赵元任性格醇厚,重道德,富涵养,不多言,对人和蔼可亲,说话风趣、幽默、凡事三思而行。杨步伟的个性豪爽果断,心直口快,热心助人,想干的事决不终止。可是他们60多年生活在一起,总是相亲相爱,相敬如宾,数十年如一日。

1961年,在他俩结婚40周年纪念会上,有人将赵元任做学问的求实精神比之《西游记》的唐僧玄奘,说玄奘之所以能成功,应归功于观世音菩萨的保护,杨步伟就是赵元任的观世音菩萨。赵元任一生的成就和贡献,的确也是与杨步伟的帮助和鼓励分不开的。1973年6月,他们

伉俪作了一次阔别故土后的首次大陆游。周总理、郭沫若、竺可桢等接见了他们。在受到周恩来长达3小时的亲切接见时,杨步伟竟充当了主要角色。赵元任对周总理诙谐地说:“她既是我的内务部长,又是我的外交部长。”充分证明了赵元任对夫人的挚爱。

有不少人说赵元任“惧内”。赵元任从不介意于此,也不否认“惧内”,往往以幽默的语言来回答世俗。一次胡适与杨步伟谈及在家中谁说了算时,她谦虚地说:“我在小家庭里有权,可是大事情还得丈夫决定,不过大事情很少就是了。我与他辩论起来,若是两人理由不相上下,那总是我赢。”赵元任也从不与太太争高低。

1971年6月1日,是他们金婚之日,门生故旧在旧金山“四海酒家”为他们举觞庆祝。杨步伟曾当场赋诗一首:“吵吵闹闹五十年,人人都说好姻缘。元任今生欠我业,颠倒阴阳再团圆。”赵元任也即兴和诗一首:“阴阳颠倒又团圆,犹似当年蜜蜜甜。男女平权新世纪,同偕造福为人间。”

1981年3月1日,杨步伟在美国病逝,赵元任老来丧伴,心情非常悲痛。他给友人写信说:“韵卿去世,一时精神混乱,借住小女汝兰处,暂不愿回柏克莱,今后再也不能说回‘家’了。”

这年的5月21日,赵元任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之邀,请他回国录制国际音标。录制时,他发了四百多种元音、辅音和声调,连非常细微的差别都十分确切,发音辨音能力与他在三十年代时一样,使在座者惊讶不已,钦佩之至。返美前,他对送行的朋友频频说:“我还要回来的,我还要回来的。”

本来,他的确是打算要回来,而且把归期订在第二年的秋天。可惜事与愿违。时隔7个月,1982年1月底,赵元任先生在麻省剑桥因病离开了人世。他逝世后未举行葬礼,按照他们生前的愿望,子女把他俩的骨灰撒到太平洋,让那深情的海水把他们的思念送回祖国,送回故乡……

(责任编辑 方 徨)

汤佩松院士的 境遇与抱负

● 毕列爵

湖北省浠水县近几十年来名气大了一些，这是因为出了一位闻一多。闻是诗人、艺术家和学者，但他名气的主要来源是毛泽东主席说过他“拍案而起”“要写闻一多颂”那几句话，以及他本人疾恶如仇和大无畏的精神。除非是同行、同事、他的学生，一般人对闻的了解，大约也仅限于他最后几年的政治斗争方面。社会上的传颂，纪念活动，各种宣传介绍，也多半集中于此。

一个学者，如果不是在政治上有什么特殊表现，单凭他的学术贡献是很难为一般人所了解的，他的“知名度”常偏低。

刚巧，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浠水县还有一位学者，巧得很的是：他不仅与闻一多是同乡，双方都是浠水的望族，即所谓世家；二人还是清华大学的同学、至友，又同在美国留学，后来又同在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合大学）同事。在学校里，二人都是极受尊敬的教授，在校外各自的同行中间也是。更有意思的是，浠水县建了一座闻一多纪念馆，在1992年举行的开馆典礼上，为闻的铜像揭幕的，正是这位学者——当时已90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具有国际声誉的植物生理学家汤佩松教授。在学术界看来，闻、汤二人

同样都是有着超过一般学术贡献的学者，同样都受到人们的尊敬。但事实上，即使是他们的浠水同乡，在那之前，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汤佩松。

汤的生平重要事迹，都可见于他的两篇回忆录中，也早已为许多朋友、学生和同行所熟悉。他的经历，属于一个典型的中国近代学者的类型：从小学、中学、大学，到出国留学，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毕生工作就是教书和做科学研究；极少的人才能获得院士头衔。汤不仅是中国最早（1955）一批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还是最早（1948）一批中央研究院院士。

汤的经历中还有许多不是任何一位学者都能做到的事。他在国内外就读的都是最好的大学，清华之后还有约翰·霍布金斯（Johns Hopkins）和哈佛（Harvard）；他工作过的地方，有的至今仍是世界第一流的，如伍兹霍尔（Woods Hole）海洋生物实验站；他的导师大都是当时最好的科学家；他还有一大批介于师友之间，或是曾以师事之的当代科学家，其中有几位后来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Otto Warburg, Otto Meyerhof, Archibald Vivion Hill）。这些学者在汤的科学成就上有很重要的意义。中国有两句老话：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汤在回忆录中曾写过抗战时

期的昆明大普集，每月有一次梨园村的茶馆会晤（实际是一种学术活动，曾被用来与早期的英国皇家学会相比拟）。参加活动的不过 15 人左右，但后来不少人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几乎全都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读者每读到此处，总免不了为之神往！

要准确地总结汤的科学贡献不是任何一个人所能胜任的，但是从国内外许多专著的引证和评论中，可以使人们约略地体会到它的分量。值得每一个做科学工作的人所摹仿的是：汤所研究的问题，在当时是全新的，他深知自己的工作在整个植物生理学中的意义和应居的地位，以及要用哪些方式和方法来解决和解释它。

他的两篇回忆录，第一篇是用英文写成的，题为 *Aspiration Reality and Circumstances: The Devious Trail of a Roaming Plant Physiologist*，发表在极有权威的《植物生理学年评》（*Annual Review of Plant Physiology*）（卷 34，1983）上。这是这份刊物第一次破例发表一位植物生理学家的回忆录而不是一篇科学论文，并且是刊于篇首（第 1-20 页）。这条题目，汤自己后来译成：“抱负、现实与境遇”，副题后来只简译为“一个生理学家的回忆录”，而把 *The devious trail of a roaming* 几个字略去。这几个字很难译得恰如其分，也许可以勉强译为“一个漫游的植物生理学家的曲折历程”。但是，若将这个副题与题目（即完整的题目）加在一起，不但符合作者半个多世纪的经历，更能反映他写此文时的感受与心情。

第二篇回忆录，题为《为接朝霞顾夕阳：一个生理科学家的回忆录》，分 6 次刊在由汤自己创刊的《植物生理学通讯》（1986）上。这份刊物拥有十分广泛的读者，还流传不少到国外。后来（1988）集中起来成为一本小书，题目未加改动，汤只在前面增加了一篇很短的序。1994 年，《中国科学报》又将这篇回忆录的前一部分（到 1949 年为止），分 15 次刊出（稍加剪裁），只将题目改为“一代风骚话沧桑”。这第二篇回忆录，是汤接受

许多读过第一篇的人们建议之后写成的。

第一篇的发表虽只比第二篇早两年，内容也基本上一样，但读者对他的感受颇有些不同。1983 年正是作者年届 80 高龄的一年，不仅是因为到了这个年龄，希望对自己大半生作一个回顾，特别对一位既有抱负，又有成就，还遭遇过不少坎坷的广为国内外所熟知和尊敬的科学家，这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历经崎岖——整个人生经历，都是如此。这对 1949 年以前的部分，还比较易于为人们，尤其是外国人所理解，因为那无非是由于国家的落后和不断的外侮造成的。但对于 1949-1976 年间这一部分，既不为他们所知，更不能为他们所理解。一般而言，国外的科学家，通常不用某些政治观点来对待外国同行，尤其是自然科学家。他们首先是从科学事业出发关心国外同行，特别是一些出类拔萃的科学家；对于汤，以及汤所从事的植物生理学，甚至推而广之到中国的植物学和植物学家，大体上正是如此。中国经历了将近 30 年的自我封闭和外界强加的封锁，一旦改革开放，中外双方都希望了解对方，也愿意对方了解自己，这是非常自然的。

下面所说，正是一例。1981 年，汤率领了一个由 43 人（内有 10 人来自台湾）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了在澳大利亚的悉尼举行的第 14 届国际植物学会会议。这是 1935 年以后中国首次参加这个国际会议，又是 1949 年以来重新参与这个国际学术组织的事务并恢复交往。习惯上，参加这一类会议的代表，都只具有个人身份，不代表任何机构或国家。但是汤此次却是很早即被约定在全体会员大会上发言的特邀代表，这照例也只有少数极有声望的权威学者才有这种机会。汤的发言题目是“中国植物学的某些方面”，这也是预先约定的。汤发言时，会场上座无虚席，结束时掌声经久不息，汤不得不多次“谢幕”。汤还被邀请参加了两个委员会，整个中国代表团很明显地是被当做第一流的国家代表团来接待的。这些情景，十分动人，参加会议的代表和后来听过传达的人们，无不深为感动和引

以自豪。汤后来多次说：“这主要归功于祖国的国际地位的蒸蒸日上”。这是千真万确的。但也不能不认为：汤是当时承担此项任务的最恰当人选，因为他不仅是当时国内健在的少数几位享有最高荣誉的植物学家之一，又是为数不多的极为国外科学界所关注的中国科学家之一。

两年后，即1983年，汤即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回忆录。这一篇可以被看作是上述大会发言的补充和延续。二者主要不同之点是后者只以作者为主体，只涉及植物生理学，谈自己的工作 and 感受。这篇回忆录比第二篇的篇幅要小得多，省去了许多细节，而重大事件均一一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作者精湛的英文修养完成的。全文结构谨严，文句朴实简练，用字尤其经过了精选。这和我们的教科书或者期刊上的文字完全不同，读起来更像是人文科学的著作。只要着意读下去，读者很快即为作者那种对科学事业的执著与追求，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对同事、学生的爱护、坦诚和尊重，尤其对待各种逆境的认真严肃，而不是屈服、泄气或敷衍等等所感动。全文给人以一种深邃、沉着和严肃的感受，但并不难以理解，更不缺少风趣。对于那些略略熟悉近几十年中国历史和学术界及教育界情况的读者，常常读着读着，不免要掩卷深思。第二篇回忆录也是如此。

第二篇回忆录超过了10万字。汤用了整4章（5—8）来叙述他的科学研究（其他各章内亦有），除非是同行专家、自己的同事或学生，别人很难懂得十分透澈。但是，“甘苦备尝”四个字，是任何一位读者都能体会得出的。第一篇回忆录的题目就有“抱负、现实与境遇”几个字，这包括科学研究在内。汤的科学贡献早已见于国内外许多著名科学家的著作中，他的工作，不仅在当年是崭新的，到了今天，仍然和当代最新的理论与方法结合在一起，继续前进。这也是许多科学家希望做到又常常未必能做到的。

从上述两篇回忆录中，读者很容易发现：汤很少谈到自己的家世，尽管他的家世可以说是很显赫的。他的父亲汤化龙（济武）曾经是辛亥

革命时武昌革命政府、亦即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共和政府的最高行政长官（民政总长），地位仅次于军事首领都督黎元洪。接着又是北洋政府时代的众议院议长、教育总长和内务总长。他以立宪派的领袖人物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18年，汤化龙在加拿大遇刺逝世。他的夫人早他两年（1916）去世。这时，汤佩松正是13岁和15岁，而他刚好是14岁时进清华学校的。可以想象，汤在青少年时代，与父母相依的家庭生活是很短的。

与此相对，汤与母校清华学校（后来的清华大学）的关系十分密切融洽。他在清华8年，由清华派到美国8年，共16年（1917—1933），即14—30岁。自1938起，或在清华大学任职任教，或编制上虽不属清华，但在工作、精神和感情上总与清华一致，以迄于今。他真正脱离清华只有5年，即1933—1938年在武汉大学。汤在许多场合都经常表达出对清华的眷恋。

回忆录中，与对科学事业的执著同样感人最深的，是他那种诚挚的爱国之情。他对自己和中国代表团在国际植物学会上受到逾常的尊敬，理解为这首先是祖国的荣誉，就是一例。多少年来，常见中国学者放弃国外优越工作和生活条件毅然回国的记载。这些学者的情况虽各不同，但最根本的一条是相同的，即爱国。汤正是其中之一，但他的想法似乎更为简单朴素。清华是用庚子赔款办的学校，庚子赔款又是帝国主义通过腐朽的满清政府，从全国人民处搜刮来的。这使他“感到不安和无限感激”，并用“国耻民仇之情鞭挞自己”，以求报答“国恩”（这是他自己选用的两个字）。1925—1933年他在美国留学，仍然是由清华的庚子赔款支持的。这时他的心情，他自己用英文写的一句话，似乎更为简练和朴实感人：To this I have a strong feeling of deep indebtedness to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who nurtured and norished me（在那一天，我有一种强烈的负疚之感，正是他们才哺育了我，将我养大成人）。8年之后（1933年），他十分诚挚地婉辞了好友的妥贴安排，径自回到自己的祖

国。他多次承认自己当时这样做，“还没有这种社会主义觉悟”，只是实践一个非常简单的信念：“我是一个中国人，当然回中国去”，并声言要报“国恩”。道理愈是简单，愈朴素，也愈加感人。正如同一个小孩爱自己的母亲，没有很多理论，中国人多年来称这为“天性”。爱国也是一种天性。

中国知识分子具有爱国传统。近年来很多中外学者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一向有一个特点，即普遍具有忧患意识。中国历史上充满内忧外患，特别是在近百年中，更为突出。知识分子关心外患是爱国，关心内忧也是爱国。科学家凭借自己的科学实践，他们毕生所求，无非是要解除祖国的部分内忧。闻一多若幸而未遭毒手，也丝毫不减他是一个爱国者。汤佩松在北京面临解放之际，头一个大声疾呼“清华是全中国国民的血汗建成的，现在到了把它还给国民手里的时候了”，是与闻一多的“拍案而起”并无二致的。汤毕生对自然科学的追求，与闻毕生对文学艺术的追求，在解除中国的某些内忧上，也是并无二致，都是爱国的。

不幸的是，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多人似乎认为爱国只限于表现在政治态度上。若不是从拍案而起到惨遭枪杀，单凭学术贡献，闻一多也会和汤佩松一样，在更广大的人民群众中藉藉无名。中国多少世纪以来就是一个轻视科学技术的国家，同时也当然轻视科学技术人员。直到如今，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口号。这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是非常不利的。

然而，事情还不止此。过去几十年中，对许多科学家在教育问题上坚持自己而不同于流行（或上面颁行）的见解，很轻易地被划到政治范畴中去。在汤的回忆录中，他曾说自己是“老运动员”。凡是1976年以前的成年人，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科学上，尤其是自然科学上存在的问题，同时有几种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许多人都记得当年是如何“学习苏联”的。汤在回忆录

中，多次称道苏联科学的某些方面和某些科学家，但不能接受莫名其妙的李森科主义。这都是科学家的常态，奇怪的是不赞成李森科可以说成是“反苏”，而反苏必然是“亲美”、“崇美”。除此之外，还有院系调整、编制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特别在贯彻教育方针，教学和科学研究中要理论联系实际等等所谓“教育革命”问题上，“一个接一个的浪涛不断打来，有时是轻波细浪，更多是狂涛骇浪。研究及教学工作只能在浪潮间歇中进行。”这是当年全国的普遍情况。自己热爱的工作不能正常进行，而经常要做的是充当被批判的对象——这就是汤那个漫长岁月中的真实生活！至于“牛棚”待遇，则更不用多说了。然而，以汤这样一位在科学上早年就有异乎寻常的成就，教育上桃李满天下，在国内外享有好几十年荣誉的老科学家，是怎样对待延续了三十年的坎坷呢？“往事已矣！决无私人怨恨！”“没有什么可以自悯、更没有什么怨天尤人的。”这比后来所提倡的“不要耿耿于怀”要高出多少倍！所有经历过那个时代，尤其是对汤多少有些了解的人，每当在他的回忆录中，读到此处，无不深为叹息而感动。

爱国既是一种理智，又是一种感情。两者加在一起，就会成为极大的坚不可摧的力量。请看看汤自己的话吧：“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一个国家历史的自然演变过程。任何个人，包括那些兴风作浪者，都不能主宰它的总趋势。我们只能够，也应当，为几千年来的民族文化遗产遭到的浩劫，一个伟大古老民族所遭遇的不可挽回的损失和停滞而悲伤。至于个人的遭遇则是渺小的。”假如全中国人中绝大多数都能以这种态度来对待祖国、人民和事业，肯定我们要建成一个富强的现代化的中国，会顺利得多，我们在全世界人面前的形象，比现在更高大得多。

（本文作者是汤佩松教授在西南联大时生物系的学生，解放后曾任华中师范学院、河南师范大学及湖北大学生物学系教授）

同生官宦之家
同踏光明大道

同成迷途羔羊
同尝人海沧桑

新乡起义背后的生死情谊

● 陈 泓

凝视书案上庞庆振给我的五封书信，回想“文革”后期徐绪景向我泣诉她的人生沉浮。这两位曾在新乡解放史上立过大功的人已经先后谢世。我要讲述的是他们二人鲜为人知的生死情谊。

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庞庆振乃国民党四十军军长庞炳勋之子，徐绪景是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堂弟徐世芳之女。徐世芳与庞炳勋是结拜弟兄。庞庆振生于1918年，人称小庞；徐绪景生于1919年，又名谷眠。

孩提时代，他俩曾同住中南海，常在一起玩。一次，小庞和几个男孩儿在院中打滑梯戏耍，从小瘦弱的徐绪景一旁观看，羡慕男孩子玩得快活。小庞说：“你来玩！”绪景说“不敢。”小庞说“上去！不怕，你看”——说着自己噤噤地爬上去，一出溜滑下来，高兴得哈哈笑。绪景战战兢兢地爬上去，站在滑梯高口。小庞说：“下来呀，滑！”绪景一低头，眼发黑，竟从滑梯上一头栽下来。头磕破了，满脸是血，被送到医院。小庞慌忙跑回家，庞炳勋随即领着儿子去徐府“请罪”，并赶到医院看望这位“小公主”。绪景额头上缝了几针，缠着绷带，她睁开眼看看周围的人，看看满脸沮丧的小伙伴，说：“是我自己摔的，不怨他。”晚年徐绪景给我讲这一幕时，用手指她眉毛中的一条小疤痕，说：“这就是纪念。”

后来，他们又同在天津觉民小学读书。绪景

皮肤白白的，大大的眼睛，聪明好学，热情爽朗，留给庞庆振终生难忘的印象。1989年，70岁高龄的庞庆振在给她的信中不无惆怅地说：“回忆往事，忧思难忘，与谷眠青梅竹马，幼小同窗，直至少年时代，情深意重。最是那一生的转折时代，同生存，共患难，又共同度过那艰难的岁月。”

热血青年 同坠深渊

徐绪景青年时期回到徐世昌河南故里卫辉。名为大家小姐，由于庶出，在家中实际地位不高，但她与下人关系甚好。

著名电影演员张圆曾是她家小丫头，因为长相漂亮，国民党土匪总打她的坏主意，徐绪景斗胆，行侠仗义帮助张圆从徐家逃出，远走高飞。1962年，长影剧团来新乡演出话剧《孔雀胆》，张圆特地看望她这位有救命之恩的“干姐”，并饱餐了徐绪景亲手为她做的“粉浆饭。”

徐绪景救了别人，却没有救了自己。16岁那年，父亲就逼她嫁人，她死也不从，满腔热血要抗日救国，但却上当受骗误入了军统外围学校。1938年，19岁的她开始了自己深恶痛绝又无力自拔的军统生涯。

庞庆振13岁后，由天津回北平读法文，之后，在广西柳州黄埔军校炮科和西安陆军大学就读。

1937年9月，他目睹了四十军在河北沧州

抗击日军的悲壮场面，种下了对日寇的切齿仇恨，立下誓死报效国家的宏愿。

1942年，他接到父亲病重电报，由西安赶到河南林县，服侍父病。1943年4月，20万日军对太行山大扫荡，国民党四十军一触即溃，小庞保护老父庞炳勋九死一生迂回到新乡。从此庞家父子屈身汪伪，投降日寇。尽管庞炳勋已公开事敌，蒋介石仍不希望他死心塌地，一面密令其“曲线救国”，一面想方设法给四十军以适当控制。徐绪景就是在这个时候被军统派入庞部，监视庞的“曲线救国”行动，严防其与共产党接触。

庞庆振与徐绪景重逢了，且年华正茂，一个24岁，一个23岁。但是，民族危亡，社会动荡，二人天各一方后，个人生活均发生了变化。小庞已由父母包办与贾文华成亲，贾的文化不高，人极聪明贤惠，对绪景特别关照，已成小庞的贤内助。徐绪景的境遇则苦不堪言。她逃婚离家，又被军统逼嫁，后来军统疑其夫为共党，又令她亲手杀死丈夫。她虽与丈夫没有感情，但绝不忍心杀丈夫，暗中把丈夫放跑了。

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家庭生活背景和政治生活背景下相遇，二人自然感慨万千，但是，各自都表现了难能可贵的克制。尽管双方“政见”有异，“各为其主”，却谁都不说谁的坏话。绪景对军统组织汇报从来是美言庇护小庞；而在绪景受到其他特务干扰遇到麻烦时，小庞则暗中全力予以保护。他们私下坐在一起时，依然坦叙真言。二人最大的共识是：军统是魔窟。小庞一直在寻机把绪景救出去，绪景哭着说：“军统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难办啊！”

“文革”后期，徐绪景让我看她写的化名自传小说《笨帆游闻录》，其中就记录了军统的法西斯暴虐。

弃暗投明 奔向光明

1945年1月，徐绪景在修武五里源被八路军俘获，时年25岁。应该说，这是她一生的幸

事，她终于从国民党军统的魔掌中摆脱出来。她被编入漳河训练班学习。

解放区是革命熔炉，她参加了大生产运动，看到八路军官兵一致，军民一家，她看到了真正的民主，体悟到中国共产党才是民族正统，才是推翻三座大山、领导中国人民走向繁荣昌盛的英明政党。她叛变了反动立场，要求将功补过。

1948年，徐绪景奉命下山，受命潜进卫辉城敌特机关，与敌特周旋智斗了58个日日夜夜，以其徐世芳女儿的特殊身份，再次取得敌人信任，获取了敌特重要机密，从而使我方破获了美制潜伏电台两部，人员、通讯设备一网打尽。在她的人生历程上终于掀开了闪光的一页。

庞庆振这时是四十军三一六团团长的，驻在新乡八里营飞机场一带。

1948年卫辉解放，新乡处在解放军包围之中。庞庆振从国民党军队连年败仗想到国家的前途，想到他父子两代戎马生涯，名是为国为民，实为祸国殃民，正当青春年华，却在浑浑噩噩为蒋介石卖命，个人前途一片黯淡。他陷入苦闷彷徨之中。我方从庞庆振在安阳不拆民房，对黄河大桥佯炸不炸毁来分析，认为庞有争取过来的可能，于是派徐绪景作策反工作。

但此时，徐绪景身份已经暴露，被国民党通缉，进不了新乡城。她便通过小庞表弟冯海刚来往于卫辉、新乡传递书信。并及时向中共卫辉市委汇报。徐在信中痛斥蒋介石罪恶，陈词慷慨，雄辩有力，衷言切切，感人肺腑。现节录几段：

吾兄屈身于蒋介石集团统治之下，在其“绝对服从”命令之下，意欲做到“爱国爱民”之行动，岂非幻想？“自我放光”尤为令人嗟叹之沉痛语。两条路线，一个真理，绝无第三条路线。黑暗中也有光明，此种第三条路线想法，政治上根本不可能存在，兄固达者，希试思之。

我亦孽海过来之人，如今彼岸回首，不胜感叹。法西斯思想教育，是毁灭正义青年之个性的。请问吾兄在少年纯洁时代，是否亦作“曲线救国”之和平使臣，是否愿持美国武器进攻自己同胞？

庞庆振摄于一九五〇年



吾兄身为西北军裔，不持人民自己干戈，而作蒋介石四大家族之俘虏，政治痛苦，不问可知。

谁是民族正统，不以政党着眼，应以人民为绳。我与足下，子期伯牙高山流水之谊，义不容辞，寄忠言于悬崖。

你我义友重逢之日，且待足下起义之时，悬崖勒马，弃暗投明，人民将会热诚欢迎，绝不会拒朋友于鸿沟之外也！

新乡已是兵临城下，庞庆振别无选择，他相信徐绪景的忠言，于1949年1月25日率三一六团全部、三一八团一个营、冀保十二团一部、伪国防部炮兵团一部，共两千五百余人，携化学迫击炮2门、八二迫击炮4门、五〇、六〇小炮22门，轻重机枪132挺，长短枪1300支，在道口烧酒营宣布起义。徐绪景随同解放军十四纵队首长赶到道口迎接。此举震动瓦解了四十军，为解放新乡打开缺口。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批示说：“国民党庞庆振团长，能够毅然脱离旧营垒，是光荣的行动，华北军区表示欢迎，并批准庞部起义自今日起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要认真帮助庞部团结一致，为使革命进行到



徐绪景摄于一九六五年

底而坚决奋斗！”

当地老百姓敲锣打鼓抬着猪、羊前来慰问起义官兵，庞庆振从来没有见过老百姓对他们这么好，感动得不得了，还是身边的徐绪景提醒说：“你称呼他们‘同志’，说几句话。”庞庆振激动地说：“坚决跟着共产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庞庆振、徐绪景双双走上“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光明大道。

庞庆振加入解放军后，任高炮十八团团长，参加了抗美援朝。1955年转业到本溪市，先后任本溪市体委主任、政协副主席、民革主委，1981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徐绪景则留居新乡，一直在小学教书，难得重用。在那“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岁月，她的军统特务的历史问题被人念念不忘，她策反小庞起义的功劳，竟也被歪曲为庞徐二人的“桃色事件”。直到1982年，远在本溪的庞庆振写了《奔向光明——新乡起义记》的回忆录，将徐绪景当年策反起义的亲笔信公诸于世。她久埋心底的不平才一下子迸发出来，为讨回历史公道，她将庞庆振提供的全部材料复印给市委。不久，为她落实政策，担任了市政协委员。

高山流水 生死情谊

小庞起义时30岁,绪景29岁。当时小庞的妻室已到南京。小庞有意脱离家庭,与绪景结婚,绪景却没有同意。他们分别时,小庞牵着马与她一同步行,走了很长很长的路,俩人都哭了。后来的岁月,特别是庞庆振的妻子贾文华过世后,庞曾两次派子女去新乡看过绪景,孩子们称她“姑姑”。

“文革”中,两人都受到极左路线的迫害。年过花甲的徐绪景向我泣诉她的人生经历,她痛苦地说:“我这一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和小庞生活在一起。”问她为什么,她说:“尊重贾文华,人不能没良心。”她家住在卫河北岸,从她后窗可以隔河望见新乡市图书馆老楼,她经常凝视该楼,对我说:“小庞在这个楼里驻防过。”

晚年徐绪景在我面前袒露心扉,我一直很感动、很上心。

1983年6月,绪景突发脑血栓住院,我去看她,她不会讲话直落泪,我问她是否需要代她写封信告诉小庞,她马上握住我的手点头同意。庞接到信后于6月20日、21日、22日接连三天来信三封,对绪景关怀备至,寄来药品,寄来他赴朝参战前的照片,嘱咐她静心调养,渡过难关。信中还说:“有生之年,能够会面,以叙别情,十分期待这一天。”我给徐念信时,她激动得老泪纵横,拿着信纸,左看右看……

8月上旬,徐绪景病情恶化,不幸病故。我未署名急拍电报告庞追悼会时间,庞接电即“含泪忍痛令儿子发电报请新乡市党史办于治会、傅维江二同志代送花圈并慰问家属”,又速写信给我:“今生难得见面,死又不能送葬,此人间痛苦事!面对现实无可奈何!今后人世间我失去一知友。她是一个疾恶如仇,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而走过一段十分波折与痛苦的道路的人,我想盖棺可以论定矣!”庞庆振因患肺气肿一步三喘,来不了。让我帮他办三件事,其中一件是让我想办法把绪景的骨灰分装一点邮给

他,他要“装入骨灰盒祭悼。”

追悼会那天,我早早儿到了陵园,将贴有“庞庆振敬挽”字样的花圈悄悄地放在徐绪景骨灰盒左边第一的位置。事后,我将《悼词》及她临终时病状告小庞。只是没有给他寄去绪景的骨灰,惟一的原因是怕他见了骨灰伤心过度而发生意外。不过,我对自己没有了却一个痴情老人的心愿而时常内疚。

1989年,我因为想写点什么,致信庞庆振,询问他与绪景之间的感情问题,庞回信说:

我的一生始终不能突破那缠绕窒息的封建壁垒,是悲剧人物,伴随着祖国的灾难,总是事不如意,壮志未酬,多负知己,尤其是每每想到绪景,止不住的热泪,一幕幕,一件件,竭尽全力,日日夜夜以战斗姿态去工作,以此寄托精神,告慰故人。

你们是知己,无话不说,往事必知之甚详,我也无须回避。人世间知情者仅您一人了。秋风初起,雁将南迁,遥望知音,不胜依依……

庞庆振邀我到本溪畅叙,因工作忙一直未能成行。更遗憾的是,庞庆振已于1992年与世长辞。所幸书信还保存完好,今拿出捧读再三,从字里行间我看到了幼年、青年、老年三个时期的庞庆振和徐绪景。他们中间有着真诚的、始终不渝的知音之爱、知音之谊。这种爱和谊在历史的大转折时期,化作奔向光明、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贡献给了国家和人民。他们高山流水般的生死情谊蕴藏着圣洁而又无私的爱,是高尚的,不朽的。

短信一纸遥寄二君

小庞、绪景:

魂兮何方?新乡解放已经五十周年,如今改革开放,国富民强,豫北大地一派升平景象,回来看看吧,梓里乡亲等候您们共叙沧桑。

归来兮!归来兮!

你们的朋友 陈泓
(责任编辑 洛松)

“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近年来人们对这话已不再怀疑。可是，如何才能防止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今年8月29日因在瓜田李下未避嫌而被终止聘用合约的香港特区政府税务局长黄河生的事例说明：任何一个政府绝不能把廉政的主要希望仅仅寄托于政府公务人员的道德自律上，政府的廉洁最终要靠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民主监督和以权力相互制约的政治体制来解决，要靠铁的法律和法规以及铁面无私、高效运作的监督体制来解决，只有这样，才能不分尊卑老少，真正实现法制面前人人平等，谁敢违犯就严惩不贷。

香港税务局长 未避嫌遭解聘始末

● 萧 徐

今年6月17日，香港税务局局长黄河生正在北京与有关税务机关商谈公务。这位1996年上任、掌管香港税务并有着良好业绩的人，这天因香港一份畅销报纸在头版全版刊出的一条爆炸性新闻，立刻成了港人眼里没有公信力的入。

这家报纸头版的大标题是“税务局长妻子开报税公司”，副题是“黄河生涉利益冲突”。文章是根据一封匿名来信的投诉进行调查后写成的。文章指出，黄河生的妻子郑丽容在湾仔（香港的金融区）开设一间税务公司，为各大小公司提供各类报税服务。该税务公司的办公地点就设在黄河生夫妇名下的物业里，又聘请前税务局雇员任职。查阅过该间名为“企业秘书税务有限公司”的商业登记资料（香港所有商业机构的注册资料都可以供市民公开查询），发现该公司实际上由黄河生的妻子郑丽容担任大股东，占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股份，而该公司所在的物业业主就是黄河生夫妇合组的“企业代理有限公司”，黄河生个人拥有“企业代理有限公司”的一份股份，间接与“税务公司”存在关系；而据“税务公司”的职员透露：该公司熟悉香港税务，能为客户减轻税务责任及罚款。该文还指出，记

者在发稿前就此事询问掌管特区公务员操守问题的公务员事务管理局时，公务员事务局的发言人表示手头上没有相关资料，无可奉告。

这个标题及文章所披露的内容，随即在香港社会引起巨大的反响，各大传媒当天迅速跟进，在香港酿成了轰动一时的“黄河生事件”。

对于看惯听惯一些腐败行为的大陆读者来说，对香港这么做或许会有“小题大做”的想法：不就是税务局局长的夫人开税务公司，税务局长间接与“税务公司”有点关系嘛，何至于这样兴师动众。但是，了解香港有关公务员法律法规的读者就不会作如是想。

为防止公务员在工作中出现徇私行为，或影响政府的公信力，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区政府延续了一套严谨的公务员涉及利益申报制度。制度规定：高级公务员必须完整地、不断地申报他们所涉及的利益冲突，以便政府内部的监督部门进行监督。而最高级的司长级公务员，像政务司司长、财政司司长、律政司司长，向政府所申报的资料必须公开给市民查阅，让市民进行监督。司长以下局长、署长级别的公务员，申报资料由政府掌握，不用公开。

担任税务局长的黄河生，在香港特区政府

架构中属于“首长第六级”，英文简称“D6”，税务局长的直接上司是库务局长，黄河生申报的利益冲突内容也掌握在库务局长俞宗怡手中。

在香港，掌管特区政府内部事务的是公务员事务局。该局在公务员的行为操守涉及有关条例时，要介入调查，然后采取行动。根据公务员事务局有关利益申报的规定，作为“D6”级的黄河生，必须向特区政府申报三项资料：1、每两年申报一次在香港以及香港以外地区的投资；2、配偶的职业；3、每次进行二十万港元或以上、或相当于三个月月薪（以较低者为准）的投资交易，不管任何项目，都必须在交易后七天内向政府申报。这些需要申报的投资包括在香港以及香港以外地区所持有的任何股票、直接或间接拥有的任何房地产。但个人银行存款、单位信托人寿保险和政府债券则不属于投资范围，不需要申报。

以传媒所披露的情况与上述特区政府对公务员的管理对照，黄河生其妻开设帮人避税的税务公司，而他本人身为税务局长却又持有该税务公司上级公司的象征性股份，显然涉及利益申报不实。

在北京的黄河生对此或许仍蒙在鼓里，但特区政府面对舆论却无法无动于衷。公务员事务局通过发言人向港人许诺：立即对这起事件进行了解，在此之前暂不发表评论。但是，发言人重申：根据公务员事务条例规定，公务员必须避免进行任何表面上或实际上可能与公职发生利益冲突的投资；该局也要求公务员申报任何与公职有冲突的利益及投资。

而传媒界并不甘于等待公务员事务局的调查结果。稍后，各家新闻机构各显神通，纷纷公布调查结果：该税务公司除了黄妻郑丽容是大股东外，另外两名小股东，则分别是郑丽容的父亲和兄弟，也就是黄河生的岳父和妻舅。

6月20日，黄河生从北京返回香港，刚下飞机便被数十名记者包围，要求他对这一事件解释。黄河生显然在北京就已知晓香港的事情，因而对此并不惊讶。面对着记者的追问，只表示要先向港府交代，此外无可奉告。但是，记者们并不满足于这样的回答，依然穷追不舍。黄河生

被逼无奈，才言语激动地说：他对此事“问心无愧，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又说向港府交代后“自有公论”。黄河生也许坚信自己是无辜的，但他这种官僚式的回答却引起香港社会的普遍不满。一名立法会议员毫不客气地批评说：黄河生不应以“清者自清”这种莫名其妙的说法来搪塞，作为一名高级官员，“清者更要澄清，否则水洗都不清！”

6月21日下午，黄河生以书面形式向公务员事务管理局局长林焕光递交解释函件，但是，面对媒介的追问却依然保持沉默，并拒绝透露何时向其直属上司库务局局长俞宗怡面谈。公务员事务管理局的反应也很谨慎，表示要对黄河生的解释进行研究才能评论，同时拒绝透露黄河生本身有没有依照规定向政府申报有关利益冲突。

6月22日清晨，公务员事务管理局局长林焕光正式召见黄河生，要求黄河生就利益冲突事件进行解释。据披露，在两人见面时，黄河生解释说，早在1988年他尚未担任税务局长时已经就有关利益冲突向政府申报。林焕光对此解释并不满意，他的理由是，事隔太久，当时的记录已经销毁，因而黄的解释并不足以说明问题，况且黄并没有在最近的九八年度申报有关利益冲突。林焕光甚至说：“就算是一股也要报！”黄河生这才改口承认自己是一时疏忽，漏报有关资料。

当天，特区政府传出消息说，一旦有证据证明黄河生在知情下仍刻意隐瞒利益冲突，港府必定会进行处分。

6月23日下午，林焕光与黄的上司库务局局长俞宗怡一起，召开高层紧急会议。会议进行了几个小时，初步认为黄河生极有可能触犯了有关利益申报制度的规定，决定向司法部门征求法律意见，研究事件的处理程序。

当晚，暂代陈方安生履行政务司司长职务的孙明扬公开表示，考虑到事件的严重性，政府将会尽快向公众交代。他强调，无论港府采取什么行动，都必力求公平对待黄河生，以及符合公众利益。

6月24日，林焕光和俞宗怡召开记者招待

会,公开表示,黄河生隐瞒利益冲突的表面证据成立,立即通知黄河生马上离开工作岗位,休假一个月。同时,特首董建华授权政府审计署,依法调查黄河生在担任税务局长期间,有无处理过其妻的“税务公司”的个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区政府的《公务员事务规例》第十二章第三款,公务员不得令本身所处地位,引至职责与私人利益有所冲突,不得令政府声名受损,不得利用公职谋私利,不得令人对其诚信有所怀疑。假如公务员违反规例,政府可按事件的严重程度给予相应级别的处分。

根据上述规定,如果黄河生有参与处理过其妻的“税务公司”的个案的话,表示黄河生明显违反规定;如果黄河生在处理这些个案时有徇私行为,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8月4日,特区政府审计署完成对黄河生的工作调查,并将报告呈交特首董建华。在社会的普遍关注下,董建华顺应民情,承诺要在适当时机,尽快将报告全文向社会公开。

审计署的部分调查报告指出,黄河生在1996年开始担任税务局长至今,曾经亲自接触和处理过其妻郑丽容的“税务公司”的政府税务档案。这样,黄河生所犯的错误比起已经认定的“隐瞒利益”又严重一层,特区政府马上研究政府的税收是否因黄河生的行为而有所减少。幸好,后来的事实证明,港府的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不过,在审计署介入调查前及调查期间,黄河生回答媒介的追问时,仍然坚持自己是无辜的。他为自己开脱的理由是,当局设计的利益申报表过于简单,而且申报表没有详细规定填写要求,才导致他在填写“配偶职业”一项时只填了“公司董事”,而没有详加说明,并不是自己成心隐瞒。但是,黄的这种说法显然无法使人置信。因为当局提交给立法会的文件透露,在现行申报制度下,当局已经劝告十一名已经申报利益的官员放弃部分可能导致利益冲突的投资、或将有关投资交由他人全权托管。对此,林焕光一针见血地指出:政府内部早有明确规定申报的尺度,和表格设计无关。

因此,黄河生的解释,也并没有获得媒体的同情,而媒体的多项民意调查却显示,大部分市民认为黄河生隐瞒利益冲突,已经不具备担任税务局长的诚信。

8月6日,特区政府将调查报告副本交给黄河生,并要求他在7天内对报告内容提出书面答辩,给他一个最后解释的机会。黄河生连夜针对报告内容逐条反驳,并在第二天马上把答辩呈交政府。黄河生面对传媒时,仍然一再表示自己做事坦坦荡荡,绝无徇私行为,也绝对不会引咎辞职。

媒体披露了黄河生的答辩书。他在答辩书中说:“我想我做了什么,一件十五年旧事,经传媒报道,再加上公务员事务局初时误导公众说我没有向政府申报,愈描愈黑,如今审计署长证明我能秉公办理我妻子公司的税务档案,我却受到传媒和政府的不断‘公审’。我承认我漏报10元股份的投资于一纯持有物业之公司(相当于1341元净资产值),就此而已……”

但是,黄河生的书面解释,仍然摆脱不了被解职的命运。

8月19日,特区政府召开记者会,由林焕光和俞宗怡公布对黄河生的最终处理方式:立刻终止合约!

理由是1:黄河生违反内部规定,先后七次直接处理其妻公司代表的税务个案,造成与公职冲突的情况;2:没有向上司申报其妻拥有的“企业秘书税务有限公司”与其公职存在潜在利益冲突;没有按照公务员利益申报规定,申报他在“企业秘书税务有限公司”所作的一股价值十元的股份。林焕光指出,经政府详细调查后,没有证据显示黄河生工作当中有徇私行为,也没有证据显示政府因他的行为而受损,因此,咨询过律政司刑事检控专员的意见后,决定不会对黄河生作刑事检控。

但由于黄河生是因行为不当而遭解聘,当局决定取消他原有的九十多万元约满酬金作为惩罚(黄河生1998年原本已经从特区政府退休,然后以合约的形式继续受聘于特区政府)。

特区政府采取的这一处理方式,也是经过多方斟酌的。其主要考虑是快刀斩乱麻。

消息灵通人士指出,调查报告证明黄河生

有利益冲突,还犯了三项严重错失,根本再无公信力当这个敏感部门首长,因此要他离职已是政府最基本的考虑。可选择要达此目的,方案有三:黄自行辞职;解雇;终止合约。

但是,第一方案主动权在黄的手上,特区政府无法控制;第二方案“解雇”涉及繁复程序,包括容许当事人就解雇作出申诉等,花耗时间太长;而采用第三方案即终止合约,这一在公务员惩处制度中较温和的方案,无疑是比较合适的。

于是,黄河生成为香港有史以来第一名被香港政府即时终止聘用合约并马上公布其中缘由的首长级高官。

在记者招待会上,林焕光表示,黄河生事件是“一宗不幸的事件”。虽然没有证据表明黄河生的行为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但“无论动机是什么,他都不应处理由其亲属处理的公司代表的个案,这个在税务局的内部指引已经很清楚”。一名港府高级官员表示,黄河生作为一个处理敏感

资料部门的首长,却“有法不依,有规矩不守”,绝对是“行为不当”。他说:“我们很失望,他(黄河生)应该做到 Whiter Than White(比白色还白,意味无懈可击)的职责才对。”

对于黄河生在书面表明中,认为政府在处理此事上有欠公平的说法,特区政府官员强调说,当局对此事的处理手法依足规例程序,负责的官员更是“守口如瓶”,完全谈不上任何“抹黑”;审计署长所进行的调查工作是独立运作的,其他人士不能过问。

黄河生表示不服处分,将向法庭申请司法复核,以期推翻政府的决定;立法会议员认为政府对黄河生的处分不够严厉,应该采取更严厉的纪律行为,并计划鞭策政府进一步加强对公务员的监督;绝大多数市民认为终止对黄河生的聘用合约是合适的,连公务员团体都一致支持政府的决定。

一波三折的黄河生事件最终落下了帷幕。

作者更正

编辑同志:

拙文《庐山会议四十周年感言》一文(载第八期),文末所引“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句,系出自杜牧《阿房宫赋》。笔者仅凭记忆未核查引文,误为《过秦论》,并误说是李锐同志书中引用。希望予以更正,并向李锐同志及广大读者致以深深的歉意。

余广人

一册在手纵览百年风云 开卷有益解读人世沧桑

纵横月刊

追求信实精彩 凸显三亲特色

重视读者参与 欢迎订阅赐稿

行将结束的20世纪给中国留下了一部厚重的历史,《纵横》将通过解读事件的来龙去脉、人物的悲欢离合、社会的千姿百态,和您一道回味这段大悲大喜的历史。

本刊特色 亲历、亲见、亲闻,荟萃历史事件当事人、见证人以及各界知名人士回忆,在忆述中还原历史。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真实、鲜活、令人如历其境。

本刊题材 纵贯20世纪的每一阶段,横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人物及社会百态。

本刊追求 更具史料价值,更高思想品位,更富文化含量。

依靠全国政协委员组织庞大的高水平的作者群,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办,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诚邀作者踊跃赐稿,恭请读者从速到各地邮局订阅。

国内外公开发行 国内邮发代号2-300

每月7日出版

每期定价4.00元,全年48.00元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100811 电话:(010)66192569

继续开来 承百代文采风流

期期都有拍案惊奇 篇篇都是精彩文章

今古傳奇

谈古说今 汇四海传奇精品

本刊三大闪光点:

- 独特的传奇风格
- 独创的质量品格
- 独到的文学神韵

每逢单月15日出版,定价9元,全年6期54元。
邮发代号:38-83



遥望神州的太平洋孤岛战俘

● 张泽石

近半个世纪前，我们上万名炎黄子孙曾被囚禁在一个太平洋孤岛上，日夜思念着中华故国。如今，尽管我们已经历了无数岁月沧桑，当年孤岛上那撕心裂肺的凄风苦雨，囚窗外那震耳轰鸣的大海怒涛，仍常出现在我的梦魂之中。

我们是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而身陷囹圄的。在那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中，中华儿女为了保家卫国曾经付出了巨大牺牲。我们不少战友血洒疆场，而我们自己则由于种种不可抗拒的原因陷于敌后，又突围不成，在未被冻死、饿死、病死之前不幸被俘。

被俘后，我们为没能“杀身成仁”保全名节而痛感羞耻，更为打了败仗没实现保家卫国的誓言而深感愧疚，我们不少人想过自杀、逃跑、甚至去跟敌人拚命，但都因敌人看管甚严，自己又手无寸铁、伤病缠身而不能如愿。当我们被押进战俘营，面对层层带尖刺的铁丝网和四周岗楼上那闪着寒光的机枪口，我们才清醒地意识到我们这些囚犯失去了不只是人身自由，更可怕的是失去了祖国的呵护，我们已成了离开母亲的孤儿。那种无依无靠的失落感，比起战俘营里种种生活上的艰辛更使我们痛苦百倍。

更不幸的是，正当我们在日夜思念祖国和父母妻儿时，岛上的战俘营管理当局却开始执行当时美国政府对华战俘的罪恶政策：强迫我们背叛祖国，强迫我们在停战后拒绝回国而去“投奔自由世界”。

开始，他们派一些神父、牧师来“传教”，动员我们皈依“天主”、“上帝”，远离“共产主义魔鬼”。后来就派遣一些经过训练的特务混入战俘

营，在战俘中物色叛徒和变节者，委以重任，让他们去控制战俘营。同时成立“战俘警备队”，以“维持秩序、防止暴乱”为名，用种种血腥手段来镇压战俘们的反抗。一旦实现了对某个战俘营的白色恐怖统治，便胁迫战俘去唱反动歌，喊反动口号，甚至强迫纹身，在肉上刻下永远洗不掉的诸如“反共抗俄”、“杀朱拔毛”等反动字样，正是这种阴险的政治陷害，终于使得许多难友丧失了重返祖国的勇气。

面对如此严峻的考验，我们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和祖国荣誉，除了奋起抗争，别无选择。我们自发地、分散地秘密成立了不同名称的地下组织，在难友中展开爱国宣传和气节教育，并采取各种策略积极夺取战俘营的基层控制权。在斗争中我们不断联合起来，壮大队伍。于是，在韩国巨济岛上第72号和86号两个各自关押了近万名中国战俘的集中营里，爱国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

1951年10月9日，第86战俘营的爱国战俘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夺旗斗争”，烧毁了叛徒们为了制造“中国战俘心向蒋介石”的假象，准备在第二天“双十节”升起的那面青天白日旗。随即全副武装的美国兵开进营场，指挥叛徒将我们八十多个斗争骨干抓到警备队毒打，年仅20岁的王绍其被活活打死。我们这八十多人也都被美军关入刑事罪犯监狱。

1951年11月7日，第72战俘营军官大队里的百余名志愿军排以上干部通过艰苦斗争，迫使敌人将他们调到第71战俘集中营，随即我们这八十多名从监狱出来的誓死抗拒进入72战俘营的“红色暴乱分子”，也调入71战俘营，从而成

立了岛上第一个“坚持回国的中国战俘营”。

1952年4月8日,美方对岛上的中国、朝鲜战俘强行实施“遣返志愿甄别”。中国战俘营的特务叛徒秉承其主子的指示,采用一切手段阻止战俘们表达回归祖国的意愿。在这决定终身命运的关键时刻,战俘们进行了激烈的反抗。从四川大学参军的林学逋,在72战俘营站出来公开号召难友们回国,而遭到叛徒剖腹挖心示众。黄埔军校第22期起义士官生阳文华,因坚持拒绝去台湾被毒打致死。71战俘营为激励“72”战俘营的难友表达回国意愿,升起了岛上第一面五星红旗,遭到美军开枪镇压,致使三名难友受重伤,而在韩国釜山的志愿军伤病战俘们以绝食、升五星红旗来抗拒美方的非法甄别,竟遭到美方惨无人道的断药、断粮、断水的惩罚,直到用坦克冲进营场开枪屠杀。

在那次血腥甄别中,由各中国战俘营拼死冲出来的六千多名志愿军被俘人员被集中在巨济岛第602号战俘营。我们自己将它取名为“中国战俘回国支队”。我们重新按照部队的建制组建了我们这个“回国支队”。教导员孙振冠被推选为支队长,我被任命为支队总翻译。我们支队还秘密成立了取名为“共产主义团结会”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团政委赵佐端担任总书记。从此,

我们这些被美方称之为“死硬共产分子”的中华儿女重新形成一支战斗队伍,并有了自己的核心领导。我们在“团结会”的领导下,在朝鲜人民军战友的配合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斗争来揭露敌人血腥甄别罪行,并坚决要求对我们那些所谓不愿回国的一万六千名难友重新在没有任何威胁条件下进行“甄别”。美方对我们的严正要求根本不予理睬,更加激起了我们的义愤。

1952年5月7日,巨济岛第76战俘营的朝鲜人民军难友在我们的配合下,奋勇扣留了美军战俘营总管杜德将军,迫使美方在“76”战俘营召开了“朝中战俘代表大会”。孙振冠和我由“共产主义团结会”委任为中国战俘总代表参加了大会。在代表大会上,我们和朝鲜战友们一起控诉了美方为胁迫战俘背叛自己的祖国所犯下的种种罪行。杜德将军在铁的事实前面认了罪,这一事件震惊了全世界。老羞成怒的美国当权者对我们进行了残酷的报复,血洗了“76”战俘营并将我们全体代表判为“战犯”投入岛上的最高监狱。

“杜德事件”之后,美方将中国战俘发配到离韩国本土更遥远的济州岛上。孙振冠和我则被关进巨济岛上的“战犯集中营”长期隔离拘留。



遭到美军
残酷镇压的志
愿军战俘

我们六千多名坚持要求回归祖国的中国战俘到了济州岛后,美方对我们并未善罢甘休,而是变本加厉地采取各种手段来瓦解、摧毁我们回归祖国的意志。首先是将我们六千人分别关押在十个拘留营里,又不断派一些变节者前来指认“共产主义团结会”的领导人,将其隔离关押进离营地很远的小监狱里,还不断用高音喇叭向战俘喊话:“你们何必跟着那些共产党头头走?你们回国后只会被当成叛徒,挨整、挨斗,一辈子翻不了身。”,更严重的是常在我们外出服劳役时,指使其担任看管的士兵无理挑衅,一旦我们的人有所反抗,便立即给以惩罚,甚至开枪造成伤亡。而最令我们气愤的是美方的停战谈判代表继续在板门店造谣说大多数中国战俘不愿回国。

1952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三周年国庆节来到了。我们六千多名远在异国孤岛上的中华儿女怀着对祖国母亲的无限思念和对敌人的极大义愤,升起了十面五星红旗。那迎着太平洋的狂风,傲然飘扬在铁丝网上空的国旗向世人述说着我们对祖国的向往与忠诚。然而敌人惶恐了,开来了十一辆坦克和两个营的士兵。当荷枪实弹、带着火焰喷射器的士兵强行进入首先升旗的七号营场去夺取我们的国旗时,遇到了我们护旗敢死队员们的顽强抵抗。赤手空拳的

难友们和敌兵展开了肉搏,敌人悍然开枪了,敢死队员们肩并肩围着旗杆,以血肉之躯,在六千战友雄壮的国歌声中阻挡着妄图夺旗的敌人,当一批又一批队员倒在血泊里,最后一名敢死队员降下了红旗,在旗帜燃烧的烈焰中,与国旗同归于尽……

这就是1952年国庆节,在韩国济州岛海边一个荒凉的土岗上发生的事情。半个世纪过去了,烈士们的遗骸恐怕早已化为太平洋的苦水。啊,忠魂归来兮!

岁月匆匆,过了几十年再来回顾当年在美军战俘集中营里的那场斗争,我们对于那场斗争的实质,以及为什么我们这些志愿军被俘人员在斗争中会有那样的表现,有了更深的认识。

我们这群炎黄子孙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目睹了甚至亲身参加了打败日本鬼子侵略和打垮由世界第一强国美国全力支持的蒋介石反动腐败政权的战争。那个响彻全世界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声音还回荡在我们耳边,那如旭日东升的新中国的万丈光芒还闪耀在我们眼前。我们曾为新中国的诞生流血流汗,即使我们被囚禁在异国孤岛上受苦受难,也是为了她——我们的人民勤劳、江山壮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祖国啊!对



我志愿军被俘人员到达我方接受站后,抛掉美军的衣物。中立国印度看管军抬着被美军打得遍体鳞伤不能行走的被俘人员

我们中国战俘中所有的爱国者来说，美军战俘集中营无非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反抗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又一个战场而已。美国当权者竟然想强迫这样的中国战俘放弃做人的尊严、放弃自己的信仰、背叛自己的祖国，谈何容易。

今天，在欢庆建国 50 周年的日子里，重温当年我们在那个太平洋孤岛上遥望故国的心情，我们也更深地理解了什么是“祖国”。

祖国！在我们那段异常艰难的战俘岁月中，我们曾多少遍痛苦地思念过你。当我们站在忠贞与背叛的十字路口，必须独自做出将决定终生命运的抉择时，我们曾经深情地呼唤过你。而当我们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归祖国怀抱之时，我们又曾为你洒下了多少激动的泪水！

那时，敌人把我们这些坚持要求回归祖国的战俘，一律视为“死硬共产分子”。其实我们归国的六千人并不都是共产主义者，相当多的难友当时仅仅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们相信是共产党救了中国，他们出于爱国之心而亲近共产党，正是这种爱国之心成为我们全体难友忍受苦难、拚死斗争的最基本最深沉的动力。

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祖国怎么会那样地吸引我们去爱她呢？甚至心甘情愿地为她献身呢？难道仅仅是由于那是我们生长的地方？是我们祖先坟墓之所在？这里有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有我们熟悉的语言文化？

我们是在被迫离开祖国怀抱，在异国受尽迫害，付出了鲜血和青春之后，才真正懂得了“祖国”这个概念所包含的无比丰富的内涵的。那时我们在阴暗的囚牢里，抚着身上被敌人鞭笞的伤痕时所深深怀念着、渴望着的一切之总和，原来就是我们亲爱的祖国啊。从哺育我们成长的慈母的香甜乳汁，家乡清清的泉水，到给我们以知识与智慧的中华文明、光辉历史；从滋润



1953 年 8 月，杜平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慰问我方被俘归来人员

我们生活的甘露、鲜花、阳光，到温暖我们生命的亲情、友情、爱情；从体现我们生命权利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到体现我们生命价值的学习研究和创造性劳动……这一切正是在战俘集中营里被完全剥夺了的。那时，这一切对于我们如此遥远又如此珍贵。那时，我们曾多么惧怕会永远失去她啊！

50 年来，尽管我们的祖国走的是一条曲折艰难的道路，而我们这些“归俘”更是历尽坎坷，我们却从未后悔过当年我们做出了回归祖国的抉择，也从未动摇过对祖国的爱，这正是由于在我们内心深处总抹不掉当年在战俘集中营所深深铭刻下的对祖国的感情和认识。

现在，我们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我们那些当年为国壮烈牺牲在战俘营残酷斗争中的难友们，他们的忠骨已长久地留在韩国釜山、巨济岛、济州岛上。当年我们无法带回他们的遗像长留人间，几十年来又未能一一去慰问他们的亲人共寄哀思。烈士们既未能看见 20 年来改革开放后的祖国的巨大进步，也无法跟我们一起共享节日的欢乐。我们谨在此向他们的英灵呼唤：

啊，安息吧，长眠异国的亲爱的战友们，你们当年为之献身的祖国已经春回大地、奋起腾飞了！

（责任编辑 李 城）

“五四”前后鲁迅的民主、科学思想

● 汪 京

大致和“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同步的“五四”反封建新文化运动，高高举起了“民主”和“科学”这两面旗帜。鲁迅是这一运动当之无愧的主力。

可是不能不承认，鲁迅“五四”前后的著作中，“科学”一词使用频率不算高，“民主”二字连在一起更少见。但鲁迅当时是主张“人道”，而反对“兽道”和“鬼道”的。他在1918年3月10日致许寿裳信中，把上海《时报》的报道为徐班侯“灵魂照相”一事，称为“人事不修，群趋鬼道。”同年8月20日致许寿裳信中，则把当时教育部某人售妻妓院事，称为“极人间之奇观，达兽道之极致。”何谓“兽道”？封建道德也。何谓“鬼道”？封建迷信也。此二者，实为封建制度一母所生之双胞胎。封建道德“吃人”，封建迷信“蒙人”。宣扬封建道德，借助封建迷信；宣扬封建迷信，推广封建道德。“兽道”的对立面是“人道”，“鬼道”的对立面也是“人道”。鲁迅反对“兽道”和反对“鬼道”而倡言“人道主义必将胜利”，实际上正是呼唤“民主”和“科学”。

把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归结为“吃人”二字，是五四前夕鲁迅思想的一个突破。他在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信中，谈到《狂人日记》的写作时说：“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种族，因成此篇。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不难看出，鲁迅对自己的这一“发现”，是颇为自豪的。他在《狂人日记》中宣布了这一“发现”：“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

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而“吃人”和“蒙人”永远是互为狼狈的。揭露“吃人”现象、“蒙人”现象，抨击“吃人”思想、“蒙人”思想，便成为五四时期鲁迅大量著作中最突出的共同主题。他在《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小说中，在《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论文中，在1918、1919年间为《新青年》所写的《随感录》中，对三纲五常、忠孝节义、封建迷信、鬼神思想等形形色色的“旧道德”、“旧思想”、“旧学说”、“旧见解”、“旧习惯”、“旧本领”、“旧方法”、“旧手段”，“进行了全面批判，大量描绘和论述了封建礼教、等级制度“吃人”的问题，封建迷信、偶像崇拜“蒙人”的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国民的落后、愚昧、奴隶性诸问题。而这些，实质上正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带有当时中国特色的有关“民主”、“科学”的重大问题。

鲁迅著作中少见“民主”一词，因此也就少见他对“民主”一事的诠释。但我以为他当时著作中显示“民主”思想，却是极其深刻的。我认为他心目中的真正的民主，实具有三个层次：一是政治上的，二是经济上的，三是精神和思想上的。

政治上的民主，就是要改变长期以来中国人所处的奴隶地位，甚至下于奴隶的地位，争取到“人”的资格。这是鲁迅在《坟·灯下漫笔》中沉痛提出的，所谓“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先儒们所谓的“一治一乱”，不过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因此他号召：“创造这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

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经济上的民主,在《坟·娜拉走后怎样》那篇著名的演讲里,说得清楚:“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要紧了。”“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

至于精神和思想上的民主,我以为是鲁迅民主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这其实也就是作为鲁迅爱国主义核心的“立人”思想。国家的兴衰,和人民的素质有着直接的关系。国民愚弱,国家难以真正富强。正是为此,他在留学日本终于弃医从文时,发出了这样的慨叹:“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于是,他在从事文艺运动的一开始,便在《文化偏至论》中系统阐述了他的“立人”思想。他尖锐指出:“是故交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在他看来,只有“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才能“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至于一切“肤浅凡庸之事物”,都不在话下的。

此后他倡导“个性解放”,强调在精神界进行战斗,直到五四时期从事思想革命,强烈抨击吃人的“兽道”和蒙人的“鬼道”,以他的小说和杂文批判一切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旧礼教,其目的显然都是为了“立人”,为了求得人的解放,“以为只要扫荡了旧的成法,剩下来的便是原来的人,好的社会了。”即使到他后期积极投身文化斗争以至政治斗争的时候,他在致力于打碎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政治、经济枷锁的同时,仍然不忘解开缠在人民身上的精神和思想枷锁,以取得不但在政治上、经济上,而且最后在精神和思想上也不被奴役、完全自己当家作主的地位。

鲁迅对科学的重视,也是一以贯之的。他在1906至1909年撰写《人之历史》、《科学史教》《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重

要论文时,就不仅倡导了“个性解放”思想,强调了应在精神界进行战斗的思想,同时也宣传了“科学救国”思想。鲁迅重视科学,毫不奇怪。他先学海军,继学开矿,复学医术,与此同时又接触和接受了进化论,涉及的都是自然科学领域。值得注意的是,他站在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立场上,尖锐批判了西方科学发展史上的力图阻止生物进化学说发展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以及当时中国的“抱残守阙之辈”和“死抱国粹之士”。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强调了科学和改革社会的关系,他指出:“盖科学者,以其知识,历探自然现象之深微,久而得效,改革遂及于社会。”“洪波浩然,精神亦以振,国民风气,因而一新。”他在1919年4月16日致傅斯年信强调:“现在偏要发议论,而且讲科学,讲科学而仍发议论”,这样,鲁迅就把“科学”与“民主”、“爱国”紧密联在了一起。

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五四前后一批仁人志士共同致力的倡导民主、科学的反封建启蒙运动。鲁迅曾把旧中国、旧社会比作一间无门无窗的铁屋子,人们在屋里熟睡都快闷死了。有几个先醒过来的人,想把其余的人也唤醒,一起来毁坏这铁屋子。我以为这就是“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的深意和写照。

而从事启蒙工作呼唤民主、科学的最终目的,则是人的解放,亦即鲁迅一贯主张的“立人”。在鲁迅看来,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不但要从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侵略下解放出来,从各种各样的封建统治下解放出来,从无所不在的等级制度、家族制度的架构中解放出来,从弥漫人间的求神拜佛、算命打卦、神功异能等种种稀奇古怪的封建迷信中解放出来,还要从一代代积淀而成的历史重担下解放出来,从一切束缚、戕害、虐杀人性的思想枷锁中解放出来,特别是还要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愚昧、奴性中,也即从被扭曲、异化了的自我中解放出来。

欲求中国之进步,之真正现代化,这是必经之路,绕不过去的。

可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伟大的启蒙运动,却如电光石火,在发出短暂的一片耀眼光辉后,迅即暗淡下去了。何以故?或以为是由于救

滴泪是金

● 杜正

去年末中央电视台播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刘少奇百年诞辰纪念会。小品：刘少奇 1959 年回乡了解人民公社到底成功与失败，先到他嫂嫂家，小侄女回答刘少奇提问的“能不能吃饱饭？”答：“今天能吃饱！”“为什么？”“今天来大干部，一人加了一碗饭！”小品演到此处，荧幕上特写镜头中的刘少奇儿子刘源，禁不住热泪滚滚。笔者熟悉那段国情，不敢忘怀那段国情，自然也流下泪来。现离休的当年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1979 年底到金寨县了解民情，一户人家，主人是中年妇女。万里问：“你家几口人？”“夫妻和三个小孩。”“小孩哪去了？”“玩去了。”“能不能找回来我看看？”主人面有难色。在万里再三恳催下，主人掀开灶上的锅盖，只见灶堂里坐着三个赤身的小孩。原来是数九寒冬，孩子无衣，妈妈利用灶堂余热，饭后将锅搬去，放小孩进去避寒。万里看到这儿，禁不住老泪纵横，连连说，我们共产党对不起乡亲们啊！以后，万里不避凶险，那么大刀阔斧搞包产到户，原因许多，很重要的一条，是他了解到实情，落了泪，以致把心横了下来。看来，泪，也是个好东西。

亡运动的继起，所谓“启蒙”和“救亡”的矛盾。在二三十年代，日帝亡华的野心昭然若揭，救亡图存自是要务。但令我不解的是“救亡”和“启蒙”怎会发生矛盾呢？“救亡”不是更需要“启蒙”，更需要唤醒民众、发动群众吗？不是连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在遗嘱中也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吗？爱国、进步与民主、科学的启蒙和实现是分不开的。当然如果是名为“唤醒民众”，“发动群众”，实为利用民众、玩弄群众，那就是另一问题了。前者需要启蒙运动，后者需要愚民政策。

因此我以为导致“五四”启蒙运动式微以至夭折的，决不是什么救亡运动，而是当时当权者以国家机器、专政手段为后盾的愚民政策。无权无勇然而思想先进的一批知识分子不自量力闹起来的启蒙运动，总是和有权有勇的当权者处心积虑执行的愚民政策迎头相撞，胜负之数，不言自明。鲁迅一本《呐喊》，初版仅两千册，而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一声令下，全国的学生就都要埋头读经。鲁迅后来慨叹“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实是痛苦经验凝成。

其实，从古以来一切只关心一己、一家族、一集团私利的封建当权者，大概都是不怎么喜欢真正的民主和科学，因而也就不会希望他或他们治下的民众具有聪明头脑、能够独立思考

的。而扼杀民主和科学最方便的办法，就是鲁迅在《坟·春末闲谈》一文中所指出的“麻痹术”，类似细腰蜂的毒针，向小青虫身上一蜇，小青虫就半死不活了。“麻痹术”不就是愚民政策吗？于是所谓知识分子也就容易成为封建当权者的眼中钉了。因为有了知识，有时便难免要独立思考，甚至还想去启蒙别人。对这样有了知识的人，正像鲁迅在《热风·智识即罪恶》一文中描写的，阎王老爷就要把他打入“油豆滑跌小地狱”，非使他跌得发了昏不可。历代的治人者在以武功从马上得了天下之后，转入文治阶段，常常首先就是治那些具有独立思考头脑而又以启蒙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形形色色的文字狱，可以说是史不绝书。明乎此，则曾是“五四”时期文化思想战线上代表人物的李大钊上了绞架，陈独秀几次入狱，鲁迅被通缉，甚至胡适也一度曾因主张人权而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警告，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五四”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八十年来，我们所走过“民主”之路和“科学”之路，是相当艰苦甚至是十分坎坷的。前进一步很不易，后退十步却不难，正像鲁迅说过的，往往“改革一两，反动十斤”。然而社会要进步，国家要富强，民族要兴旺，共产党要领导人民过上舒心的好日子，绝对离不开“民主”和“科学”，这应是毫无疑问的。

（责任编辑 文 贤）

萧乾与林海音的“京味”之交

● 何 标

在作家萧乾的遗体告别仪式上，人们注意到有一个精美的花篮是台北作家林海音及其丈夫何凡敬托他们在北京的亲友安放的。

萧乾与林海音有着长期的交往和友谊。萧乾比林海音年长8岁，是蒙族人；林海音是客家人。这两位出身、经历迥然不同的海峡两岸作家，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早年都居住在北京，都把北京当做自己的故乡，而且至今仍然在习性、爱好、语言和文字上，保持着未经岁月磨灭的那些“京味”。

1988年8月，在韩国汉城举行第52届国际笔会年会上，林海音与萧乾初次相遇。他俩同韩国作家许世旭，进行了关于加强海峡两岸和韩国之间文化交流的对话。会上，林海音表示：“能坐在尊敬的前辈作家萧乾身旁，用同样的京味儿交谈，感到愉快和荣幸。”萧老则说他看过《城南旧事》的小说和电影，“这次能和林海音一见如故，首先就是她的京味儿”。

随后几年，林海音接连三次从台北来到北京。1990年她初次返京，首先到萧老家拜访，萧老夫妇则特意陪她访问中国现代文学馆。两年后，林海音夫妇携同两位女儿第二次来京，参加了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等单位联合举办的“萧乾

文学生涯60年展览”，林海音在揭幕式上致词。1993年11月，在林海音称之为“京味之旅”的第三次来京，她再次登门拜访萧乾，并同他一起参加了《当代台湾著名作家代表大系》的首发式。这个“大系”第一辑的编辑工作顾问，便是冰心、萧乾和林海音。

此外，林海音主持的台北纯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萧老翻译的《莎士比亚戏曲故事集》；萧老也推荐林海音为悼念沉樱女士而写的《春声已远》一文，在大陆报刊发表。他们之间在文学方面的友谊和合作，成为两岸文化交流中的佳话。

萧乾在日本投降后不久，曾做为记者访问过台湾。1990年，81岁的萧老虽曾接到访台邀请，但因台湾当局阻挠而未能成行，到台北市逸仙路林海音夫妇家中回访的愿望未能实现；林海音近几年也因年迈多病而不能远行。这两位“京味”之交的两岸作家，从此失却再度相会的机会，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萧乾(右)与林海音摄于巴金画像前

铁骨将军陈外欧

● 王宇明

钢铁是从烈火中锻炼出来的。本文记述的便是一位身经百战，铁骨铮铮，屡遭厄运，痴心不改的老红军、老将军的人生轨迹。

苦难家庭 倔强少年

他与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一样，出生在中国农村的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受着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他的生父陈端山是湖南省茶陵县严塘官冲村人，祖辈三代，无田、无林，靠给地主老财当牛作马，养家糊口，后因积劳成疾，贫病交加，于1910年含愤而亡。丢下身怀有孕的妻子和幼女，无依无靠，欲死不忍，欲生不能。后在善心的远房叔叔的帮助下，移居本县马溪滩村，苦度时光。

这年的12月26日，遗腹子诞生了。陈门有后，悲喜交加的母亲图吉利，为儿子起了一个贱名叫“外苟”。外苟先天发育不良，后天营养奇缺，所以，身躯矮小，骨瘦如柴。母亲怕孩子不能长大成人断了陈家烟火，万般无奈中含泪忍痛，将小外苟送给一个道士做了“干儿子”。岂料，这个道士虽小有家业，但为人不善。他把义子视为佣人，让他吃的是残羹剩饭，穿的是破衣烂裳，干的是苦累活儿，成天让他放牛呀，砍柴呀，种菜呀，喂猪呀，与地主对待长工没有两样。外苟人小志大，性格倔强，不甘受人歧视虐待，10岁时即愤然返回母亲身边。母子相抱，放声痛哭。从此，他留在家中，协助继父尹文光和母亲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

善良的母亲和继父，也祈盼他长大成人，支撑门户。为此，全家省吃俭用，凑些学费，让外苟

去读私塾。

然而，外苟童年的不幸一个接着一个。家境略有好转时，苦命的继父又病逝了。十七岁的陈外苟独自挑起了全家人的生活重担。一年四季，勤勤恳恳下地劳动。每到丰水季节，为了多挣几个钱，他便去河中放木排，冒风雨，历险滩，出生入死。也正是这种劳动，冶炼了他顽强的意志和不畏艰险的性格。

茶陵是毛主席创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六个中心县之一。陈外苟的姐夫谭家旺和姐姐陈奴婆早年参加了共产党。1928年1月，受党的派遣在茶陵地区领导土地革命斗争，对他走上革命道路发生了重大影响。不久，陈外苟又认识了中共茶陵县委的领导人谭趋新、周邦庸，积极为他们传送文件、站岗放哨。1929年5月，由姐夫谭家旺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国民党军队进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反攻倒算，屠杀革命群众和红军家属，陈外苟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陈外苟最先在茶陵游击队一大队当战士，由于作战勇敢很快被提升为班长。1931年扩大红军主力，陈外苟由茶陵游击队调到萧克、王震领导的红六军团。初次见面，王震见他虽个头不高，但身板结实，身着戎装，头戴五星帽，憨厚的脸上长着两只圆圆的大眼睛，着实喜人。王震亲切与他攀谈。当得知出身苦寒的陈外苟名字的由来时，王震关切地说：“你现在已是红军战士了，再叫贱名太不雅。我看改叫陈外欧吧！”

土法治伤,忍痛断指

陈外欧调到红六军团后,由于作战勇敢,思想进步,很快由班长提为排长,又由排长提拔为连长。12月,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陈外欧在红六军团配合中央苏区粉碎蒋介石第一、二、三次“围剿”的历次战斗中,不仅勇敢顽强,而且显示出一定的组织指挥才能,因此得到萧克、王震将军的赏识,被选派到永新红军学校第四分校学习。他十分珍视这一宝贵的学习机会,像一头饥饿的黄牛钻进谷仓里一样,如饥似渴地学军事,学政治,成绩优异,受到学校领导的赞扬。毕业后又被选送到瑞金中央红军大学第一期高级参谋班深造。

红军大学期间的学习内容更加丰富。除了学习学校规定的军事、政治、文化课程外,特别难得的是能经常聆听党中央和红军总部首长们的讲话、报告,这使陈外欧的政治视野更为开阔,对中国共产党与红军的认识,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和前途的认识,都有了飞跃性的提高,从而进一步坚定了无产阶级的人生观与世界观。

1934年8月,陈外欧红军大学毕业后,回到红六军团,在司令部任作战参谋。不久,红六军团撤出湘赣革命根据地,8月7日从横石出发,冲破敌军层层封锁和围追堵截,历时78天,行程五千余里,于10月24日,在黔东印江县与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二军团胜利会师。萧克在总结这次孤军远征作战时,对陈外欧是这样评价的:“他很精干,机智勇敢,在关键时刻能出色地完成任务。他不怕艰苦,不怕疲劳,是个好同志。”

红二、六军团会合后,组成红二方面军,在湘鄂川黔地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陈外欧调任红六军团四十九团一营营长,后升任四十九团团长。

1935年春,红二、六军团在长征途中,正转战在湘西大庸、龙山、桑植地区时,蒋介石调动80个团的兵力分几路向我猛扑过来,妄图将我



长征途中的陈外欧

主力部队一举歼灭。3月18日,后坪战斗打响。我军在鸡公垭地区设伏,计划歼灭敌之一路。不料,敌李觉的十九师来势凶猛,在大炮飞机的配合下,迅速攻占了鸡公垭西侧的制高点,并构筑了坚固工事,企图待后续部队上来后对我红六军团主力围而聚歼。当时,敌我互相穿插,犬牙交错,形势紧张复杂。时任红六军团十七师四十九团团长的陈外欧,机智果断,指挥全团官兵坚决攻击敌主力部队,不时展开白刃格斗,枪炮声,喊杀声震天动地,战斗异常激烈。陈外欧在高举左手手枪,挥动右手指挥部队冲杀时,一颗子弹飞来,将他的左手中指和无名指打伤,陈外欧忍着疼痛坚守岗位,继续指挥战斗。

在陈外欧看来,这不过是一次轻伤。还是在他任茶陵游击队班长的时候,夜袭清水挨户团战斗,他的右腿腓骨被打断,血流如注,在昏迷中被抬到永新县花溪医院。但那时缺医少药,医疗条件极为简陋,结果伤口感染,出现化脓糜烂。无奈,只好采用当地民间土法治伤。即用剁烂捣碎的熟鸡肉敷在伤口处,有意让苍蝇爬食

生蛆，由蛆吞食伤口浓血，然后再除去蛆虫，敷上草药治疗。这样反复几次便可治愈。年仅20岁的陈外欧，以红军战士特有的刚强意志，忍受一次次治疗的痛苦，捱过半年多的时光，骨伤刚刚痊愈，他便重返了前线。

这次手又负伤。在陈外欧意识到自己左手中指和无名指的功能已无法恢复，留下来只能增加医治上的困难时，他要团卫生队队长谭尚维马上将两个打断的手指割下来。当卫生队长因无麻醉药品为实行断指手术为难时，陈外欧说：“没麻药就不能做手术了吗？关公刮骨疗毒不怕痛，我们共产党人还怕痛吗！”陈外欧见谭尚维还在迟疑，严肃地说：“马上给我做！我这是命令你，不是请求你。”

谭队长为陈团长的大无畏气概所感动，怀着敬重和钦佩的心情，接受了这一任务。他让陈团长身靠一棵大树，由卫生员刘亮生双手端紧团长的左手，他动作麻利地用盐水冲洗伤口后，割皮，切骨，手术刀嚓嚓作响，两个指头切了下来。谭队长已紧张心痛地大汗淋漓。陈团长却一直挺直身躯，右手插腰，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在场的指战员无不为之动容。

回忆起半个多世纪前的这段往事，当年的卫生队长、现在的老将军谭尚维仍然激动不已：“陈团长是真正的英雄好汉！”当年的卫生员，后来的卫生部长刘亮生说：“这次手术教育了我一辈子！”

随军北上又请缨南下

手术之后，陈外欧带着伤残的左手率领部队继续长征北上。

红六军团是红二方面军北上长征的后卫，陈外欧时任红六军团教导团团长。他们从阿坝出发过草地，仅带着可维持三天的干粮，可是他们在茫茫沼泽草地跋涉了九天。在可食的草也难寻找的情况下，曾多次击退反动土司的骑兵袭击。在爬越高耸入云的大雪山时，空气稀薄，气候恶劣，天寒路滑，稍有不慎就可能陷入雪坑或掉下山谷。陈外欧为了接应后续部队和保证



出狱后(1974年5月)的陈外欧

全团每一个单位、每一个战士都能安全翻越大雪山，他竟往返三次翻越了90里的大雪山。

在抗日战争时期，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军一二〇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王震任三五九旅旅长。陈外欧先任营长，后任团长，参加了华北抗战，保卫延安，南泥湾屯垦和南下作战。

这里特别要说的，是陈外欧的请缨南下。1944年秋，党中央决定成立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简称南下支队）挺进华南，创立新的抗日根据地，以配合全国对日实行反攻作战。南下支队以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为主力组成，司令员王震，政治委员王首道。部队组建时，组织上考虑到陈外欧团长身体不好，且新婚不久，爱人怀孕在身，决定让他任留守部队参谋长。

但是，陈外欧却认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部队执行重大任务的关键时刻纵有千难万险他也应随军南下，为抗战胜利作出自己的贡献。

陈外欧的多次请求，终于获得组织批准。他被任命为南下支队第一大队（后改为支队）大队长。部队出发时，他鼓励妻子晨虹留在后方，要努力学习，坚持革命，不要惦念他。在谈到即将出生的孩子时，他意味深长地叮嘱说：“生下的孩子，无论是男是女，都取名‘亮南’（取意解放南方，迎接胜利）。”表示了他为完成南下任务、

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而准备牺牲的坚强决心。

陈外欧跟随王震将军此次南下，直达广东，后又艰苦转战重返陕西，历时两年，行程两万余里。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粉碎了日伪顽数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出色地完成了任务。1946年9月，南下支队返回延安，受到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盛大欢迎。毛主席在欢迎大会上讲说：“你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深入敌人心脏，敢于和敌人作斗争，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数十万大军的围剿，胜利地返回延安。”

王震将军在“文化大革命”中谈到陈外欧参加南下支队的情况时这样说：“南下北返，孤军远征。因为没有根据地作依托，其困难程度不亚于长征。当初，我考虑到陈外欧同志新婚不久，胃病常犯，不想让他参加南下。可他是一个三天不打仗手就发痒的人，不让他参加他不干，三番五次找我谈，最后我只好同意，并让他去带主力，担任一大队大队长。陈外欧身经百战，只多不少，仅仅南下北返作战就不下百次。陈外欧打仗不怕死。因为打起仗来他的指挥位置总是靠前，叫都叫不回来。为此，他没有少挨我的批评。但他习性不改，听到枪响就坐不住。”

屡遭厄运 痴心不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陈外欧离开野战部队，先后调任西北军官学校教育长、解放军第一通讯学校校长、中央军委测绘局局长兼解放军测绘学院院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由周恩来总理点将，调任国家测绘总局局长兼党组书记，成为新中国和我军测绘事业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者之一。

陈外欧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位八次负伤，身为甲级残废的红军战士，在他跟着党奋斗了三十个春秋之后，一夜之间被打成反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起因是1959年4月，陈外欧利用休假探望茶陵老家，住了二十多天，顺便进行了一些社会调查。他由县城步行回到故乡马溪滩。他还白天

同社员一起下田劳动，晚上找社员、干部谈话座谈，了解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他看到墙上写的“单双两季、全国第一”的巨幅标语，看到稻田里“亩产5000斤”的木牌，联想到当时浮夸成风，他不无怀疑地找到乡党委姓谭的书记，问他亩产到底能有多少？这位书记说：“亩产800斤。”陈外欧仍然怀疑，又紧逼一句：“你讲的可是心里话？”谭这时才惭愧地改口说：“实际只有500斤啊。”

陈外欧本着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将他了解的农村中的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等情况，给国务院民政部写了报告，对茶陵县委的同志也进行了批评教育，某书记当面表示虚心接受，但转背就写信告了陈外欧一状。

陈外欧回到北京，在两次会上对农村存在的“左”的现象直言不讳地进行了批评。从后来对他的批判看，说他主要讲了三条：(1)“虚报浮夸是史无前例的，这完全是干部用秦始皇的办法压出来的。”(2)“所有制搞不清楚，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走到哪里就吃到哪里，几乎没有界限了，浪费惊人。”(3)“丰产不丰收，钢铁元帅升帐，什么事都让路，粮食和茶籽都未及时收回，浪费异常严重。”岂料，就是这些对真实情况的反映和尖锐的批评为他招来了政治大祸。

1959年8月，党中央在庐山举行了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会议通过的《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文件精神传达后，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在此背景下，对陈外欧的批判逐步升级，调子越来越高，最后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了国家测绘总局局长和党组书记的职务，并给了留党察看两年的严重处分。

1960年12月，陈外欧被下放到云南，任云南省农垦局副局长兼景洪农场场长。老首长王震特别叮嘱他“不要背思想包袱，要放大胆、放手干”。

从此陈外欧抛开个人得失，蒙受着屈辱，一头钻到农垦工作中。他像当年在延安南泥湾屯垦时一样，团结群众，艰苦奋斗。他有严重的胃

病，牙齿又不好，但他坚持吃大食堂，和职工一起啃包谷、吃红薯。

陈外欧当时已年过半百，白发苍苍，身体瘦弱，仍靠着坚强的革命意志，坚持一个人拄着一根木棍，一个个生产队进行考察，找干部职工谈话，发现问题，研究解决。经过短短的两年时间，景洪农场面貌发生很大变化。橡胶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粮食和畜牧业生产有了较大增加。

1962年5月，党内民主生活的春风吹暖了陈外欧同志的身心。他的冤案得到平反，中央军委决定任命他为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晋升军衔。陈外欧这位百炼成钢的硬汉子再也控制不住感情的激动，流下了难以抑制的泪水。

陈外欧没有讲一句埋怨的话，没有对当事人流露任何的不满。他只是心情平静、态度诚恳地提出：若征求个人意见，他不去新疆履新，而回测绘总局重操旧业。他说，他要求回测绘局去，他热爱测绘事业，他对测绘战线职工有感情，特别讲到周恩来总理调他来测绘总局工作时对他的指示与重托还远没有实现，他愿把自己的余生全部献给党的测绘事业。

正当陈外欧同志雄心勃勃，殚精竭虑，带领测绘战线广大职工为开创中国测绘事业新局面而奋力拼搏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陈外欧在国家测绘总局成为“造反派”攻击和批斗的首要目标。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1959年反右倾中已经作了结论的问题重新拿了出来，“新账老账”一起算。先把陈外欧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又扣上了“贺龙死党”、“王震心腹”、“五一六”分子等罪名。

1968年5月16日，陈伯达批示：“防止杀人灭口，立即逮捕”。从此，陈外欧被捕入狱，家里被洗劫一空，妻子儿女遭株连。

陈外欧身陷囹圄，满腔义愤，奋起抗争。在动乱初期，小会批，大会斗，造反派用“车轮战术”逼陈外欧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陈外欧说：“我在工作生活中缺点错误肯定是有，但

我绝不是“三反分子！”在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疯狂施虐，非要他低头承认“三反分子”不可。陈外欧被逼急了，挺胸昂首怒斥道：“要说我是三反分子，那我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反分子！”“造反派”老羞成怒，对他一阵拳打脚踢。

陈外欧是一位居功不骄、从不自夸的人。他身经百战，八处负伤，但平时不讲自己的“过五关、斩六将”。

在十年动乱中，疯狂施虐的“造反派”无视历史，不顾事实，诬蔑陈外欧在战斗中贪生怕死，贪天功为己功，激怒了刚正不阿、性格倔强的陈外欧，他说：“我什么时候打仗怕死过？我贪过谁的功劳？”他猛然高高举起致残的左手吼道：“这难道是狗咬的吗？”

陈外欧被关进北京秦城监狱后，整天关在单人牢房里，不放风，也不提审。睡觉不准关灯，不准面朝外。陈外欧大声呼喊：“我究竟犯了什么罪过？为什么把我打入牢房？赶快提审吧，把你们的罪证拿出来，老子不怕！”

打手们大施淫威。提审时责骂、毒打，然后又给他戴上手铐脚镣，逼陈外欧低头认罪。陈外欧坚如松柏，整整五年的铁窗生活中，他没有违心承认过一条罪状，没有违心地写过一纸陷害革命战友的材料。

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1972年12月，经党中央批准，陈外欧被无罪释放。他获得了本来就属于他的自由与光明。

1984年9月1日，陈外欧同志因病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74岁。他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献给了祖国。党组织在八宝山为他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很多老首长、老战友、老部下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为他送行。看着他成长起来的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将军早早地来到八宝山灵堂。他缓缓地落坐在外欧同志的遗体跟前，抚摸着他那已经僵硬的手，哽咽着对他的妻子晨虹和儿女们深情地说道：“陈外欧同志是硬汉子啊！他的心是红的，他的骨头是硬的，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

（责任编辑 文 贤）

“自祭联”不幸成讖语

——怀念江上青壮烈牺牲六十年

● 孟亦奇

1938年11月间，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委派原六安县长盛子瑾任第六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那时，国共两党形成较好的统一战线局面。安徽省民众动员委员会是地下中共安徽省工委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省动委会内的地下党负责人是省工委常委张劲夫（对外是省动委会总干事）。他根据中共省工委的决定，抽调江上青、赵敏、吕振球、徐崇富等几位同志，又组织省动委会直属第八工作团，统由江上青率领。其中党员组成中共特别支部，由江上青任支部书记，一起去皖东北协同盛子瑾开展敌后工作，创建皖东北抗日根据地。

江上青才华出众，善与人交，工作很有魄力，很有办法，有胆有识。他深知敌后形势复杂，环境险恶，临行时作“自祭”联一副：“拚得瘦骨埋锋镝，常使英雄祭血衣”。可见，他已决心誓死不负党和人民的托付。他这副“自祭”联不幸成为讖语。他到皖东北工作仅九个月，就遇难了，时仅28岁。从他在皖东北工作短短时间内所取得的业绩看，他确是我党的栋梁之才。

我是省动委会直属第24工作团团员（后任第12工作团副团长），团部驻麻埠镇附近，我带一部分团员在麻埠北约20里小马店工作。1938年11月下旬，江上青率领好几位同志，从立煌县城（解放后改为金寨县）出发，正好是一天的



行程（约80里），到小马店我们处住宿。那时生活条件很差，但青年之间有着炽烈的革命热情，我尽其所有进行招待。在群众家里找些竹笆、木板等，放上稻草，成为床铺，烧热水给他们洗脚，让他休息、睡好，多放米，多做饭，添点荤菜让他们吃香，吃好。我们很乐意，他们很高兴。

晚饭后，江上青等和我们几位同志，在一起啦呱、叙谈，气氛十分融洽、

活跃。叙谈中自然地插些乐观、诙谐语言，不断发出笑声。我向江上青说：你是我的老大哥，你是我的三个老大哥。他和同志们对我这样的突然提法，都不解其意，江问我：怎么能是三个老大哥呢？我答：你的年龄比我大好几岁，这是一个老大哥；你的文化水平比我高得多，这又是一个老大哥；你的马列主义理论，比我知道的多得多，这也是一个老大哥。这不是三个老大哥吗？惹得全场同志哈哈大笑。

他深知我是皖东北泗县人，集体叙谈后，他约我到村外个别啦呱。他要我跟他一起到皖东北工作，语言恳切，情意诚挚，向我做动员工作。我未同意。我说我们几个人商议，最近已向上级要求到延安学习去。这时，他就不便多说了。时已半夜，我俩在月光下握手告别，各自回

住处休息了。

第二天早饭后，江上青等几位同志又起程了。他们打算由麻埠向东走，经独山、苏家埠到六安城。再具体打听去皖东北的路线。我们几位同志送他们出村南头，亲切地握手话别。

将他们送走之后，我们几个人谈论着他们，都认为江上青的文化、理论水平和言谈风采以及能力，都是名不虚传。

江上青在我的脑子里留下深刻的印象。以后，我常想念到他。可是，1939年冬，我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教导队，听形势报告中，却得知上青在皖东北牺牲的消息。这样的一名革命骨干，一名不可多得的人才，被可恨的敌人杀害了，我为之悲痛，小马店短暂的相会情景，常常萦绕于怀。

1966年起进行“文化大革命”，1973年2月我被分配到安徽省农学院任院长、党委书记。一天，开院党委会讨论清理积案，会上由人事处负责人汇报情况。汇报说我院林学系有一位女教师叫江泽慧的，“文革”初期，有人说她是叛徒女儿，批斗一番，就搁下了，还未做结论。我似乎有些感觉，问：她的父亲叫什么名字？答：叫江上青。我很诧异，急问：是不是扬州人？答：正是扬州人。我把卷宗调过来看看，正是江上青这三个字。我说：江泽慧不是叛徒女儿，是烈士女儿。我接着说：“江泽慧还不认识他的父亲是什么样子呢！江上青抗日离家时，他的老婆怀着孕还未生下来呢！以江泽慧出生的年、月算算，她正是江上青离家时、她母亲怀孕的那个孩子。江上青由扬州到武汉，到大别山，又到皖东北开辟抗日根据地，1939年8月29日行军路上，中敌人埋伏，壮烈牺牲了。牺牲的地点在安徽省泗县北乡刘圩附近。

与会同志们说，说江泽慧是叛徒女儿，这是一个冤案。现在遇到你，你又说得这样详细，这也就是个奇案了。这案要平反，要快平反。

会上又讨论了一番。认为：关于江上青的家事，是孟亦奇听江上青生前讲的；到皖东北以后和牺牲的情况，是孟亦奇听到别人说的，不能写出直接的有效证明。而且天下奇事多，“文革”中调查韩九如，找到六个韩九如。有的是革命的，

有的是反革命的，有的是平平老百姓，我提出：江上青牺牲时，我不在皖东北。现在合肥市有些同志曾在皖东北工作，知道的情况会更详细些，更直接些，他们会写出有效的证明的。会议决定派三人小组到合肥市找曾在皖东北工作的人写出证明。

党委会议结束后，调查小组即往合肥，很快取得有效的证明。这时农学院在农村办学，院部和农学、植保、农机几个系，在宿县城南紫芦湖；蚕桑、茶叶和林学三个系在滁县沙河集附近，为沙河分院；畜牧兽医在凤阳城北，为凤阳分院。分院都设分院党委。院党委派人携带为江泽慧平反的决定和证明材料，到沙河分院，由分院党委召集大会，宣布为江泽慧平反。自此，江泽慧过去被诬栽的“叛徒女儿”的帽子被抛到九霄云外了，而成为真实的光荣的烈士女儿了。

几天后，出于对江上青烈士的感情，对其遗属的关怀，我专程到沙河分院看望她们。江泽慧已有个三口之家了。她的母亲王者兰随她过日子。王者兰也是个知识分子，说话通情达理，仪表温文尔雅。可惜，几年后她去世了。

江上青生前，由于他才华横溢，能力超群，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抗日宣传工作，统一战线工作，扩大和掌握武装，开展游击战争，训练、培养干部等，都很快取得了很大成绩，为创建皖东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打下了坚实基础。他的光辉形象和革命业绩，永远活在皖东北人民的心中。

今年是江上青殉难60周年，附诗一首，以表怀念之情。

怀念江上青同志

当年笑语送君行，
抗日冲冠壮士情。
大痛斯人含恨去，
心香一瓣慰英灵。

(作者孟亦奇系原安徽省政协常委)
(责任编辑 木 易)

甲骨文发现一百年

● 王兆麟

文字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早在 3000 多年前就已经有了成熟的文字——甲骨文。但是，它直到距今整整 100 年前，即公元 1899 年才被确认。

甲骨文的发现，震惊中外，并由此而引起对商都殷墟的发掘，中国近代考古学从此诞生。

“一片甲骨惊世界”

古代甲骨上的刻划痕迹被确认为是商代文字，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中国考古的三大发现(敦煌石窟、周口店猿人遗迹)之一。可是它的发现过程，却是十分偶然而又富于戏剧色彩的。

清末光绪 25 年(公元 1899 年)秋，在北京清朝廷任国子监祭酒(相当于中央教育机构的最高长官)的王懿荣(1845—1900)得了疟疾，派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的达仁堂中药店买回一剂中药，王懿荣无意中看到其中的一味叫龙骨的药品上面刻划着一些符号。龙骨是古代脊椎动物的骨骼，在这种几十万年前的骨头上怎会有刻划的符号呢?这不禁引起他的好奇。对古代金石文字素有研究的王懿荣便仔细端详起来，觉得这不是一般的刻痕，很像古代文字，但其形状又非籀(大篆)非篆(小篆)。为了找到更多的龙骨作深入研究，他派人赶到达仁堂，以每片二两银子的高价，把药店所有刻有符号的龙骨全部买下，后来又通过古董商范维卿等人进行搜购，累计共收集了 1500 多片。

他对这批龙骨进行仔细研究分析后认为，它们并非什么“龙”骨，而是几千年前的龟甲和兽骨。他从甲骨上的刻划痕迹逐渐辨识出“雨”、“日”、“月”、“山”、“水”等字，后又找出商代几位国王的名字。由此肯定这是刻划在兽骨上的古代文字，从此这些刻有古代文字的甲骨在社会各界引起了轰动，文人学士和古董商人竞相搜求。

曾有人对王懿荣从中药中发现带字龙骨之说提出质疑，认为王懿荣在他的有关著述中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并认为王懿荣吃的龙骨在药店已加工成细粒，看不出刻痕文字来的。而且当时菜市口一带并没有达仁堂药店。对此，后来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周绍良说，当时龙骨在中药店都是成块、成片出售的，直到三十年代他到中药店买龙骨还是这样。至于达仁堂药店当时确实不在菜市口，但菜市口有家著名的西鹤年堂中药店，当时的人很迷信西鹤年堂，买中药都要去西鹤年堂药店，这也有可能是当时传误造成的结果。

至于著书立说方面，首先对甲骨文作出确认的王懿荣还没来得及作深入研究并著书立说，八国联军便逼近北京城，他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

1900 年 7 月，侵略军兵临城下，慈禧太后带领皇室人员仓皇出逃，王懿荣彻底失望了。他对家人说：“吾义不可苟生!”随即写了一首绝命词毅然服毒坠井而死，年方 56 岁。

后来人们称这位最先发现甲骨文的王懿荣

为“甲骨文之父”，在甲骨文发现 90 周年的 1989 年秋，在他的家乡山东烟台市福山区建成王懿荣纪念馆，以纪念他的功绩。

王懿荣殉难后，他所收藏的甲骨，大部分转归好友刘鹗（即《老残游记》作者刘铁云）。刘又进一步收集，所藏甲骨增至 5000 多片，于 1903 年拓印《铁云藏龟》一书，将甲骨文资料第一次公开出版。不久，学者孙诒让根据《铁云藏龟》的资料，又写出了甲骨文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契文举例》。

甲骨文被发现之后，引起学术界的轰动。古董商人为了垄断财源，对于甲骨的来源秘而不宣，以后又谎称出自河南汤阴、卫辉等地。直到 1908 年，学者罗振玉才首先访知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县的小屯村一带，于是他派遣自己的亲属去安阳求购，又亲自前往安阳进行实地考察。先后共搜集到近二万片甲骨，于 1913 年精选出 2000 多片编成《殷墟书契》（前编）出版，随后又编印了《殷墟书契菁华》（续编），为甲骨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继罗振玉之后，许多著名的学者，如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唐兰、陈梦家、容庚、于省吾、胡厚宣等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释和研究，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甲骨学。

在甲骨文还未确认以前，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的农民在耕作时就不断在农田里挖掘出古代甲骨。据说把甲骨当做药材到中药铺去卖的第一个人是一位叫李成的剃头匠。一次他害上一身脓疮，没钱去求医购药，就把这些甲骨碾成粉敷到脓疮上，想不到流出的脓水被骨粉给吸干了，而且发现骨粉还有止血的功效。从此他就把它们收集起来，说成是龙骨，卖到了中药铺。

经过许多学者专家考证研究，所谓龙骨其实是商代占卜用的工具。人们在占卜之前，先把龟甲和牛肩胛骨锯削整齐，然后在甲骨的背面钻出圆形的深窝和浅槽，占卜时，先把要问的事情向鬼神祷告述说清楚，接着用燃烧着的木枝，对深窝或槽侧烧灼，烧灼到一定程度，在甲骨的相应部位便显示出裂纹来。于是，占卜者根据裂纹的长短、粗细、曲直、隐显，来判断事情的吉

凶、成败。占卜后，便用刀子把占卜的内容和结果刻在卜兆的近处，这就是卜辞。刻有卜辞的甲骨被当做档案资料妥善收藏在窖穴中，遂得流传于后世。甲骨文发现的故事，后来被人们称为“一片甲骨惊世界”的奇迹，在中国和世界考古史上写下了带有传奇性的篇章。

殷墟遗址的发现

由于弄清了甲骨出土的地点，从 1928 年秋到 1937 年夏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著名考古学家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人先后主持下，在小屯村一带进行了长达 10 年的 15 次考古发掘，不仅先后发现了总计 24900 多片甲骨，而且发现了商代后期的宫殿、宗庙遗址和王陵区，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铜器、玉器、陶器，从物质文化上提供了殷墟为商代王都的证据。殷墟成为世界闻名的古文化遗址，又一次震动了中外学术界。

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又进行了多次



商代刻有卜辞的龟甲（拓本）

调查、发掘,大体弄清了殷墟的范围和布局。位于安阳市区西北郊的殷墟,它以小屯村为中心,东西约6公里,南北约5公里,总面积30平方公里左右。洹河南岸的小屯村一带是殷王居住的宫殿区,发掘出宫殿基址数十座,最大的一座面积5000平方米。洹河北部是殷王陵区,先后发掘出十几座大墓、一千多座小墓,以及大批祭祀坑。在宫殿附近发现了两座甲骨档案库和铸铜、制玉、制骨、烧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殷墟发掘延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收获之丰,是中国考古史上罕见的。

为了纪念殷墟考古的伟大发现,1987年秋,安阳市在宫殿遗址区东北面修建了一座殷墟博物院,复原和再现了3000年前殷王宫和一些建筑的风貌。

1976年春,在宫殿区附近,小屯村北偏西100米处,发掘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将军妇好的墓。甲骨文记载,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有一年夏天,北方边境发生战争,双方相持不下,妇好自告奋勇,要求率兵前往,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起兵,结果大胜。此后,武丁让她担任统帅,从此,她东征西讨,打败了周围20多个方国(独立的小国)。有一片甲骨卜辞上说,妇好在征战羌方时,统帅了1.3万人的庞大队伍,这是迄今已知商代对外用兵最多的一次。妇好墓是殷墟发掘的唯一保存完整的殷代王室墓葬,出土的很多器物上都刻有铭文,是唯一能与甲骨文、历史文献相印证,从而能确定墓主身份、年代的商代王室墓葬。

对殷墟70年的考古,特别要提出的是对甲骨文的三次重要的考证与发现:

第一次是1936年6月12日,在小屯村北宫殿区发掘出一个甲骨坑,保存着带字甲骨17096片,记录着商王武丁时期的许多活动,看来这是武丁王室的甲骨档案库,这批甲骨片的出土,对考证武丁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有极宝贵的价值。发掘时坑中还发现埋有一个身体蜷曲、侧卧的尸骨,其身躯大部分压在甲骨上,专家认为可能是档案库的看守人。

第二次,1973年在小屯村南地,又发掘出

甲骨7150片,其中刻字甲骨5041片。与这批甲骨同时出土的还有陶器制品,这种甲骨与陶器共存的现象为甲骨文分期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宝贵资料。

第三次是1991年秋,在花园庄东地发掘出一个仅2平方米的甲骨坑,但其叠压厚度却达0.8米,出土1583片甲骨,其中刻字甲骨有579片,记载内容丰富,而且问卜者都是武丁时期的王族成员和高级贵族。说明这个时期,占卜活动已不限于最高统治者国王,王室贵胄都可以利用占卜来预测吉凶了。

发现甲骨文的重大意义

商代甲骨文是中国发现最早的文献纪录,如今甲骨学已成为一门蔚为壮观的世界性学科,从事研究的中外学者有500多人,发表的专著、论文达3000多种。它对历史学、文字学、考古学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一篇《殷本纪》,详细记载了商王朝的世系和历史。过去史学界许多人对这些记载将信将疑,因为没有当时的文字记载和留存的实物资料可作印证。

本世纪初,罗振玉在他搜集的甲骨中,发现了刻有商王朝先公、先王的名字,证实了这些甲骨的出土地小屯就是《史记》中所说的“洹水南,殷墟上”的殷墟所在地。

此后,学者王国维对甲骨卜辞中所见的商代诸先王、先公,对照《史记》记载作了详细的考证,证实了《史记》中《殷本纪》的可信性。殷墟是商朝第10代王盘庚于公元前1318年,把都城从奄(今山东曲阜附近)迁到殷(小屯村一带),从此历经至8代12王,在此建都达273年之久。这些研究成果,把中国有考据可信的历史提早了一千年。

从一片殷商甲骨上文字的发现和认定,由此发展到肯定了一个距今3000多年、长达600多年的朝代,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发现!这样就把本世纪20年代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可信历史始于西周的“疑古”思潮,予以彻底的否定。

殷墟甲骨的大量出土反映了商代占卜风之盛。王室贵族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门,等等,无不求神问卜,以得知吉凶祸福决定行止。于是,占卜成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朝廷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卜官。有刻辞的甲骨,都作为国家档案保存起来,堆存在窖穴之中。因此甲骨上的卜辞成为研究商代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反映了从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000年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1899年甲骨文首次发现到现在,据学者胡厚宣统计,共计出土甲骨154600多片,其中大陆收藏97600多片,台湾省收藏有30200多片,香港藏有89片,总计我国共收藏127900多片,此外,日本、加拿大、英、美等国家共收藏了26700多片。到目前为止这些甲骨上刻有的单字约4500个,迄今已释读出的字约有2000个左右。

中国的文字萌芽较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陶器上,就发现了各种刻划符号,成为中国文字的雏形,经过二三千年的孕育、发展,到了商代,我国的文字达到基本成熟阶段。甲骨文具有一定体系并有比较严密的规律,刻划精湛,内容丰富,对中国古文字研究有重要作用。过去,古文字研究的主要的依据是商周青铜器上

的铭文,如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甲骨文比《说文解字》要早1500年,而且它是来源于直接发掘出来的出土文物,可信程度更高,对研究汉字的起源和发展,纠正《说文解字》的疏失,解决青铜器铭文中悬而未决的问题,都有极大价值。

从甲骨上的文字看,它们已具备了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三要素。其用笔线条严整瘦劲,曲直粗细均备,笔画多方折,对后世篆刻的用笔用刀产生了影响。从结字上看,文字有变化,虽大小不一,但比较均衡对称,显示了稳定的格局。从章法上看,虽受骨片大小和形状的影响,仍表现了镌刻的技巧和书写的艺术特色。“甲骨书法”现今已在一些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中流行,就证明了它的魅力。

甲骨文的发现以及由此引发的殷墟发掘,对中国考古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此之前的学者,只是在书斋中研究碑文和铜器铭文,从不去田野里考察和发掘。中国的田野考古,最早是1921年对河南浚县仰韶村遗址的发掘,然后是1927年开始在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的早期发掘。但当时对这两处的发掘,不是由我国学术部门独自承担的,而是由当时政府聘请外国学者主持,或由中外学术单位合作进行。真正由中国学术机关独立进行的田野

考古,是从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对殷墟的首次发掘开始的。它对中国田野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都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中国老一代的考古工作者,绝大部分是在殷墟考古工地上成长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新一代的考古工作者,又基本上是由他们培训出来的。因此称殷墟是中国田野考古学的诞生地,确属当之无愧。

(责任编辑 方 隽)



河南安阳殷墟版筑基址和石卵

义和团的悲剧

● 雷 颐

一百年前的此时,义和团运动正在兴起,一年后便轰轰烈烈、如烈火燎原般地突然燃遍整个北中国。但就在高潮之际,却又突被残酷镇压下去,其兴也勃,其亡也速。义和团运动当然是正义的,团民们视死如归的精神更是可歌可泣。但惟其非常正义、无比英勇,使人更感到这的确是场无与伦比的历史悲剧。而这场悲剧的复杂性与深刻性更引人深思,发人深省,否则,这一段深创巨痛的历史将全部“白费”,那么多的鲜血与生命也将全部“白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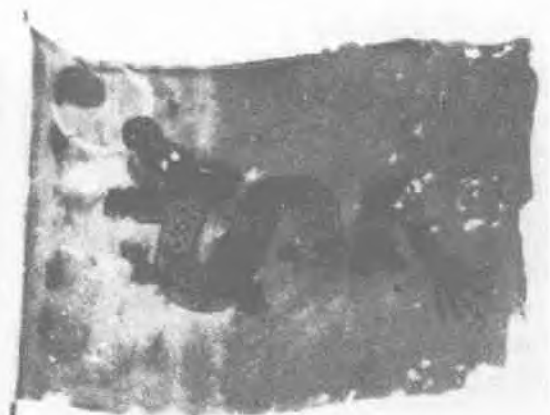
义和团兴起的社会背景

义和团运动兴起的背景十分复杂,但最根本、直接的原因则是19世纪末叶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剧,中华民族危机的加深,这种侵略带来的文化冲突所引起的“反洋教”。

1895年《马关条约》签定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随后俄国强行租借旅顺、大连及附近水面,英国租借威海卫及附近水面,法国租借广州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列强已基本上划出各自在华的势力范围,中华民族面临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空前严重。可以说,从统治阶级的最上层到被统治阶级的最下层,自觉不自觉地要对这种形势作出自己的反应。

“洋教”是指西方传来的基督教。从康熙晚期到鸦片战争前,清廷一直实行禁教政策。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列强的压力下签订不平等条约,被迫同意解除教禁。传教士以船坚炮利为后盾,纷纷来华传教。很明显,这种传教的实质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但为了传教的策略需要,教会在中国创办了不少以传播现代自然科学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学校、医院和报刊杂志,对现代科学知识在中国的引进和广泛传播,对中国的现代化确实又起了重要作用。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深入内地乡村建堂传教,农民与教会的冲突日益激烈,屡屡发生各种“教案”。反洋教既有文化上的冲突,更有实际利益的冲突。从文化上说,教会认为“祭天拜祖”是偶像崇拜,而禁止信教者进行这些活动,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视为神圣的祭天地、敬鬼神、祀祖宗、拜孔子几乎水火不容,洋教因此被人(尤其官绅)视为“灭伦伤化”,难以容忍。在实际利益方面,教会为了扩大传教,往往不择手段、不分良莠地吸收教民。由于教会享有种种政治特权,不少品行不良分子纷纷入教,仗势为非作歹,横行乡里。在教民与乡民的冲突中,教会自然袒护教民,地方官往往也无可奈何。这样,文化冲突与民族矛盾交织一起,终于兴起声势浩大的反洋教运动。

据统计,从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末,全国发生大小教案八百余起,其中较大的有“天



义和团龙珠旗

津教案”、“长江暴动”及四川余栋臣起义等。其发动与参与者有地方官员、土豪乡绅、普通农民、民团会党、城市贫民、流氓无产者……十分复杂，规模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激烈，但基本诉求仍是“崇正避邪”、“忠君卫道”的封建性。义和团运动于90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攻打教堂，反洋教。1898年10月下旬，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使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从山东发展到直隶，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天津。义和团的口号虽不统一，但主要是“顺清灭洋”“扶清灭洋”“助清灭洋”，并明确表示“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爱国性与封建性混为一体。对一切与“洋”有关之人和物，义和团则极端仇视，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者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义和团的另一个特点是几乎完全靠迷信、巫术来动员、维持群众，强调练功能刀枪不入，能任意请出中国古代历史或传说中的人物如关公、赵云、武松、孙悟空、猪八戒、黄天霸、樊梨花、观世音……出来为自己助战。许多团民时时念咒画符，“降神附体”以“大仙”自居，声称具有魔法神力，任何洋枪洋炮都不在话下。对此，越来越多的人信以为真，全社会的迷信氛围达到顶点。

对如此巨大的社会运动，清王朝中央政府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竟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政

策，往往由各级官员自行决定。由于地方各级官员对义和团的态度非常不同，有的支持，有的反对，中央官员的意见也极不一致，所以中央政府决策也深受影响，时而主剿，时而主抚，但总的倾向是主抚。而最终决定明确支持义和团，则是要利用义和团根绝维新隐患。

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使国人深受刺激，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借法自强”，要学习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先进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改造中国，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上演了“百日维新”的活剧。变法必然触及守旧者的利益，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派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发动戊戌政变，维新六君子被杀，康、梁在外国使馆人员的帮助下逃往海外，支持维新的官员受到严厉处置，光绪皇帝被囚禁瀛台，“维新”失败，中国社会和历史严重倒退。为了根绝隐患，慈禧等守旧派决定废除光绪，另立新君，但这一计划遭到西方列强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对守旧派来说，光绪的存在确是潜在的巨大威胁。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力量，便想依靠义和团的“民心”“民气”，同时又相信义和团的各种“法术”真能刀枪不入，打败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洋人，于是决定用义和团来杀灭“洋人”，达到废立的目的。而义和团本身的封建性、落后性，也为这种利用提供了基础。

由于有了政府的明确支持，义和团情绪高涨，迅速向更极端、更非理性的方向发展，对传教士和教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打杀。1900年春夏义和团进入京津后，情形更为恐怖，许多传教士和外国人、中国教民被杀，甚至“夙有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婴儿生来迎月者亦杀之，惨酷无复人理。”他们要消灭一切带“洋”字的东西，铁路、电线、机器、轮船等等都在捣毁之列，因为“机器工艺”为洋人“乖戾之天性所好”。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惶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对开明官绅、维新派人士，义和团更是明言

打杀,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明令要“康有为回国治罪”,在一些顽固派的指使下,还一度冲入宫禁要捉拿光绪皇帝,外国使馆和外交人员自然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势下,西方列强以“保护使馆”的名义组成“八国联军”发动又一次侵华战争。这时,清政府必须对是和是战作出正式决定。清廷从6月16日到19日连续召开四次御前会议,讨论和战问题,主战、主和两派进行了激烈辩论。主和的有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等,得到光绪皇帝支持,主张镇压义和团,对外缓和;主战的有载漪、刚毅、徐桐等,实际上以慈禧为首,主张支持义和团,对外宣战,首先攻打使馆区。结果当然是主战派胜利,主和派认为中国大难将至,光绪与许景澄等三人在廷上团聚共泣,却毫无办法。许景澄等五名主和大臣不久被清廷处死。6月19日清廷决定“向各国宣战”,给北京义和团发放梗米二万石、银十万两,并命令清军与义和团一同攻打使馆区,义和团更加斗志昂扬。经过两个月的激烈战斗,中方终因武器

落后而不敌八国联军,而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话同时破灭,团民纷纷四散,北京城于8月14日被攻破,第二天慈禧太后携光绪等向西仓惶出逃。就在八国联军血洗北京,残酷屠杀义和团团民之时,西逃途中的慈禧已开始与列强议和。为尽快与列强达成和议,清廷从9月7日起连续发谕,下令剿杀义和团:“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经过清政府地方官的严剿,一些零星小股义和团也被最后扑灭。

义和团的悲剧

义和团反侵略斗争无疑是正义的,但其社会政治诉求却非常落后,它排斥、反对乃至仇视一切现代文明。这种仇视当然事出有因,如中国文化中“华夏中心”、盲目排外的传统,更有近代中国屡受“洋人”侵略的背景。不过唯其如此,使人更感“戊戌维新”的难能可贵。维新运动的直接动因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明治维新的日本

打败,使先进的中国人深受刺激,认识到只有像日本那样“维新”才是中国的出路,中国才能强大。他们不因日本侵略中国、残酷屠杀国人而反对“维新”,怒斥“维新”的种种不是,反而明确提出要学习敌国日本的“维新”,这不仅需要冷静的理性,更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维新派提出向敌国学习,承认敌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优于被侵略的祖国,很容易被指为“汉奸”、“媚敌”、“卖国”,所以只有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那样有胆有识者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甲



外国侵略者逮捕的义和团团民,在屠刀面前表现了非凡的勇敢和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

午战败后提出“借法自强”。而义和团运动则明显是维新运动的反动，因此才能被以慈禧为首的封建统治者中最愚昧、顽固、落后、守旧者所利用，成为他们手中的工具。维新派的“借法自强”与守旧派的“夷夏之防”二者虽如水火不相容，若仅从“爱国”的角度看，二者都是为了“救国”，因此本质上都可归于广义上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但不无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只将严守“华夷之辨”、反对“借法自强”者视为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而“借法自强”者则往往被扣以“变夷”“媚外”“崇洋”“卖国”“殖民”等大帽，使其居于道德、政治的绝对否定性境地和劣势地位因而最多只有招架之功，反对者进而自己再倚道德、政治的优势地位对其作正义辞严的攻击或批评。这样，在近代思想概念的流变中，所谓“民族主义”便常常带有相当程度封闭排外色彩，实际应称为“狭隘民族主义”。但近代历史表明，这种“民族主义”却偏偏又对中国真正的繁荣富强起了巨大的阻碍作用，实际误国匪浅，为害甚烈。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和相当的警惕。而近代中国的些微成就、终末亡国恰恰却

是许多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不同内容地主张“借法”的中国人的努力结果。

对义和团，清政府最初只想到“民心”、“民气”可用，而狡猾地加以利用，但并未想到当民众的怒火被点燃后，它便很难控制其方向、规模，最终很可能是自己被灼伤。而义和团本来就有满腔怒火正待喷发，一朝得到清政府的支持更一发而不可收，而没有想到自己只是官方的一种工具，一旦情况有变或超出官方允许的范围，自己首先会成为牺牲品。从中也可看出历史的复杂性。

对义和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进人物更多地看到其负面作用。陈独秀 1918 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克林德碑》一文甚至认为义和拳的道路是通“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

他们对义和团的观点或许不无简单、片面、苛刻之处。但一场正义、英勇的运动却被最腐朽、最落后的力量所掌握利用，历史悲剧，莫过于此！

（责任编辑 程 度）

代购代邮

一个时期以来，函询季羨林、李锐、韦君宜等同志作品的读者日益增多。为方便读者，现就以下书籍本社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书 名	作 者	定 价	邮 费
牛棚杂忆	季羨林	19.50	3.00
思 痛 录	韦君宜	13.00	3.00
百年聚焦	史义军	59.80	6.00
世纪三伟人	龚育之等六人	28.00	4.00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萧克 李锐 龚育之等	28.00	4.00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 煌	28.80	4.00
直面人生	戴 煌	19.80	3.00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杨奎松	29.80	4.00
冤假错案是这样平反的	何 载	15.00	3.00
大转折的日日夜夜	张湛彬	80.00	8.00
石破天惊	张湛彬	29.00	4.00

（《石破天惊》记叙了以下内容：胡耀邦为什么要给右派平反；陈云为什么提出康生有问题；为什么只有 290 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委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华国锋是怎样离开最高权力顶峰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怎样一步一步被突破的。）

欲购者可直接将书款汇至炎黄春秋杂志社。

社址：北京东城区戏楼胡同 1 号 邮编：100007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发行部

炎黄春秋

阎锡山从联共抗日到联日反共

新乡起义背后的生死情谊

香港税务局长被解聘始末

「穷过渡」的最后挣扎

甲骨文发现一百年

义和团的悲剧



前南夫妇与林海音(中)



吴晗

ISSN 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CN11-2581/K

邮发代号:82-507

定价:4.80 元